

#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

## 第 27 期目次

### 【論文】

- 1 施又文 林紓《春覺齋論文·流別論》對《文心雕龍》文體論的承與變--從〈論說〉到〈序跋〉
- 17 陳冠至 明代江西的書院藏書

### 【板本研究】

- 44 郭明芳 從清康熙刊《才調集》談古代書籍的代刻

### 【文獻整理】

- 52 吳福助 蕭繼宗〈含羞草賦〉考釋  
顧敏耀

### 【研究資料彙編】

- 59 謝鶯興 徐復觀教授研究資料彙編--近人對徐復觀之政治、文化的研究(二)

### 【手稿整理】

- 72 謝鶯興 館藏徐復觀教授手稿整理(二)：殷周之際的宗教中人文精神的躍動(上)
- 83 魏元珪 錢穆論學手書

### 【學人年表】

- 85 謝鶯興 陳曉薈教授大事年表

### 【東海特藏整理】

- 96 彭懷真 《陳曉薈教授著作專輯》序---多元角度、動人文筆
- 98 謝鶯興 徐復觀教授紀念室主題展(五)：「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第一章到第九章「先秦儒家」的手稿展
- 101 陳惠美 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之前的華文雜誌創刊號  
謝鶯興 --《紅專》
- 108 陳惠美 東海館藏普通本線裝書總目·經部四書類(三)  
謝鶯興

### 【交流紀實】

- 121 陳曦 讓閱讀空間成為閱讀的動力--參訪益品書屋台中店側記
- 124 李光臨 2018 台北國際書展參觀心得分享

### 【大事記】

- 125 圖書館大事記(2018.02.01~2018.02.28)

### 【館內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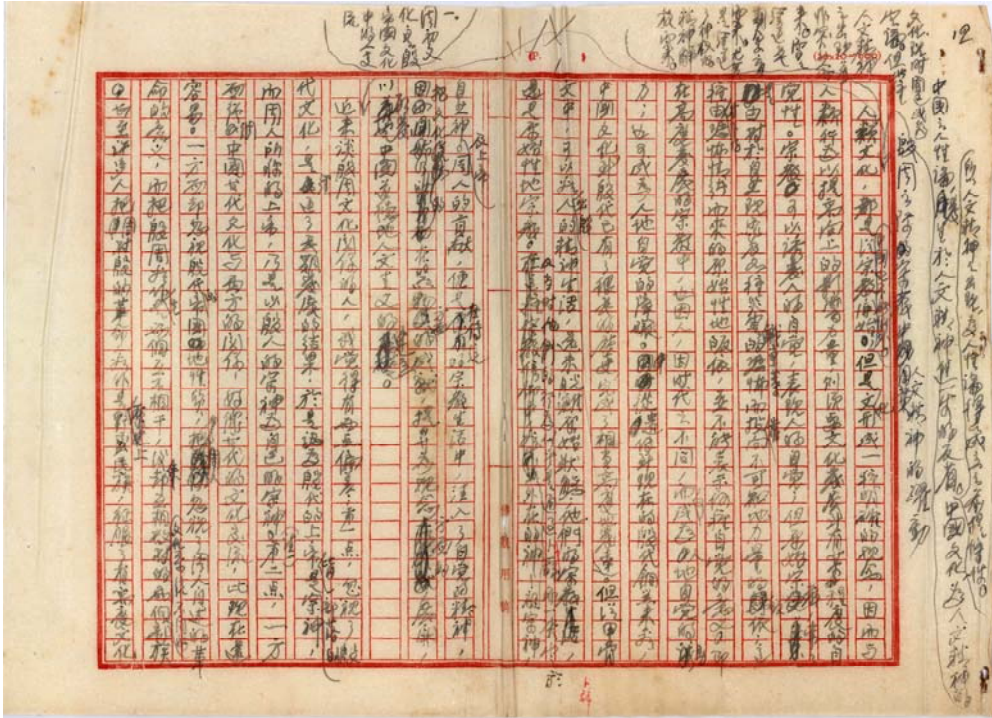
- 126 會議紀錄
- 128 圖書館 107 年 2 月份工作報告暨各項統計

### 【館藏文物選粹】

- 0 謝鶯興 文物選粹(廿七)：徐復觀先生手稿〈殷周之際的宗教中人文精神的躍動〉

館藏文物選粹(二十七)：徐復觀先生手稿  
〈殷周之際的宗教中人文精神的躍動〉

謝鶯興解說



〈殷周之際的宗教中人文精神的躍動〉手稿，分三節：1.周初文化，是殷帝國文化中的一支流；2.敬的觀念之提出，及原始宗教的轉化；3.周初人文精神對人性論的解發性及其限度。探討「人文精神之出現，人性論得以成立的前提條件」，「周人的貢獻，便是在傳統的宗教生活中，注入了自覺的精神；把文化在器物方面的成就，提昇而為觀念方面的展開，以啟發中國道德地人文精神的建立。」是篇 1960 年 11 月 5 日曾在《民主評論》第 11 卷 21 期以〈周初宗教中人文精神的躍動〉刊登，後來收入《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雖然彙編為專書為第二章，但實際上是該書最早撰寫發表的論文。

比對之後，該篇手稿與收入專書者，內容上有很大的差異。其一是手稿內文雖標示到「註二二」，但篇末卻未見各註的內容。其二是專書第二節「周公在殷遺民前……殆無疑義。所以」等 70 餘字；「周的文化……繼承發展而來」等 120 餘字；「一種新思想……在《周書》之前」等 130 餘字；專書第五節「阮元對節性的解釋……非常可笑了」等 130 餘字，手稿皆未見。其三是專書第四節論「周人所給與於殷人的傳統宗教的轉化」有四個轉化，手稿僅有三個，即無「第三轉化」160 餘字的内容。(請參見本期的「手稿整理」)

## 論文

林紓《春覺齋論文·流別論》對《文心雕龍》文體論的承與變--  
從〈論說〉到〈序跋〉

施又文\*

## 摘要

〈流別論〉中的「論」、「說」、「詔策」、「檄」、「移」、「章表」、「書」等文體，其得名含義、起源與演變、功能、風格與創作原則，大體繼承《文心雕龍》，但上述文體在唐宋以後的流變與名篇的鑑賞，林紓別出見地。

《文心雕龍·書記》當中的「奏記」等實用文書後來罕用，取代流行的是「贈序」、「序跋」、「雜記」等文體，〈流別論〉擷取明、清文體論的思想，進一步廣大其義，從而形成自家面目。尤其，林紓企圖通過文體名篇的鑑賞，指導後學入門的途徑，乃其古文文體論的最大特色。

在林紓〈流別論〉之前，所有的古文文體論都是以功能對象來分類，但是〈流別論〉在「論」體與「雜記」體卻提到以語言表達方式來分體，亦即，凡行文一涉及議論即為「論」體，一切記敘文皆為「雜記」體，具備了現代散文分體的雛型。

**關鍵詞：**春覺齋論文、文心雕龍、古文辭類纂、文體論、影響、流變、現代散文

## 一、前言

林紓《春覺齋論文》於西元 1916 年由都門印書局鉛印，1921 年商務印書館重印，改稱《畏廬論文》。西元 1978 年臺灣文津出版社出版的《畏廬論文等三種》，所收錄的《畏廬論文·流別論》只有 12 科 21 種文體，而 2007 年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歷代文話》第七冊，所收錄的《春覺齋論文》(即《畏廬論文》原來書名)，依照文體性質將「書記」一體，析分為「書說」、「贈序」、「雜記」與「序跋」4 類，共計 24 種文體，由於復旦本的歸類條理清晰、適應當時古文的應用情況，因此本論文乃是採用復旦本。

《春覺齋論文·流別論》從「論說」到「書記」各類文體論，受到《文心雕龍》很大的影響，如「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的行文體例，相當程度地規循著《文心雕龍》。然而《文心雕龍》「書

---

\* 朝陽科技大學通識中心助理教授

記」一篇，包含書說、奏記、奏箋、譜、籍、簿、錄、方、術、占、試、律、令、法、制、符、契、券、疏、關、刺、解、牒、狀、列、辭、諺等，除了「書說」仍然普遍使用之外，其餘實用文書到清朝已經不通行。

「贈序」、「雜記」與「序跋」，乃唐宋以後發展成熟的文類，所以〈流別論〉按照《古文辭類纂》的分類，將《文心雕龍》「書記」一體，析分為後代通用的「書說」、「贈序」、「雜記」與「序跋」四體，並引用《古文辭類纂·序》進行釋名，詳加審定。

〈流別論〉中的「書說」，在《文心雕龍》稱之「書」體，林紓名之「與書」，即現今的書信。書信的起源，〈流別論〉把時間推得比《文心雕龍》還要早。《文心雕龍·書記》中的「奏記」等多種文書，林紓的時代已經罕用。〈流別論〉討論到清朝的書信有「舒布其言」、「考訂故實」兩種性質，後者是清朝的新變。

唐初文人開始以「序」標題作文贈人，繼踵者眾，遂成一體。〈流別論〉討論「贈序」的流變，寄託於選文評論當中。比如，初唐「贈序」猶染六朝駢儷風習，中唐韓愈的「贈序」文章才別開生面，宋代文家不乏佳作，明代則興起一種「壽序」文字。「序」、「跋」同樣是為書、詩、文所作的文字，只因為附在書、詩、文的前後位置不同而名稱有別。「贈序」與「序跋」之異在於：贈序為人而寫，或意在送別或贈人以言；「序跋」為書、詩文集而寫，重在評介。

「雜記」包含的範圍很廣，舉凡紀一切事都算是雜記，依其體例略分為六類，各類的選評文章並不周全。「雜記」的起源，林紓自陳己見，推源於〈蘭亭集序〉與〈春夜宴桃李園序〉。

總之，《春覺齋論文·流別論》之辨析文體，主要是繼承《文心雕龍》文體論思想，又加以擴展補充文體流變、創作要領與理論原則，形成一有體系的古文理論。

## 二、〈流別論〉從〈論說〉到〈序跋〉對《文心雕龍》文體論的傳承、補充與發展

### 1. 〈論說〉

〈流別論〉首先引《文心雕龍》對「論說」的定義：「論者，倫也；倫理無爽，則聖意不墜。」文中舉《論語》為例，弟子把孔子講的話正確而有條理的記下來，使古聖先賢的微言大義得以彰顯而不失墜，所以稱為「論」，其名稱起於《論語》之論說有序，此即《文心雕龍》所云：「蓋羣論立名，始於茲矣。」經論的《論語》開啟了宋儒的「語錄」體，這種語錄顯然不同於後代的論文。

接著，〈流別論〉立基於《文心雕龍》，以過半的篇幅討論「論」體，但仍然展現林紓個人的見地。

劉勰《文心雕龍》分別「論」的流品為八類，每類各有其體用，一是論政治的「議」、「說」，二是論經典的「傳」、「注」，三是論史的「贊」、「評」，四是詮文的「敘」、「引」。所謂「議」是論說適當，「說」是說話動聽使人悅服，「傳」是轉述師說，「注」是進行解釋，「贊」是說明意旨，「評」是評析道理，「敘」是次第交代事義，「引」是概括全篇文辭。這八種文體的名目雖然不同，但是總的來說，「議」、「說」是政論，「傳」、「注」是經論，「贊」、「評」是史論，「敘」、「引」是文論，這八類都是以論為本，所以「一揆宗論」<sup>1</sup>。

至於林紓〈流別論·論說〉，他認為論體包含廣泛，舉凡：「議政、議戰、議刑，可以抒己所見，陳其得失利病，雖名為議，實論體也。釋經文、辨家法、爭同異，雖名為傳注之體，亦在在可出以議論。至於正史傳後，原有贊評之格，述贊非論，仍寓褒貶，既名為評，亦正取其評論得失，仍論體也，不過名稱略異而已。且唐、宋人之贈序、送序中語，何者非論？特語稍斂抑。而文集、詩集之序，雖近記事，而一涉詩文利弊，議論復因而發。歐公至於記山水廳壁之文，亦在在加以憑弔，憑弔古昔，何能無言？有言即論。」他單抽出「說」體不講，但舉議、傳、注、贊、評、敘、引七品加以發揮，亦即任何文章一旦涉及議論，即可歸入「論」體。

原始表末、釋名章義之後，林紓評述了從先秦到魏晉的作家作品，像是莊子〈齊物論〉與王充《論衡》析理精微，而《呂氏春秋》六論各有篇目，不盡然是「彌綸羣言，研精一理」，這些論文除了能確立主旨以外，還能剖析事理。但是，林紓撇開《文心雕龍》提到的魏晉玄論而不講。

從政論來看，他十分讚譽賈誼〈過秦論〉<sup>2</sup>、陸機〈辨亡論〉<sup>3</sup>，說這兩篇是「有感而作」、「所見之確，所蘊之深」，吐辭屬篇，方能析理入微，臻

<sup>1</sup> 《文心雕龍·論說》：「詳觀論體，條流多品；陳政，則與議說合契；釋經，則與傳注參體；辨史，則與贊評齊行；銓文，則與敘引共紀。故議者宣言；說者說語；傳者轉師；注者主解；贊者明意；評者平理；序者次事；引者胤辭；八名型分，一揆宗論。」本文所引用《文心雕龍》的內容，一以張立齋，《文心雕龍註訂》（臺北市：正中書局，1981年）為準，因此不詳注頁碼。

<sup>2</sup> 〔梁〕蕭統編，〔唐〕李善等注，《增補六臣注文選》，（臺北市：漢京文化事業公司，1980年），第51卷，頁949-951。

<sup>3</sup> 同前註，第53卷，頁984-994。

於圓通之境。從史論來說，林紓以為，曹魏夏侯玄〈樂毅論〉、〈張良論〉似乎是寄託身世之作。東漢末史學家荀悅編撰《漢紀》30 卷，立意「勸善懲惡」，除有意通過東漢中興前一代歷史的評述，探究其成敗得失之契機，提供漢獻帝及其繼位者能夠借鑑，獲得振興漢室的啟示外，並在《漢紀》中撰寫大量論贊，約佔全書二十分之一篇幅，其中不乏佳作。這種秉筆直書作為殷鑑的贊評，截然有別於唐宋以後的論體文字，像是韓愈的〈諍臣論〉、〈顏子不貳過論〉過於直白少趣味；蘇洵父子的議論文字更是「逞聰明，執偏見，遂開後人攻擊古人之竅竇」；而王夫之《讀通鑑論》、《宋論》，則是批駁古人、不留餘地。林紓對唐宋以後逞才使氣、有失公允之「論」體，皆不首肯。

以上借由品評歷代作家作品的高下優劣，讓後學者取捨學習「論」體的法門。

有別於《文心雕龍》提到的「敘」、「引」是用在論文上，說明著作的旨趣或編次的條例、篇目次第，值得注意的是，林紓認為唐宋以後的贈序、送序、集序、詩序與雜記，只要是在作品中發表議論之語，都可以歸入「論」體，大陸學者張勝璋認為：「林紓以是否『議論』為『論說』體標準，以記敘『雜事』為『雜記』，實已經超越了古代文體主要以功能對象分類的範疇，與現代散文的分類(議論性散文、敘事性散文)具有相似性(自案：現代散文係以語言表達方式分體)。」<sup>4</sup>楊新平則認為，這是林紓注意到了文體間的相互滲透現象<sup>5</sup>，可以視為他對文體思想發展上的新貢獻。

其次，就「說」的體類言，《文心雕龍》係針對「上書善說」遊說之士的「說辭」，即「凡說之樞要，必使時利而義貞；進有契於成務，退無阻於榮身。」戰國遊說之士所說的言辭，稱為「說」，姚鼐《古文辭類纂·序》云：「戰國說士，說其時主，當委質為臣，則入之奏議；其已去國，或說異國之君，則入此編。」<sup>6</sup>與後世所謂「論說」之「說」是有區別的。

〔明〕吳訥《文章辨體序說》云：「說者，釋也，解釋義理而以己意述之也。」引韓愈〈師說〉為例，解釋師道之理<sup>7</sup>。〈流別論〉所提出的「訓經

<sup>4</sup> 張勝璋，〈論林紓的文體觀〉，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14 卷第 2 期(2008 年 4 月)，頁 291。

<sup>5</sup> 楊新平，〈林紓《古文辭類纂選本》及其文章學思想〉，安慶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30 卷第 6 期(2015 年 12 月)，頁 9。

<sup>6</sup> 〔清〕姚鼐輯，王文濡校註，《重校古文辭類纂評註》(臺北市：臺灣中華書局，1973 年)，頁 5。

<sup>7</sup> 〔明〕吳訥，《文章辨體序說》(臺北市：長安出版社，1978 年)，頁 43。

釋雅」、「發明至理」的「經說」與「近人闡明學理，亦曰學說」，「經說」與「學說」皆不離開解釋義理而自出己意。

林紓進一步談及「說」體在唐朝的發展，「獨昌黎之〈馬說〉，子厚之〈捕蛇者說〉，則出以寓言，此說之變體也。」雖然這兩篇也是引譬設喻、因事而發，但卻是借物事寄託人生意涵，迥異於正統遊說之士「說辭」之「說」，或解釋義理而述以己意，所以歸為「說」體的變體。

不管如何，「經說」、「學說」及「寓言之說」，補綴了劉、姚二家之不足，延續了「說」體在唐朝以後的發展。

本節最後以品騷韓、柳文高下做結：「〈馬說〉之立義，固主於士之不遇而言，然收束語至含蓄，子厚〈捕蛇者說〉，則發露無遺，讀之轉無意味矣。」為後學者指出寫作「說」體的竅門。

## 2.〈詔策〉

「詔策」在這裏與「史傳」一樣是個成辭，泛指帝王專用的各類詔令文告。到了漢朝，這種文書分成四種，〈流別論·詔策〉引用《文心雕龍》而稍稍改變少數文字，意思則完全一樣：「漢初定儀則，則命有四品：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戒敕。敕戒州部，詔誥百官，制施赦命，策封王侯。策者，簡也。制者，裁也。詔者，告也。敕者，正也。」

接著，〈流別論·詔策〉評述兩漢至明朝「詔策」文風的發展變化說道：「漢詔最為淵雅」，「魏文……詔書，……辭義偉然」，「晉武……詔敕所出，雅正當於政要」，晉明帝的「遺詔冲抑，江表為之感慟」。因為漢、魏、晉有專人起草詔書，詔策辭情並重，情采斐然。「六朝純以藻績勝矣」，影響所及，唐宋詔策多行駢文，「唐郁宋巧」是為特色。唐詔策推許唐太宗詔文為極品，舉其四詔〈節省山陵節度詔〉、〈答房元齡解僕射詔〉、〈答皇太子承乾詔〉與〈責齊王祐詔〉說：「咸真率無偽。」又節引宋詔多種，如宋太祖登極的大赦詔、宋仁宗賜范鎮獎諭詔、北宋隆裕太后詔、宋高宗幸明州詔、宋高宗復位大赦詔、宋高宗紹興親征詔，引用典故靈活貼切。至於陳腐的金詔與儉俗的明詔，都不值得一提，這段流變史大大補充了劉勰所不及見的部分。

文末總結「詔策」文體的寫作要領云：「鎔鑄經史，持以中正之心，出以誠摯之筆。」陸贄寫的詔書，連驕將悍卒也要為之色變，誰說官方文書，不能感人肺腑呢？<sup>8</sup>

<sup>8</sup> 陸贄為德宗起草了感動人心的〈奉天論赦事條狀〉，敘述即位以來，征師轉餉，疲卒勞民，以致兵變，罪責歸於自己。該詔書頒布後，前線將士感動的流下了眼淚，大

林紓對於《文心雕龍》做較大的修正是，《文心雕龍·詔策》認為「文景以前，詔體浮新。」而林紓本於姚鼐《古文辭類纂·序》：「漢至文景，意與辭俱美矣，後世無以逮之。光武以降，人主雖有善意，而辭氣何其衰薄也！」<sup>9</sup>認為：「漢文之詔，為尤動人」、「東漢明帝所降詔書，不及文帝精懇。」

此外，《文心雕龍·詔策》提到了帝王的詔告文書，因應下行對象與用途之殊，風格會有所不同。比如「授官選賢」，詔文要信實明朗。「優文封策」，詔文要如雨露般潤澤。「敕戒恆誥」，要像燦爛的群星吐出光華。軍事方面「治戎變伐」的文誥，要有雷霆一般的聲威。寬赦過失「眚災肆赦」的文誥，要像春天的露水一樣滋潤人心。對於明賞罰、正法紀「明罰敕法」的文誥，則要像秋天的嚴霜凜冽，這部分是〈流別論·詔策〉未曾關注者。

### 3.〈檄移〉

〈檄移〉是《文心雕龍》第二十篇，講「檄」、「移」兩種下行文書。「檄」，古代用於徵召、聲討，「移」則是曉諭官民的文書，《文心雕龍》與〈流別論·檄移〉都是以絕多的篇幅講檄文，移文只是簡略的論述。

〈流別論·檄移〉並未對檄文探源，開首即明示檄文的寫作要領：「必事昭而理辨，氣盛而辭斷」，敘事要明白清楚，氣勢壯盛、文辭果斷。進而引用《文心雕龍》檄文的名義說：「檄之為言皦也，宣露於外，皦然明白也。」所謂「檄」就是明明白白把問題給宣揚揭示出來。

林紓舉證代表作品解說，依然以《文心雕龍·檄移》從東漢到東晉的四篇檄文為主，並且節引部分文字進一步說明。隗囂的〈移檄告郡國〉文，責備王莽犯下「逆天、逆地、逆人」三大罪，所謂「逆人」之罪，係利用炮烙醇醢一類酷刑，燻燒陳良、終帶等 27 人，又在格殺謀反的大司馬董忠後，捉拿董忠宗族，「以醇醢毒藥、尺白刃叢焚并一坎而埋之。」<sup>10</sup>隗囂的檄文鮮明生動地描寫了王莽的兇殘形象，文字簡明嚴厲而能概括整體，讓人讀了莫不動容。陳琳有〈檄吳將校部曲〉與〈為袁紹檄豫州〉<sup>11</sup>兩檄，尤其後文最著名於當時，他用詳審之筆疏理曹操罪案，娓娓敘述中寄託嚴厲急切的意旨，「寓嚴切於暇豫之中」，可以說是文人檄文之最。林紓進一步以意象形容隗囂與

---

家都表示要竭力盡忠朝廷，叛軍將士紛紛倒戈，上表謝罪，唐室轉危為安，見〔唐〕陸贄著，〔宋〕郎暉註，《評註陸宣公集》（臺北市：臺灣中華書局，1970年），卷三，頁 22-23。

<sup>9</sup> 同註 6，頁 7。

<sup>10</sup> 〔劉宋〕范曄著，〔唐〕李賢注，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後漢書并附編十三種》（臺北市：鼎文書局，1994年），卷十三，隗囂公孫述列傳第三，「移檄告郡國曰」一段文字，頁 515-519。

<sup>11</sup> 同註 2，第 44 卷，頁 824-830、819-824。



陳琳的檄文，前者如「湍瀨奔瀉，一往無留」，後者是「長川大河，挹注不盡」。鍾會的〈移蜀將吏士民檄〉<sup>12</sup>，因為魏擁立不正，所以用歷史事實的成敗禍福告知蜀國，而避免以正義責備蜀國，取捨用筆非常好。東晉桓溫的〈檄胡文〉，文中用「胡賊」謾罵胡人石勒荼毒中原，行文激切。鍾文與桓文「一雅一激」，合乎夷夏大義，都是正統的檄文。因而總結檄文的寫作要領：「蓋不斥人之罪案，不見己師之出於有名，不張己之兵威，莫望壯士之進而殺敵；且證以天時，審以人事，辨興亡之理，論強弱之勢，此檄文之要領也。」

林紓接著舉梁朝吳均的〈檄江神〉，說它是借荒唐的想像，胡言亂語一通。梁元帝〈討侯景檄〉雖然文采不差，但是不直陳梁武帝駕崩、簡文帝被困與侯景兇殘等神人共憤的事實，反而誇張梁朝軍陣勇武，對於侯景失節又未加以評論，言辭支離破碎，欠缺真實性，凡此缺失，歸根究柢是「元帝本無性情」使然。隋煬帝〈江總檄〉，鋪張如尺牘，大壞了檄文的體制。

最後林紓引《文心雕龍·檄移》云：「植義颯辭，務在剛健」，檄文的寫作，無論確立意義或運用文辭，都必須堅強有力，轉而拈出「義憤公道」是檄文「剛健」的根本。

「移」文的部分，先引《文心雕龍》訓示名義：「移者，易也，令往而民隨者也。」移文對於官吏百姓具有指導變化的作用，依其功用，可以分文事與武事兩種。文事方面的移文佳作，如東漢劉歆寫的〈移太常博士書〉<sup>13</sup>。軍事方面的武移佳作，如西漢司馬相如的〈難蜀父老〉<sup>14</sup>、西晉陸機〈移百官〉，與陳朝徐陵的〈為護軍長史王質移文〉<sup>15</sup>、〈移齊文〉<sup>16</sup>。

至於南朝齊孔稚圭之〈北山移文〉<sup>17</sup>並非官方文書，文章借北山山靈的口吻，嘲諷了當時的名士周顒故作高蹈而又醉心利祿，「最瑰邁奇古，巧不傷纖，謔不傷正，雖非文移之正體，而文已足傳。」後來的文移，多出自文書小吏之手，按照庸俗的格式寫作，倒把移文的體制給搞砸了。這些都是《文心雕龍》移文所未論及的發展史。

#### 4. 〈章表〉

詔策、檄移和章表都是應用文書，惟前二者是下行文，章表則是上行文，

<sup>12</sup>即〈檄蜀文〉，同前註，頁 830-833。

<sup>13</sup>同註 2，第 43 卷，頁 811-814。

<sup>14</sup>同註 2，第 44 卷，頁 833-836。

<sup>15</sup>見〔陳〕徐陵著，許逸民校箋，《徐陵集校箋》（北京市：中華書局，2008 年），頁 381-389。

<sup>16</sup>同前註，頁 389-406。

<sup>17</sup>同註 2，第 43 卷，頁 814-817。

所以劉勰以「王者之言」與「臣子之作」分析言之。

林紓引《文心雕龍》，說明章表的名義與體用：「章者明也，表者標也。」「章以造闕，風矩應明；表以致禁，骨采宜耀。」把謝恩的「章」送到朝廷，風格應當明朗；把陳請的「表」呈上皇宮，骨力辭采應該顯耀。

林紓評述漢魏間章表的寫作成就，所引左雄、胡廣、陳琳、阮瑀、曹植、孔融諸人佳篇，大體同於《文心雕龍·章表》。然而林紓更重視創作技巧的提點，因此他引用《後漢書·左雄傳》云：「自雄掌納言，多所匡肅，每有章表奏議，臺閣以為故事。」<sup>18</sup>自從左雄執掌納言之任，對朝廷多有匡扶肅理，每次他上表章奏議，臺閣都把他的表章內容作為施政的成例。又引《後漢書·胡廣傳》云：「遂察孝廉。既到京師，試以章奏，安帝以廣(案：胡廣)為天下第一。」<sup>19</sup>證成《文心雕龍》云：「左雄奏議，臺閣為式；胡廣章奏，天下第一」，所言不假。

林紓以為左雄與胡廣的章奏，都是官方的應制文章，未必適合讓後人擬作效法。不過，左雄的〈日食進諫〉切直，胡廣上疏向順帝進呈，以籌策決定皇后的不宜，文章簡約得當，這兩篇都是不錯的作品。

接著引《文心雕龍·章奏》說，漢朝將這類上行文分成章、奏、表、議四品：「章以謝恩，奏以按劾，表以陳請，議以執異。」到了《文心雕龍》的時代，簡約成章奏、奏啟與議對三類。到了林紓的時代，「臣子之言」的上行文，一律使用「奏摺」，不過在「伸賀謝恩」的時候，仍然用「表」的格式。

文末，他比較古今奏議(案：林紓在這裡的奏議實則即章表)的不同：「古之奏議取直，今之奏議取密。」過去的奏議就是「循名課實」，「直者，任氣據忠，以所言達其所蘊；凡德不聰，僉王在側，亂萌政弊，一施匡正，一加彈劾，不能以格式拘，亦不必以忌諱避。」

清代奏議取「密」，「密」即是細微周到，「粉飾補救，俾無罅隙之謂；偶舉一事，上慮樞臣之斥駁，下防部議之作梗；故必再四詳慎，宜質言者，則出以吞吐，故作商量；宜實行者，則道其艱難，曲求體諒，語語加以騎牆，篇篇合乎部式：此安得有佳章表，如彥和所謂『雅義以扇其風，清文以馳其麗』者？」這是說清代奏議「粉飾補救」，不合乎《文心雕龍》所規範的：「循名課實」、「清文雅義」。

<sup>18</sup>同註 10，卷六十一，左周黃列傳第五十一，頁 2021-2022。

<sup>19</sup>同註 10，卷四十四，鄧張徐張胡列傳第三十四，頁 1505。

最後，〈流別論〉補充唐宋以後的章表，像是唐朝陸贄的「切實」、常袞的「典重」，以至於宋朝章表「雅趣橫生」，都是值得後學者留心的好作品。

### 5.〈書說〉

書即書信，〈流別論·書說〉首先引《文心雕龍·書記》，解釋「書寫」之「書」的含義：「書者，舒也，舒布其言，陳之簡牘，取象於夬，貴在明決而已。」《文心雕龍·書說》云：「三代政暇，文翰頗疏，春秋聘繁，書介彌盛。繞朝贈士惠以策，子家與趙宣以書，巫臣之遺子反，子產之諫子宣，詳觀四書，辭若對面。」劉勰把春秋時期這四封書信，當作是書信的起源。然而林紓卻採用姚鼐《古文辭類纂序·書說》的看法，「書」體開始於《尚書·君奭》周公即位輔政，召公懷疑周公的動機，周公對召公奭的解釋之文，把時間推得更早。後來列國大夫或者面告、或者書告，與「書者，舒也，舒布其言，陳之簡牘」的意思相近<sup>20</sup>，這一類的文書，劉勰叫做「書」，姚鼐叫做「書」、「說」。至於《文心雕龍·書記》中的「記」，劉勰統稱「奏記」，但是在林紓的時代已經不通行。

《文心雕龍》的「書」體，〈流別論〉稱為「與書」，〈流別論·書說〉詳細引《左傳·文公十七年》：「晉侯不見鄭伯，以為貳(有二心)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杜注：「執訊，通訊問之官，為書與宣子。」以為是「與書」一詞的發軔處。他如《左傳·成公十三年》，晉侯派呂相去斷絕和秦國的邦交，即有〈呂相絕秦〉的文書，雖然按照呂相的說法，秦國及其君秦桓公真的是十惡不赦，豈止斷交，就是亡國滅種都罪有應得，行文多有不實之處，然而讀者仍然了解文雅之道。子產的〈告范宣子輕幣〉，發生在《左傳·襄公二十四年》，句句真誠，又能引用《詩經》，是「與書」的上乘之作。

接著，林紓歷舉從春秋到清朝「與書」的文風，比如漢魏的代表作家作品各放異彩、文筆不拘一格：

觀史遷之報任安，足以見矣。……此書悲慨淋漓，蕩然不復防檢，極力為李陵號冤，漫無諱忌。……揚子幼(惲)之報孫會宗，意似湛于農畝，然過自標舉，所謂『酒酣耳熱，仰天擊缶而呼嗚嗚』者，皆盛氣語，凡身世不與相類者，競摹其作，適足增其枵響而已。揚子雲之報

<sup>20</sup>《古文辭類纂·序》云：「書說類者，昔周公之告召公，有君奭之篇。春秋之世，列國士大夫或面相告語，或為書相遺，其義一也。」同註6，頁5。

劉歆，則侈述作之事，措詞簡貴高厲，頗脫《法言》艱深之習，亦以劉歆績學，雄之報書不敢草草，故凌紙怪發，字字生稜。叔夜《絕交》，較楊子幼為直率，蓋子幼功名中人，退而治田，尚挾怨望；嵇康山野之性，不嗜膻仕，故摠懷而出，語至雋妙。以上四書，皆人人傳誦者。讀者領其氣，味其趣，各就性之所近，當生悟境。

此處論及司馬遷〈報任安書〉、楊惲〈報孫會宗書〉、揚雄〈答劉歆書〉、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等四篇書信，其評論結合作家身世，突顯出作家作品的個性特徵，如司馬遷之「悲慨淋漓」、楊惲之「過自標舉」、揚雄之「措詞簡貴高厲」、嵇康之「直率」及「山野之性」，皆掌握關鍵，較劉勰所論更為詳瞻切實，對後學「各就性之所近」把握適合自己的作家作品來師法，有相當程度的啟發。

在唐朝的作家中，韓愈有不少「與書」之作，如〈答胡生書〉，「伸縮吐納，備極悲涼」，卻未收入《古文辭類纂》中，林紓表示遺憾。

清初大老崇尚樸學，以「與書」來辨析學問、考訂故實，多長篇大論達千字之多，文章家沿用其體，甚至在書信中傾吐隱藏的心意，清朝的「與書」既成了「尋檢遺忘」之用，又不離乎「舒布其言」的本意，相較於「漢唐規律」有同有異。

林紓說：「大抵與書一定之體，果有所見，如先輩之析辨學問可也。至於指陳時政，抗論世局，或敘離棕，或抒積悃，所貴情摯而語馴，能駕馭控勒，不致奔逝，奮其逸足，則法程自在，會心者自能深造之也。」這是歸納歷代作家作品之後，指示後學創作書信的法則。

綜上所述，《文心雕龍》中「書記」的「記」，已經不應用於機關文書，因此，〈流別論〉採用《古文辭類纂》的論點與選文，不再討論，而僅發揮「與書」書信體。至於「說」一體，林紓認為應當歸入「論說」，已於「論說」一節縷析闡釋。

## 6.〈贈序〉

林紓引用《古文辭類纂·序》解釋名義與由來云：「老子曰：君子贈人以言。顏淵、子路之相違，則以言相贈處；梁王觴諸侯於范臺，魯君擇言而進，所以致敬愛陳忠告之誼。」<sup>21</sup>君子贈人以言，用來表達「敬愛忠告」的情誼，這是贈序的本意。最早出現的贈言事例，有春秋末年的顏淵、子路，戰國時代的

---

<sup>21</sup>同註 6，頁 6-7。

魯共公贈言梁惠王。然而唐初文家才開始以序題名作文贈人，後來蔚然成風。

接下來林紓引了陳子昂與李白的贈序，說他們因襲六朝形成的習慣，多用駢儷句法，諸如陳子昂〈別中岳二三真人序〉、李白〈與諸公送陳郎將歸衡陽序〉、〈金陵與諸賢送權十一序〉、〈送張承祖之東都序〉等皆然。

直到韓愈出，「贈送之序，美不勝收」，尤其〈送浮屠文暢師序〉與〈送廖道士序〉最難下筆。因為韓愈一生排斥佛老，不遺餘力，而寫贈序給佛老人士時，既能不失禮，又能站穩立場，真是不容易。林紓繼方苞之後，推崇韓愈的贈序文章冠絕當時，允為唐人第一。

〈送浮屠文暢師序〉<sup>22</sup>，第一段韓愈先為文暢開脫，說他是「墨名而儒行」，已在儒家門口，應該揮手鼓勵他進門；佛教又是來自夷狄，不識儒家文化，所以要邀請他進門。接著說：「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因為聖人的仁義禮樂刑政代代相傳而「免為禽獸」。然而文暢既為浮屠「孰為而孰傳之邪？」文暢既不得聖人之傳，自然是禽獸，又用「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邪？」從禽獸中救出文暢；然又不願與文暢同等，仍斥文暢為不知聖人之仁義禮樂刑政，文末以「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再為文暢開脫，讓文暢喜愛此文而不以為忤。林紓的評注說：「不知昌黎胸中，蘊何智珠，有此等絕大之神通！」

〈送廖道士序〉<sup>23</sup>，文自地靈「五嶽於中州」拔起，至「千尋之名材，不能獨當也」止，200餘言作一氣而下。想廖道士讀到「不能獨當」句，必謂已足以當之。「意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一段引出「人傑」，似乎扣緊廖道士說，然而「又未見也」把高帽子收回了。「其無乃迷惑溺沒於老、佛之學而不出邪？」似又在廖道士身上，留下一線生機；「若不在其身，必在其所與遊」，若不是他本人，則一定在他所交遊的人。繞了老半天，始終不肯將「人傑」這頂高帽子給廖道士戴上。忽而欲戴，忽而收回，反覆變化，逗得廖道士團團轉，然而，廖道士「亦歡悅捧誦而去」，林紓評此為：「神品之文」。《韓文研究法》說：「此在事實上，則謂之騙人；而在文字中，當謂之幻境。」<sup>24</sup>

其他如歐陽修、曾鞏、王安石、蘇洵、蘇軾與蘇轍，也都有贈序的佳作，但是因為姚鼐「盛推昌黎」，所以林紓僅舉韓愈的贈序加以解說評論。

<sup>22</sup>韓愈，《韓昌黎集·文集》（臺北市：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年），頁147-148。

<sup>23</sup>同前註，頁150。

<sup>24</sup>林紓，《韓文研究法》，收入王水照編，《歷代文話》（上海市：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7冊，頁6459。

林紓說，「壽序」是近代蔚起的一種文體，過去沒有，應當歸入「贈序」類，朋友之間祝福長壽，「舉一二事，足以為壽徵，衍而成文。」明朝歸有光創作了相當多的壽序。

贈序由最初是贈別詩的附屬文字，發展到脫離贈別詩而獨立成文，從最初的偏重交際性、抒發類型化的離情別緒，轉而偏重表達獨特性的見解。唐宋文人「贈序」已然從贈詩詩集中獨立出來，成為一種特殊文體，其性質與用途已遠離「序跋」類，而接近「書牘」類了。

### 7.〈雜記〉

《文心雕龍·書記》所討論 6 類 24 種雜文，原來沒有「雜記」一名，至姚鼐《古文辭類纂》才獨立出「雜記」一類，林紓沿用姚選之體，並引《古文辭類纂·序》云：「碑主於稱頌功德，記則所紀大小事殊，取義各異。」<sup>25</sup>說明雜記類包括了「傳狀」與「碑誌」以外的一切記敘文。

姚鼐認為，雜記原來是「碑」的一類，但是碑主於伐功銘石，有序有銘詩；記則紀一切事，而不一定要刻石。祠廟、廳壁、亭台一類雜記文，如柳宗元的〈永州韋使君新堂記〉是刻石的，不刻石的則如山水遊記一類。

柳子厚紀事小文，或謂之序，然實際是「記」一類，比如〈陪永州崔使君遊宴南池序〉、〈序飲〉、〈序棋〉等皆然。

林紓以為，「記」權輿於王羲之〈蘭亭集序〉與李白〈春夜宴桃李園序〉，標題雖是序，實則也是記文。「雜記」類依其體例可以分成六類，內容頗為駁雜：

(1)記勘災、濬渠、築塘、修祠宇、記亭臺：前三者「必舉有益於民生者」，遣詞造語要莊重嚴實。記祠宇，在於表彰神靈與官宦的事蹟、德行。記亭臺，或者感念今昔的人事、或者稱揚主人，風格要「高情遠韻」。

(2)記書畫、古器物：類似於寫在字畫或碑帖等後面言簡意賅的文字，這類雜記的性質近於跋文，多屬評介、鑑定或考據等。林紓以韓愈〈畫記〉為例，〈畫記〉的寫法脫胎於《周禮·考工記·梓人職》，從得畫、惜畫，與二三客論畫、觀畫，趙君自述不能摹畫，韓愈雖然很喜愛這幅畫，但是又被趙君惜畫之情所感動，因而贈畫趙君，記下此畫的事情原委。文章內容質樸，寫得很生動，雖是記體文章仍有抒情性的內容，故而末段的深刻情感，使本文能夠受到肯定，所以，林紓譏俏「後人仿效，雖語語皆肖，究同木偶。」

(3)記山水：林紓以為，唐朝柳宗元山水之作「古麗奇峭」在韓愈之上，

---

<sup>25</sup>同註 6，頁 11。

以其「精於小學，每下一字，必有根據，體物既工，造語尤古，讀之令人如在鬱林陽朔間，奇情異采，匪特不易學而亦不能學。」宋朝歐陽修的山水之作改變前人風格，在舒徐的筆調中，「多作弔古歎逝語」。

(4)記瑣細奇駭之事：不能入正傳者，名之曰「書某事」，如方苞〈逆旅小子〉，描寫逆旅小子受其叔父虐待致死，譏責民俗澆薄與官吏怠忽職守。袁枚〈書馬僧〉寫一個盜馬賊因為岳鍾琪將軍的獨具慧眼，成為年羹堯將軍旗下一員，並在征西藏中起了關鍵作用，文章敘述充滿傳奇色彩。這兩篇接近小說，但非記事體，所以標題為「書」。

(5)學記：為說理文，雜記當中以學記最不容易書寫，作者必須「湛深經學儒術」，才能言之成理，比如宋朝王安石與曾鞏經術根柢深厚，專長此類。

(6)記遊讌觴詠：不管是單篇專記遊讌觴詠之事，或互相酬答的作品皆屬之。通常冠首篇者，也稱之為序。

簡單來說，「雜記」的題材，包含勘災、濬渠、築塘、修祠宇，記樓臺、書畫、古器物、山水、遊讌觴詠、瑣細奇駭之事與學記。

## 8.〈序跋〉

「序跋」本是用來陳述著作的旨趣、經過，或是對他人著作的介紹。一般而言，序在書前，跋在書尾，合稱為「序跋」。〈流別論〉於本節開端先引《古文辭類纂·序》云：「序跋類者，昔前聖作易，孔子為作繫辭、說卦、文言、序卦、雜卦之傳，以推論本原，廣大其義。詩、書皆有序，而儀禮篇後有記，皆儒者所為。其餘諸子，或自序其意，或弟子作之。莊子天下篇、荀子末篇，皆是也。」<sup>26</sup>說明「序」體的本義與起源。以儒家而言，經序是為了擴大解釋經書的義理；春秋時期諸子的序，有自作與代作的序兩種。

《文心雕龍·論說》的「敘引」接近「序跋」，明代文體家吳訥、徐師曾分「序」、「跋」為兩體<sup>27</sup>，姚鼐則合為一門曰「序跋」，而《古文辭類纂》選文以序文居多，並未出現「跋」名之文，至多為「●●●傳後」或「●●●集後」，而林紓在「序跋」一節的解說，又分成兩類文體：「序古書、序府縣志、序詩文集、序政書、序奏議、族譜、年譜、序人唱和之詩，歸入序之一門」；「辨某子、讀某書、書某文後、傳後論、題某人卷後，則歸入跋之一門。」簡言之，冠在文(書)前者曰「序」，附於文(書)後者曰「跋」。

<sup>26</sup>同註6，頁2。

<sup>27</sup>吳訥，《文章辨體序說》(臺北市：長安出版社，1978年)，頁42、45；徐師曾，《文章明辨序說》(臺北市：長安出版社，1978年)，頁135、136。

林紓認為各種序當中，以「書序」最難制作。因為作者必須對所序之書與著作者了解透徹，方能把握精華，言語切中要旨。但是常人不能兼備眾長，難以面面俱到，假使人以非其相關專長求序，作序者往往流於表面，無法達到精微。因此平時博覽旁涉，「凡求序之書，尤必加以詳閱，果能得其精處，出數語，中其要害」，那麼求序者就會心意滿足。

比較「贈序」與「書序」：贈序為人而寫，或意在送別或贈人以言。書序為書、詩文集而寫，重在評介。

〈流別論〉選擇名家名篇介紹的部分，主要還是來自《古文辭類纂》的選文再加以簡評，如歐陽修長於序詩文，曾鞏史傳目錄之序：《新序目錄序》、《列女傳目錄序》、《徐幹中論目錄序》等很有條理，王安石：《周禮義序》、《詩義序》、《書義序》等經序的文字精要。

序政書與奏議等官府文書不容易作，尤其是為子史作序，作序者要兼備本領、興趣、掌握關鍵等三者，否則就會變成勉強湊數，這也是當時作家常犯的過失。

至於跋文，為金石、書畫作跋最難，皆需學問。金石跋必「考據精實」；書畫跋須考證「收藏之家」，詳審來自那個流派。

林紓最後總結〈序跋〉的創作原則是：「序貴精實，跋貴嚴潔，去其贅言，出以至理，要在平日沉酣經史，折中以聖賢之言，則吐詞無不名貴也。」大抵而言，「序」、「跋」的寫作以精實明白為要，「跋」文尤其較「序」文來得簡潔。

### 三、結論

《畏廬論文·流別論》的文體研究，主要承續《文心雕龍》文體論的範疇與架構，又吸收明、清的文體論思想，結合六朝以後文體的發展流變，探究文體的源流、名義、功能、風格與創作規則等等，通過對前人文體論著述的整理、辨析、補充，名家名篇的評論，自覺地建立一簡約式的古代文體的分類與批評史。

值得一提的是，林紓在〈流別論〉中不僅借鑒了前人的寫作方法及精華，更將其終生所學與領悟加以歸納分析；又對同一文體文章史上氣體各異、面貌差殊的代表性作家作品予以品評，彰顯其價值、裁定其優劣，不但方便後學者決定取捨，更指示了如何就相近氣質的作家學習效法。簡單地說，從創作與鑒賞當中傳承古文，這是林紓〈流別論〉有別於前此文體論之處，也可以說是他個人文體論的重大特色。

「論」體乃確立主旨、剖析事理，《文心雕龍》分敘政論、經論、史論、



文論等八成品論體，林紓則主張凡是在作品中發表議論，不拘其應用的功能對象，都算是「論」體。「說」體按照《文心雕龍》與《古文辭類纂》都是指面告或書告的「說」辭，但是明朝吳訥鑒於唐朝以後即事即理的「說」體文章出現，諸如韓愈〈師說〉、柳宗元〈天說〉、蘇洵〈名二子說〉、蘇軾〈稼說〉，都是解釋義理而述以己意的「說」體，林紓進而拈出「經說」、「學說」，且提出「寓言之說」是「說」的變體。

「詔策」、「檄」、「移」都是下行文，惟「詔策」泛指古代帝王專用的各類詔令文告，「檄」主要用在軍事聲討，「移」則是曉諭官民、使其改變的文書。〈流別論·詔策〉歷舉「詔策」一體從兩漢到元明風格的變化，非常精到。又根據《文心雕龍》列舉了漢晉的四篇檄文詳細解說，進而點出檄文的寫作要領，較諸《文心雕龍》更為具體詳實。又補充了失敗的檄文作品，反覆說明。至於移文，〈北山移文〉雖然不合乎訓令官民的本義，但是文章「瑰邁奇古」，自成一絕。

《文心雕龍》中臣子上言的「章表」，到《古文辭類纂》歸入「奏議」，林紓則曰：「奏摺」。〈流別論·章表〉補充說明古今製作章表在用心與風格上的差異處。

〈流別論〉的「書說」一體偏重「與書」，即「書信」而言，凡是書信往來，都歸入「書說」體；至於「說」一體，林紓認為應當歸入「論說」。

「贈序」、「序跋」與「雜記」盛行於唐宋以後，前二文體皆有社交應酬上的功能，但是「贈序」偏重在贈人以言，「序跋」傾向對書、詩文集或金石書畫的評介。「雜記」則涵蓋一切記敘性的文章，與「論」體皆以語言表達方式來分類。

簡言之，〈流別論〉的文體分類法，大部分沿用以往的文體論以文體應用的功能對象做區分，但是少部分文體轉向以語言表達方式來類分，可以視為現代散文分類方式的先驅。

然而，〈流別論〉辨體的部分還是有淆亂之處，比如「學說」與「學記」、「記金石書畫古器物」的「記」與「金石書畫」的「跋」，夾雜不清；「書說」其實指書信體，與「說」體無涉。

其他像「序跋」、「雜記」等文體，沒有標舉名家名作詳加評析，也沒有細探其流變軌跡，可說是美中不足之處。

**參考文獻**(以作者筆畫順序遞增排列)

## 一、書籍

- 王水照，《歷代文話》(上海市：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 年)
- 朱任生編，《古文法纂要》(臺北市：台灣商務，1984 年)
- 朱義胄，《林琴南學行譜記四種》(臺北市：世界書局，1961 年)
- 吳承學，《中國古代文體學研究》(北京市：人民出版社，2011 年)
- 吳訥，《文章辨體序說》(臺北市：長安出版社，1978 年)
- 林紓，《畏廬論文等三種》(臺北市：文津出版社，1978 年)
- 林紓，《韓柳文研究法》(臺北市：廣文書局，1964 年)
- 林紓著，朱義胄述編，《畏廬續集》，收入《畏廬文集，畏廬續集，畏廬三集，畏廬詩存，春覺齋著述記，貞文先生學行記，林氏弟子表》《民國叢書》(上海市：上海書店，1992 年)，第 4 編，94 冊
- 姚鼎輯，王文濡校註，《重校古文辭類纂評註》(臺北市：臺灣中華，1973 年)
- 范曄著，李賢注，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後漢書并附編十三種》(臺北市：鼎文書局，1994 年)
- 徐師曾，《文章明辨序說》(臺北市：長安出版社，1978 年)
- 徐陵著，許逸民校箋，《徐陵集校箋》(北京市：中華書局，2008 年)
- 班固著，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漢書》(臺北市：鼎文書局，1979 年)
- 馬德翠，〈林紓的古文理論〉，長江學術，2012 年 2 期
- 張立齋，《文心雕龍註訂》(臺北市：正中書局，1981 年)
- 陸機，《陸士衡文集附札記》(臺北市：藝文印書館，1966 年)，
- 蕭統編，李善等注，《增補六臣注文選》，(臺北市：漢京文化事業公司，1980 年)
- 韓愈，《韓昌黎集》(臺北市：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 年)

## 二、期刊論文

- 顧農，〈劉勰的文體論〉，《阜陽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 年第 6 期
- 張弘韜，〈別具特色的「韓學」研究--林紓及其《韓文研究法》與《春覺齋論文》〉，《周口師範學院學報》，第 33 卷第 4 期(2016 年 7 月)
- 張勝璋，〈論林紓的文體觀〉，《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14 卷第 2 期(2008 年 4 月)
- 楊新平，〈林紓《古文辭類纂選本》及其文章學思想〉，《安慶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34 卷第 6 期(2015 年 12 月)
- 王楊，〈林紓古文論的「承」與「變」〉，《滁州職業技術學院學報》，第 10 卷第 2 期(2011 年 6 月)

## 明代江西的書院藏書

陳冠至\*

### 【摘要】

書院藏書，是中國古代藏書事業的四大類型之一，自唐末、五代迄清季，上下貫串，歷時千載，不但時空跨度大，影響層面亦廣。特別是明代江西書院的建設及藏書、刻書事業的發展都頗有建樹，號稱文獻之邦。然而，明代書院藏書的規模較諸當時的內府和私人藏書，顯得相形見絀。儘管如此，由於明代江西的書院藏書仍然具有一些特色和創新之處，即便規模不大，卻很著重於實用、豐富等收藏目的，再加上講究日常的管理與維護，並重視編製藏書目錄等工作，綜合起來，對於明代整體藏書事業的促進、區域人才的培養、科舉及學術推廣等諸多方面的貢獻，都產生了許多不容忽視的歷史作用。對此，本文蒐羅史載有關明代江西書院藏書的整體發展歷程，並以白鹿洞等本地書院作為主要觀察對象，除進行時空背景的剖析外，亦關注於藏書內容、管理、發展及歷史影響等諸多面向的探索，期盼能夠略窺明代江西書院藏書事業的一些真實樣貌。

關鍵詞：藏書、江西、書院、明代

A Study on Book Collection Activities of Jiangxi Private Academies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Kuan-chih Chen\*

### 【Abstract】

Collection of books in “academy”(書院) was one of the four main categories of the ancient Chinese library collections, from the late Tang, Five Dynasties until the Qing Dynasty. Down throughout thousand years it influenced greatly and covered a wide range time span. However, the collection of books in Ming academies is poorer than the collection of books in imperial storehouse and in private. Nevertheless, collection of books in Ming's academies still had many characteristics and innovations.

---

\*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進修學士班副教授

\* Department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New Taipei, Taiwan

Although book collection of academies were small-scale, but because of widespread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focused on practical application, emphasized on daily management, catalogued books in academies, and so on, those caused the promotion and circulation of the library collection in academies in the Ming Dynasty. It also generated a lot of influence on the area of personnel training, imperial career or academic promotion, etc. Particularly since Tang and Song, Jiangxi was known as the humanities town, and quite prestigious in construction of academies as well as library collection. Consequently,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overall academy book collection development in Jiangxi of the Ming Dynasty, by the famous example of “Bailu academy”(白鹿洞書院), in addition to understand and explore the background, but also concerns about the collection's content, management, development, the historical role and influence, et al.

Keyword: book collection; Jiangxi; academy; Ming dynasty

## 一、前言

江西素負「物華天寶、人傑地靈」盛名，號稱「文章節義之邦」，特別是宋、明兩代乃至清朝乾嘉時期，江西尤為全國社會經濟與教育文化皆高度發達的地區之一，可謂文風斐然，人才濟濟，對中國的政治與文化影響很大。所以，對於江西歷史人物的研究，不僅是研究歷史人物本身的問題而已，更是研究中國歷史、江西歷史，且進一步地有助於營造今日生活文化的一個重要命題。<sup>1</sup>

江西地處偏隅，歷來戰禍較少，社會相對穩定，有利於發展文化事業。同時，自宋以來，江西即是造紙與雕版印刷的重鎮，尤其是廣信府於明代中期，造紙業的發展達到空前盛況，以轄下之玉山、鉛山、永豐、上饒等四縣所產製的紙張特別著名，甚至當時宮庭的用紙，大多是由這四縣的槽戶承造的。<sup>2</sup>基於如此，使得明代江西的私人藏書事業鼎沸盛極，成為江西古代藏書

---

<sup>1</sup> 陳榮華、陳柏泉、何友良，《江西歷代人物辭典》(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前言，頁 1。

<sup>2</sup> 王安春，〈明代江西廣信府的造紙業〉，《上饒師範學院學報》第 4 期(2001.9)，頁 66。

史上的一段黃金時代，也是贛文化發展的輝煌時期。<sup>3</sup>

至於書院事業，自唐代以降，中國古代書院的發展即有官辦與私營之別，歷宋元而益發盛行，知名天下的書院相繼不斷地出現。明代建立後，太祖非常注重學校教育，以致當時中央與地方的各級學校莫不管理嚴格。當時中央的國子監，學生的待遇好，出路優，廣為士林推崇；而地方上府、州、縣的各級學校，也是如此。譬如江西的書院，從明初仁宗時期開始，便在地方官員們盡心奉行朝廷的興學政令下，逐漸復興了起來，不但使得當地仕紳與鄉民們紛紛響應，<sup>4</sup>也讓本地的書院帶有深厚的官方或公營色彩。

## 二、明代政治、文化背景對江西圖書事業發展的影響

明祚肇建，社會剛從大動亂中徐徐甦醒過來，太祖朱元璋(1368-1398)亟待恢復統治秩序，重建倫理綱常，以鞏固新的統治政體。他深信集儒家學說大成的程朱理學，對於維護封建綱常、鞏固集權統治、箝制萬民思想上，具有特殊的功效，於是力圖透過教育的手段，讓皇權思想深入人心。他認為學校不僅是官僚人才的養成所，也體認到教育對強化極權專制與封建社會秩序的重要性，遂全力促成各地教育事業的普及和發展。<sup>5</sup>元至正 16 年(1356)，時太祖甫攻下金陵，就先把當時集慶路的儒學改為國子學，以安撫知識份子。洪武 2 年(1369)，更通令全國各地都必須設立學校，諭曰：

朕惟治國以教化為先，教化以學校為本。京師雖有太學，而天下學校未興。宜令郡縣皆立學校，延師儒，授生徒，講論聖道，使人日漸月化，以復先王之舊。<sup>6</sup>

當時除了南京有國子監外，太祖更將國學的精神與功能推行到全國，通令地方各級政府都要仿照京師國子監的規格來興辦地方學校。為了遵奉朝廷的旨令，許多宋元時期存留下來的私人書院，此時都被地方政府收編，改成官辦的儒學，使得書院與學校的概念十分混淆。例如江西廣信府弋陽縣儒學，據《嘉靖·廣信府志》載：

弋陽儒學，舊為「藍山書院」，宋季疊山先生謝君直(謝枋得，1226-1289)

<sup>3</sup> 張來芳，〈江西古代藏書家〉，《中國典籍與文化》第 2 期(1999.5)，頁 23-25。

<sup>4</sup> 李才棟，《江西古代書院研究》(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頁 272-286。

<sup>5</sup> 萬明，〈朱元璋的教育思想與明初的教育發展〉，《安徽史學》第 4 期(1994.10)，頁 16。

<sup>6</sup> (清)張廷玉，《明史》(《百衲本二十四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卷六十九，〈選舉一·學校〉，頁 13 上。

所建；元張純仁讀書其中，後罹兵燹，書院遷於弋陽。國朝洪武初，詔天下郡縣皆立李造士，書院遂改為今學也。……藏書有室而簡冊崇。<sup>7</sup>

當然，要辦學就離不開知識份子，更離不開圖書，這就使得太祖不得不同時也特別注重各地圖書事業的發展。<sup>8</sup>

另一方面，明初的江西文壇既承襲宋、元以來的理學緒餘，又受到當時政治、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影響，於是產生了許多變化，最顯著的特徵，就是原本聲勢浩大的吳、越文人群體相繼走向落沒，反之典雅淳樸的江西文風，始引領全國的文學風氣，進而成為文壇上的主流勢力。<sup>9</sup>另一方面，透過明代人才的地理分布狀況，也可瞭解到江西士習與文化水準之高。先以《明史》各地區入傳人物的多少比例進行分析，一共收錄了 3,472 人的傳記；然後依傳主的籍貫區分，由多至寡依序為浙江、江蘇、江西三省，江西排名第三，共記載了 385 位。若再以《明儒學案》收錄的明代學術人才來看，江西更是高居第一，達 53 人之多。<sup>10</sup>由於江西地處長江中下游，獨特的地理環境和人文歷史，孕育出內涵豐富且具濃郁地方特色的江西文化，在明代更產生大批經由科舉入仕的江西文人，他們學識淵博，才華洋溢，形成明代江西文學人才濟濟的局面，<sup>11</sup>其為官人數之眾，居全國之前列。<sup>12</sup>

當然，文學成就的卓越，自當與本地圖書事業的發達息息相關；而刻書的興盛與否，往往也是圖書事業發展的重要基礎與指標。擁有豐富原料與純熟技術的江西地區，刻書事業歷元至明，獲得高度的開發，於雕板工藝或裝幀等技術面上，都具有相當高的水準，成為江南刻書重鎮之一。例如萬曆年間，在南京享有盛名的刻書世家周氏和唐氏，其實都是從江西撫州府金谿縣遷往南京的，然後再利用南京的成功經驗，轉而推廣提昇回故鄉，在金谿縣和袁州府的宜春縣開設分號。由於周氏家族和唐氏家族在出版業的巨大影

---

<sup>7</sup> (明)費案等，《嘉靖·廣信府志》(《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45，上海：上海書店，1990)，卷十一，〈書院·弋陽縣儒學〉，頁 17 下-18 上。

<sup>8</sup> 文毅，〈明代私人藏書興旺原因及特徵〉，《黔南民族師專學報》第 2 期(1999.3)，頁 99。

<sup>9</sup> 唐朝暉、歐陽光，〈江西文人群與明初詩文格局〉，《學術研究》第 4 期(2005.4)，頁 141-145。

<sup>10</sup> 陳國生，〈明代人物的地理分布研究〉，《學術研究》第 1 期(1998.1)，頁 55-58。

<sup>11</sup> 劉鳳、敖江彬，〈明代江西地域文化的特徵及其成因分析〉，《成功》第 9 期(2007.9)，頁 148。

<sup>12</sup> 曹國慶，〈明代江西科第世家的崛起及其在地方上的作用〉，《中國文化研究》第 4 期(1999.11)，頁 54。

響，透過他們於家鄉開設書坊分部的行為，除了帶回南京卓越的經營與生產技術，均衡城鄉差距外，同時更促進了在地刻書業的活絡。<sup>13</sup>總括地說，江西刻書事業實際上是起於宋而盛於明、清的，主要刻書地涵蓋六府，即南昌府、吉安府、撫州府、贛州府、廣信府、袁州府等處。<sup>14</sup>

綜上所述，由於明代政府積極辦理學校教育、區域文學社群領先全國，以及刻書事業發達等多重因素的交互影響下，使得明代江西的人才濟濟，名震天下。不過，經濟固然是社會發展的基礎，而經濟與人才之間，仍然需要教育、士習、學風等條件的配合，才足以推動區域性的文化特徵或風氣。<sup>15</sup>書院既然是明代江西人才的淵藪，因此，書院藏書所發揮的影響力，其重要性自當不可輕忽。

### 三、明代江西書院藏書事業的發展特質

雖然中國古代書院與地方學校的教育功能類似，但是在書院的起源與最初的設立宗旨上，卻與歷朝統治者為教化百姓與推行科舉的目標有所不同，反倒是與私人藏書活動關係密切。書院的肇始，可追溯自漢代的「精舍」或「精廬」，當時為學者聚集生徒、私家講學的場所。只是不論「精舍」或「精廬」，受限於當時圖書生產技術水準較低，皆以口授手抄為課堂的進行方式，以致較不具備藏書的條件。至於「書院」這個名稱，實際上出現於唐代。隨著紙張的大量使用和雕版印刷術的發展，書籍數量越來越多，講學場所也必須建造較大的建築物來存放書籍，以利講者與學子們閱讀與論學之用，於是產生名符其實的「書院」。元代文人歐陽玄(1273-1357)曾經指出：

矧夫書院與學校之制，其始又自不同。東漢以來，大夫士往往作精舍於郊外，所謂「春夏讀書、秋冬射獵」者，即其所也。唐、宋之世，或因朝廷賜名、賜書，或以故家積書之多，學者就其書之所在而讀之，因號為「書院」。及有司設官以治之，其制遂眡學校。<sup>16</sup>

可見書院的出現，實際是奠基於私人藏書活動的基礎之上。然而，在書院的

<sup>13</sup>文革紅，〈江西小說刊刻地—「雲林」考〉，《明清小說研究》第1期(2010.2)，頁218。

<sup>14</sup>王咨臣，〈江西最大的刻書作坊—潯陽書鋪街〉，《江西圖書館學刊》第2期(1992.7)，頁74。

<sup>15</sup>胡兆量、黃恩涌、韓茂莉，〈中國人才地理特徵〉，《經濟地理》第1期(1998.3)，頁12-13。

<sup>16</sup>(清)趙之謙等，《光緒·江西通志》(《中國省志彙編》4，臺北：華文書局，1967)，卷八十一，〈書院一·南昌府·貞文書院〉，頁10下。

發展歷程上，也因主辦者的不同，形成了官辦與私辦兩種類型。由於藏書是書院的重要內容和特徵，深深影響著古代的學術、文化與教育發展，因此，書院藏書，便成為中國古代藏書的一種重要型態，與官府藏書、私人藏書、寺院藏書並列，為中國古代藏書事業的四大支柱。書院既以擁書講學為務，無書即不成書院，所以，歷代書院都十分重視書藏的建置，皆以藏書充棟為目標，只是因環境和條件的不同，造成各家書院藏書規模產生差異。總之，書院藏書是書院教育成敗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而書院教育事業的興衰，也正與書院藏書事業的盛衰息息相關。<sup>17</sup>

一如唐宋，許多明代江西書院的起源，原本也都是為了藏書以供人閱讀。成化 21 年(1485)，撫州府知府周瑛(1430-1518)創辦「臨汝書院」，就是為了滿足自我的閱讀欲望。他說：「予初到官，嘗縮稍入為讀書屋於私第西南偏，既又為小屋以庋書，及因地之窪而池之以滌筆硯，創畫多時，名號未備。至是，題讀書屋曰：『臨汝書院』，池曰：『浴雲池』，改小屋為『續騷亭』。」<sup>18</sup>周瑛雖然將讀書與藏書的場所分開，然觀其自述藏書是為了讀書，因此，藏書樓「續騷亭」自然是臨汝書院的一個重要組成部份，而臨汝書院的成立，自然也與藏書活動相輔共生。

到了嘉靖 12 年(1533)，又有南安府大庾縣的名宦劉節(1476-1555)，號梅國，官拜刑部侍郎，「疏乞致仕，詔從其請，年五十有八爾。公歸，立義館，延塾師以訓族；構書院，貯羣籍以授徒。」<sup>19</sup>這個書院，就是當地提學官陶某於劉節致仕歸里後為其建立，並以劉節之號為名，稱為「梅國書院」，由劉節負責管理。據《嘉靖·南安府志》載：

梅國，司寇劉先生別號也。書院在府治之西北，距城里許。嘉靖改元十有二年，先生致政家居，講學授徒，以斯文為己任。都憲南川陶公為創書院，以宗厥學。……先生治書院，尊道有堂，藏書有樓，我皇上所賜御製，及平生所有經史子集，與手所編輯諸書，以至老佛玄要、禪悟合理之言，各浩瀚充棟，可謂宏博矣！<sup>20</sup>

<sup>17</sup>蕭東發、鍾洪、王波，〈中國古代書院藏書概論〉，《圖書館》第 1 期(2001.2)，頁 70-71。

<sup>18</sup>(明)黎喆等，《弘治·撫州府志》(《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47，上海：上海書店，1990)，卷七，〈公署一·廨舍〉，頁 13 下。

<sup>19</sup>(明)焦竑，《國朝獻徵錄》(《明代傳記叢刊》111，臺北：明文書局，1991)，卷四十六，黃佐〈通議大夫刑部右侍郎雪臺劉公節神道碑〉，頁 66 下。

<sup>20</sup>(明)劉節，《嘉靖·南安府志》(《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50，上海：上海書店，



至於梅國書院的藏書樓，名為「御書樓」，在梅國書院，藏御賜及頒降諸書，并經史子集諸書。」<sup>21</sup>劉節曾經為「御書樓」編撰藏書目錄，將所藏分為：「御製」（15部）、「制類」（12部）、「經類」（56部）、「史類」（62部）、「子類」（30部）、「類書類」（39部）、「文類」（28部）、「奏議類」（6部）、「詩賦類」（45部）、「集類」（72部）、「字書類」（26部）、「志類」（67部）、「雜類」（42部）等十三類，一共包含了500部圖書，鮮少重複。若以部數多寡來看，由於「御製」與「制類」多為朝廷頒贈，故部數較少，其餘依序為「集類」、「志類」、「史類」、「經類」、「詩賦類」、「雜類」、「類書類」、「子類」、「文類」、「字書類」、「奏議類」。其中，以「集類」部數最多，即東漢末至明朝歷代諸儒的文集，且以明儒之文集居大宗。此外，僅「御製」類於每部之後載明卷書，其餘則標注部數而已，且序文過於簡略，以至分類不甚嚴謹，例如將《呂氏春秋》、《越絕》、《高麗圖經》等書，併入「雜類」等。雖然如此，仍可看出梅國書院的藏書之富，及其收藏特色。例如梅國書院收藏大量全國各地的方志，或是完全沒有說部書籍等。茲整理劉節所撰書目於文末附錄，以備讀者參考。

一般書院的藏書具有很強的共同性，表現在館藏上，便是以經史類典籍為重心；至於在板本上，也以通行本為大宗。<sup>22</sup>然而，明代江西書院的藏書卻稍異於他省，表現出區域與時代風格，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藏書種類十分廣泛。由於江西自明初以來，在文壇上便保持著優良的區域文學傳統，加上理學興盛，故終明之世，一直以文獻德化而聞名天下，學術研究風氣特盛。誠如梅國書院便收藏很多的明儒文集與方志，顯現其不隨流俗，反樸歸真的區域藏書風格。時人湛若水(1466-1560)曾經作詩稱讚前述梅國書院的藏書之富，詩云：「樓外堂前沼引溪，樓中充棟青雲齊；半年恭默開群籍，學禮無寧但學詩。」<sup>23</sup>而其中「學禮無寧但學詩」，即隱喻當時梅國書院不以科舉為進學修業的目標。

有別於當時全國的儒學生員群體多以追求科舉功名為要務，江西書院的學術研究性質則顯得突兀，成為地方辦學的一項特色，梅國書院便是一例。成化以後，坊間科舉用書的種類越來越多，除了四書五經講章和八股文選本外，也大量刊印古文選本、明文選本、翰林館課、類書、通史、諸子彙編、

1990)，卷十七，〈書院·梅國書院〉，頁24下。

<sup>21</sup>(明)劉節，《嘉靖·南安府志》，卷二十二，〈宮室·南安府·御書樓〉，頁5上。

<sup>22</sup>蕭東發、鍾洪、王波，〈中國古代書院藏書概論〉，頁72-73。

<sup>23</sup>(明)劉節，《嘉靖·南安府志》，卷17，〈書院·梅國書院〉，頁25上。

論表策試試墨彙編、範文選本等各式各樣的制舉用書，以滿足士子們全方位的備考需求。<sup>24</sup>這類書籍專為應付科舉考試而作，或經節錄摘選，或為前輩程文，與原典的知識完整性相去甚遠，如：經書講義、經義文章寫作指導、通史節要、試墨彙編、古文選本、類書、韻書之類皆是。若由梅國書院的藏書內容來看，所藏多為原典；且「詩賦類」、「集類」、「字書類」、「志類」、「雜類」等 252 部圖書，也不是科舉考試的主要範圍，乃士子們於應舉之外，進行學習、研究、討論與參考的工具，竟然占了院藏圖書總部數的一半以上。所以，梅國書院的藏書裡頭，除了一般儒學普遍會收藏的科舉用書外，還包括為數更多的非科舉用書，提供師生們從事科舉以外的教學、研究與閱讀使用。

再如當時馳名天下的「白鹿洞書院」，雖屬官辦書院，卻也不以舉業為主要目的，反而是號召全國各地的有志之士前來江西就學，以論學問道為主。成化初年，時白鹿洞書院掌院洞主胡居仁(1434-1484)曾經修書給江西各地的官署衙門，要求選送俊秀人才入院就讀。由於書院重在學術研究，藏書的品質與多寡便顯得十分重要，所以胡居仁也希望官府能夠頒贈圖書給白鹿洞書院，作為教學使用。信中略云：

伏望廣行推訪有才氣英明、志向高遠及純篤溫厚者，訪得其人，命有司以禮敦送入洞，則士氣必振，海內風動，豪傑英偉之才，必不遠千里而至，作興之道，無過於此者。若夫凡下之才，「汲汲於奔競」者，不必招致也。況江右素號文盛之地，學校、科舉足以供主司之選，豈待興洞以教之哉！其間有意氣不群，敦厚好學，舉業已通，欲復求進乎古聖賢之域，以盡修己治人之道者，苟非興洞，何以聚而教之哉？……洞中全無書籍，更望即求入洞，以賜肄習。<sup>25</sup>

到了弘治年間，江西提學副使邵寶(1460-1527)也曾經向全國發出通告，期盼招徠各地「暫輟進取而志於學者」，入白鹿洞書院研讀，榜云：

謹案南康府白鹿洞書院，實據匡廬、彭蠡之勝，宋儒周、朱二先生嘗游寓焉。其秀自天，可以資靜修之趣；其重因人，可以興景仰之思。士惟無志，苟志欲上師聖賢，進德修業，期有益於天下者，聞茲洞院，

<sup>24</sup>沈俊平，〈明中晚期坊刻制舉用書的出版及朝野人士的反應〉，《漢學研究》第 27 卷第 1 期(2009.3)，頁 155。

<sup>25</sup>(明)鄭廷鵠，《白鹿洞志》，載白鹿洞書院古志整理委員會主編，《白鹿洞書院古志五種》(北京：中華書局，1995)，卷十一，胡居仁〈奉祀參政鍾憲副莊僉憲〉，頁 309。

皆當負笈裹糧，從事於斯。況有舍以居，有田以贍，有書以觀如今日者，而可不游乎！……今學校徧天下，立貢設科，教且用之，具有成法。若舍彼就此，徒欲自異於眾，而所習者仍與眾同，……凡我學校諸生，暨山林儒士，有清修慎篤，欲「暫輟進取」而志於前所謂學者，許各府、縣起送前來。寶雖寡陋，敬遵先儒舊規，斟酌程課，近臨几席，遠寓筆札，相與講明焉。……所謂「暫輟進取」，或五六年，或七八年，必待學成，然後出用，不惟其言，惟其事實，斯為有志之士。如或立志未定，請勿輕至。其四方學者，聞而來游，當異館待之。<sup>26</sup>

由上可見，明代江西白鹿洞書院的學生，是經過天下各府州縣篩選過當地的優秀儒學生員或知名文人，且為了避免與地方儒學專以考取科舉的教育目標相同，讓人有「舍彼就此，徒欲自異於眾，而所習者仍與眾同」之譏，故白鹿洞書院專門吸收各地短期內不打算參加科舉考試，僅立志於鑽研學問的優秀學者們，選送到書院內就讀，並發給各項生活津貼，稱為「廩餼」。

明代江西的書院繁多，書院中又講會林立，呈現一片學風鼎盛的景象。當然，在科舉盛行的明代，書院生員們所學習的知識，自不可能與科舉毫無關係。而那些奔走於書院與儒學之間從事教學的教師們，也無法將講學與舉業的知識做到嚴格的區分。<sup>27</sup>不過，由於明代江西書院的學術研究性質比儒學來得高，因此，在藏書事業上，兩者亦有明顯之不同。一般而言，書院藏書的學術性會比較明顯，內容沒有太多限制；而儒學藏書則受官方控制，種類較少，多半是一些有關人心教化或與科舉相關的朝廷賜書。<sup>28</sup>值得注意的是明代書院的藏書內容，有時還會反映出區域學術潮流的變化，或是該書院的治學特色。<sup>29</sup>而相同的是，兩者都能滿足師生閱讀和研究查檢的需要，甚至還可提供當地或各地的讀書人使用，可說是古代最為開放的兩種藏書類型。<sup>30</sup>

在書院學風的薰陶下，歷代學子們刻苦攻讀，廣及儒家經典、歷代詩文、

<sup>26</sup>(明)李夢陽，《白鹿洞書院新志》，載白鹿洞書院古志整理委員會主編，《白鹿洞書院古志五種》(北京：中華書局，1995)，卷五，邵寶〈白鹿洞論來學文〉，頁76。

<sup>27</sup>胡定鴻，《明代江西書院與科舉互動關係研究》(南昌：江西師範大學教育學院碩士論文，2008)，頁25-26。

<sup>28</sup>陳冠至，〈明代江西地方官府藏書事業研究--以各級儒學為考察中心〉，《圖書資訊學刊》第13卷第2期(2015.12)，頁51-52。

<sup>29</sup>羅立、羅曉鳴，〈古代書院的藏書制度〉，《高校圖書館工作》第4期(2001.8)，頁51。

<sup>30</sup>王國強，〈中國古代藏書的文化意蘊〉，《圖書與情報》第3期(2003.8)，頁20。

筆記、書法，乃至宗教典籍等。書院造就了眾多學者和人才，在傳播文明、繼承文化傳統等方面，確實發揮了重大的教育作用。<sup>31</sup>此外，由於書院主要是為了傳播知識，幫助學習，所以在藏書的板本上，並不會刻意去追求舊刻珍槧，所重唯大眾化的通行本而已，如此既為書院財力所允許，也可滿足師生之所需。同時，書院不僅購書、藏書，同時也抄書、刻書，讓書籍在社會上廣泛流通，不但成為本地藏書豐富之處，也易形成地方上的文化中心。同時，書院藏書也保存了許多的珍貴古籍與文獻，使其得以流傳到今天。當然，透過閱讀書院的藏書，讓很多明代江西的生員因而出類拔萃，成為日後國家的精英人才。<sup>32</sup>

#### 四、明代江西書院藏書徵集的來源

由於書院是士人圍繞著書而開展教學、研究活動的重要文化組織，所以書院與圖書，兩者彷彿具有血緣般的親屬關係。自古以來，書院便以藏書作為主要的經營項目之一，如何徵集到更加完備的藏書質量，一直是院方首要關心的課題。一般而言，歷代書院收集圖書的管道，不外乎透過朝廷頒賜、官府添購、社會捐助、書院自籌等幾種途徑。<sup>33</sup>

明代江西書院藏書質量的豐富，往往就是憑藉其徵集來源十分廣泛。如同地方上的其他官府藏書機制，朝廷的贈賜、書院自行購置、自行刻書、籌款募捐等，都是明代江西書院添置或補充藏書的途徑。<sup>34</sup>

##### (一) 朝廷的賜書制度

明代中央政府經常刻印許多有關教化百姓，或是利於封建專制極權統治的圖書，並頒贈天下。太祖時期，中央政府的刻書活動主要是由南京國子監負責；自成祖遷都北京以後，便改由內府的司禮監主持，其下設經廠，專司刻書。刻印的內容是以推行文治政教為主，包括：典章制度、史籍、佛藏、道藏、番藏、鑒戒等書，主要作為宮內學習、頒賜群臣和各地學校等用途，為官府藏書的重要來源。終明之世，內府的經廠與南、北國子監，就是明代中

---

<sup>31</sup>朱黎明，〈略論中國藏書文化的人文主義精神〉，《江西圖書館學刊》第 4 期(2004.12)，頁 83。

<sup>32</sup>蔡儀、蔡小初，〈書院藏書談〉，《江西教育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1 期(2002.2)，頁 85。

<sup>33</sup>舒原、余峰，〈中國書院的圖書徵集制度〉，《湖南大學學報》第 1 期(1998.2)，頁 32。

<sup>34</sup>陸漢榮、曹曉帆，〈古代書院藏書重要來源之一：書院刻書〉，《圖書館建設》第 1 期(1995.1)，頁 69。

中央政府主要的三大刻書中心。此外，在京的各部衙門，以及地方上的藩府和各級行政機關，也經常從事刻印圖書的工作，都屬於明代的官方刻書系統。<sup>35</sup>

為了教化天下、鞏固帝國統治，明朝的皇帝經常會頒贈典籍給各地宗藩與朝臣們，還有各地的學校或書院，<sup>36</sup>以達成約束天下臣民的目的。譬如：

太祖高皇帝統有萬方，即令天下脩明學政，以圖化理。……學堂扁曰：「明倫」，敦化本也。教以四書五經，皆以發明此義而已。……太宗文皇帝，又恐學者迷於所適，乃召諸大臣，博採先儒論說，輯為《四書》、《五經》大全；又採濂洛關閩諸君子著述，輯為《性理大全》。宣宗章皇帝復類輯經書格言，及歷代帝王并本朝祖宗之善行，著《五倫書》。皆頒布學校，以為典訓。<sup>37</sup>

尤其是南、北兩京的國子監，例有刻印書籍頒贈全國各地學校的成規。明末浙江金華藏書家胡應麟(1551-1602)曾經指出：「經則一十三家注疏，史則二十一代，類頒於太學，合之便可三千餘卷。」<sup>38</sup>

至於明代江西書院獲得官府頒贈圖書的情況，以白鹿洞書院為例，據萬曆年間的盤點紀錄，當時朝廷頒賜的書籍存在的計有：「《大明律》一本、《存心錄》五本、《洪武正韻》五本、《孝順事實》二本、《大明一統志》二十四本、《大明會典》五十本、《明倫大典》十二本。」<sup>39</sup>此外，還有由朝廷臨時委派的中央官員贈送書籍給江西書院的例子，再據《白鹿洞書院志》記載：「萬曆癸卯(31年，1603)夏，蒙按院吳發書貳部：《諸儒語要》四本、《訓士錄》十本。」<sup>40</sup>按院即巡按御史的別稱，當時曾有一位吳姓的巡按御史贈送書籍給白鹿洞書院。一般而言，官府置備也是書院藏書的主要來源之一，通常透過兩種方式：一是奉文置書，即上級衙門撥發官帑命令下級官員購置；二是地方政府在其權力範圍內動用公款為轄內書院置書，這是明代江西地方官府為書院置備書籍的主要形式。<sup>41</sup>

<sup>35</sup>何東紅、朱賽虹，《中國官府藏書》(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9)，頁135-143。

<sup>36</sup>王偉凱，〈明代圖書的國內流通〉，《社會科學輯刊》第2期(1996.3)，頁107。

<sup>37</sup>(明)黃文鸞等，《正德·新城縣志》(《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46，上海：上海書店，1990)，卷六，〈學校〉，頁7上-下。

<sup>38</sup>(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臺北：世界書局，1980)，卷四，〈甲部·經籍會通四〉，頁53。

<sup>39</sup>(明)周偉等，《白鹿洞書院志》，載白鹿洞書院古志整理委員會主編，《白鹿洞書院古志五種》(北京：中華書局，1995)，卷三，〈人物志·國朝十三人·聖製〉，頁510。

<sup>40</sup>(明)周偉等，《白鹿洞書院志》，卷三，〈人物志·國朝十三人〉，頁512。

<sup>41</sup>羅立、羅曉鳴，〈古代書院的藏書制度〉，頁50。

## (二)書院自行購置

中國古代的書院藏書由書院自行籌措者，主要有兩種形式，一是由書院斥資購置，一是自行刊刻，其中又以前者為多。嘉靖 43 年，白鹿洞書院洞主陳汝簡曾經說過：「汝簡訪聞先時書籍，洞租買置居多。」<sup>42</sup>可見明代白鹿洞書院的藏書，主要是來自於透過本身的經費購買。基於十分有限的洞租，為了保證最基本的教學需求，書院自籌普遍遵循著一個原則，就是「有用」，也就是說，採訪政策是以符合最基本的教學與研究需求為標準，只要缺少什麼，就設法補充什麼。<sup>43</sup>明代書院以經史為主要藏書內容，其次為陸王學派學者的文集、語錄等，以保證最基本的教學內容。<sup>44</sup>

此外，書院洞主也經常會主動向人勸募書籍或金錢，以充院藏或購書之資。例如前述成化初年的白鹿洞書院洞主胡居仁，便曾經寫信向友人要求寄書入洞，略云：「洞中少書籍，望廣求人洞，以嘉惠後學，幸甚！昔朱子雖升去浙東提點，猶拳拳於此，遺錢命後人興理。先生之心亦然，故以為請。」<sup>45</sup>

## (三)書院的刻書活動

至於明代書院所刻的圖書，以現存者來看，包括了經史子集各類的教材或參考讀物，以及師生學術新著和有關書院的文獻等。其中對於書院的修志、刊志，明人則顯得特別重視。此外，對於叢書的編纂刊印，明代書院也開風氣之先，影響及於後世，奠定了清代發展的基礎。<sup>46</sup>

以白鹿洞書院為例，有明一代，其刻書事業可謂相當繁盛。據嘉靖 4 年(1525)的統計，時白鹿洞書院所藏雕板計有：「《易經》板五十九片，《書經》板五十參片，《詩經》板九十參片，《春秋》板六十捌片，《禮記》板壹百九十九片，以上俱提學副使邵寶刻。《白鹿洞書院新志》板捌十七片，提學副使李夢陽(1472-1529)刻。《五禮圖》板五片，提學僉事田汝籽(1478-1533)刻。《遵道錄》壹百零壹片，僉事王崇慶(1484-1565)刻。《史記》板二千片，汝籽刻，見寄貯南昌學。《重修白鹿洞書院新志》板一百零三片，提學副使周廣(1474-1531)刻。」<sup>47</sup>可惜的是，明代白鹿洞書院所刻之圖書，傳至今已幾乎

<sup>42</sup>(明)鄭廷鵠，《白鹿洞志》，卷十六，〈經籍〉，頁 427。

<sup>43</sup>羅立、羅曉鳴，〈古代書院的藏書制度〉，頁 51。

<sup>44</sup>鄧洪波，〈簡論中國書院藏書的五個來源〉，《江蘇圖書館學報》第 1 期(1997.2)，頁 5-6。

<sup>45</sup>(明)周偉等，《白鹿洞書院志》，卷七，〈文志·寄周時可〉，頁 606。

<sup>46</sup>蔡儀、蔡小初，〈書院藏書談〉，頁 84。

<sup>47</sup>(明)李夢陽，《白鹿洞書院新志》，卷八，〈書籍志第十三·鏤板〉，頁 145。

散佚殆盡，無從考見。<sup>48</sup>

明代江西書院藏書事業的發達，其實與理學的興盛具有很大的關聯性。理學家們所推崇的四書、五經，以及理學家解釋和闡揚儒家經典的論著，都成為當時江西書院通用的基礎教材，自然也是書院的重點藏書。刻書是明代江西書院藏書的重要來源之一，所以院裡從事教學的名師與學者們，對於上述基本教材與經典的刊刻活動，往往都會親自主持。此外，明代江西書院還刊刻了許多名師碩儒的著作，以及院內師生們的教學與研究成果，陳列於院內的藏書樓裡，提供借閱流通，為生員們的日常讀物，對書院的教學和研究發展，產生積極的推動力。至於刻書費用，主要來自於洞租、中央與地方政府的資助，以及官員或紳民的私人捐贈等途徑。一般而言，書院自行刊刻的圖書，例皆典藏於院中，作為師生誦習之具；<sup>49</sup>不過，書院刻書有時也對外販售，其獲利可用來補充日常經費的不足。<sup>50</sup>

#### (四)私人捐贈或寄存

社會捐贈，也是書院藏書的重要來源。社會捐贈所得之書，有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內容廣泛，豐富多樣，反映了最新學術成果。這是由捐書者的社會地位、學術水準、政治主張等不同因素造成的，也就是說，志趣各異的各類學者團體，必定會將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或者最能反映其學術特色的出版物捐給書院。<sup>51</sup>

嘉靖時期，權相嚴嵩(1480-1567)曾經在其故鄉江西袁州府分宜縣創立了一所書院，並捐贈院中的所有藏書。時人張自烈(1597-1673)指稱：

世廟中，分宜嚴相國嵩為「鈐麓書院」，祀先聖「止善堂」，無藏書。先是，嵩官大宗伯，斂書送學。考邑志，所送四書、五經、《性理通鑑》、《名臣奏議》、《正蒙》、《玉海》、《二程遺書》、《晦菴文集》、《西山讀書記》、《文獻通考》、《昭明文選》、《唐文粹》、《元文類》、劉向《說苑》、《蘇文忠集》，及《孝順事實》、《為善陰騭》、《明倫大典》、《義永武安王集》而止。<sup>52</sup>

<sup>48</sup>趙連穩，《中國書院藏書》(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9)，頁164-165。

<sup>49</sup>鄧洪波，〈簡論中國書院藏書的五個來源〉，頁5-6。

<sup>50</sup>陸漢榮、曹曉帆，〈古代書院藏書重要來源之一：書院刻書〉，頁69-70。

<sup>51</sup>羅立、羅曉鳴，〈古代書院的藏書制度〉，頁50。

<sup>52</sup>(明)張自烈，《芑山文集》(《叢書集成續編》188，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卷十八，〈芑山藏書記〉，頁6上-下。

作為明代江西書院藏書建置來源的一種途徑，社會捐助，通常包括了官紳士民的個人捐贈、書院師生的捐置、非官方機構之贈送等三種主要形式。一般說來，是由主持創建或修復書院的地方行政長官，包括總督、巡撫、知府、知州、知縣，也有督導地方教育事業的提學官，他們各自單獨捐俸購置書院的圖書，這種情況在明代江西非常普遍，且其所捐之書，往往就成為某一書院藏書的唯一來源，這是官員個人獨力捐助的情況。有些捐書者原本就愛好收藏書籍，甚至是藏書家，後來為了澤惠後人鄉鄰，才將藏書捐贈或寄存書院的。

至於社會捐助所得之書，有一個最大的特點，那就是內容廣泛，豐富多樣，且反映出最新的學術成果。這一個特點，經常因為捐書者的社會地位、學術水準、政治主張、志趣愛好等因素，而各不相同，也會因為受捐書院所在地的文化需求、院中生員程度高下不一，而造成許多差異。若為藏書家所捐，往往會摻雜許多精刻善本，這一類書籍原本即具有私人藏書的許多特性，復轉為公用，便同時兼具書院藏書的開放性，使得院藏圖書的版本層次大為提高。

總之，社會捐助使得書院藏書，在內容上具有廣博豐富、類別多樣的特點，為書院的教學和研究工作，提供了廣泛而堅實的文獻支援基礎。同時，也在學術研究上，輸入新的研究成果，為活躍院中諸生的思想，促進學術水準，提供了重要的保證。而在圖書的板本上，社會捐助更具有融入私人藏書的特點，讓書院藏書從公用與大眾性質，進而成為精品、善本，為書院提高知識服務層次，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sup>53</sup>

##### 五、明代江西書院藏書的典藏、管理與利用--以白鹿洞書院為例

書院教師的講學以講書為主，而生員的學習鑽研，更是以讀書為要。因此，書院對於書籍的徵集、整理和借閱管理等工作，是不容忽視的。<sup>54</sup>有別於官府和私人藏書的一個最大特點，就是書院藏書的「公共性」和「開放性」，其收藏目的並不在於為藏而藏，也不在於獨自覽閱，更不在於販鬻得利，而是為了供人借讀、研習與日常講誦之用。因此，它沒有深藏篋笥、終飽蟬蠹之弊，卻具有「最大限度開放流通」與「保護圖書」的永恆矛盾。<sup>55</sup>所以，制

---

<sup>53</sup>鄧洪波，〈簡論中國書院藏書的五個來源〉，頁 4-5。

<sup>54</sup>鄭飛，《明清江西書院學規初探》(南昌：江西師範大學教育學院碩士論文，2007)，頁 46。

<sup>55</sup>鄧洪波，〈中國書院藏書的借閱制度〉，《江蘇圖書館學報》第 4 期(1998.8)，頁 15。



定妥善的管理辦法，就顯得格外地重要。<sup>56</sup>

#### (一)藏書管理人員的設置

書院自唐代出現以後，便與藏書活動緊密相聯，歷經千餘年的發展，形成許多獨具特色的管理制度，包括徵集、整理、編目、保管、借閱等在內的制度和管理體系。歷代書院藏書的管理人員，有：司書、司書吏、掌書、典書、書役、司事、書辦、院書、號房、看役、看守、門子、庫子，或是兼管之齋長、管幹、學長、監院、山長、首事、洞主、洞長、教授、教官……等稱謂。<sup>57</sup>

明代白鹿洞書院座落於江西省南康府星子縣內。白鹿洞書院創始於唐代，歷元末兵燹，逐漸毀損荒蕪。明興，經南康府知府翟溥福(1381-1450)重修後，始克復學。《白鹿洞志》載：

書院基于李氏，……至元經兵燹，殿宇、書籍不能無毀焉。洪惟我朝，德盛化洽，文教邁古。自郡守翟公(翟溥福)建學以來，洪儒碩輔，每有增置書籍，歲時積累，經史子集，漸以克備，誠足為師友講習之資。<sup>58</sup>

然而，明初白鹿洞書院的員額編制並不健全，正德以前，未設專人負責管理日常院務。一般說來，除了府縣主官(管)以外，省級的布政使、按察副使或僉事(提學官)，乃至朝廷委派之撫、按等御史官員，對於白鹿洞書院，原則上都具有管理與督導之權。例如成化初年的江西提學官李齡(1406-?)，便曾為白鹿洞書院擬訂「禁約」，申明院內的圖書管理辦法，大致為：

今後仰府設立一樣冊籍四本，明開書籍什器，解赴本道鈐印，印過一留本道存照，一留本府存照，一發本府學存照，一發付書院「庫子」收管。本洞教授，每月朔查取門庫損失有無執結，歲終仍申本道查考。<sup>59</sup>

約同其時，明代的首任洞主是由餘干縣的知名學者胡居仁擔任，然其後洞主又時設時廢，未設專職。正德末，巡按江西監御史唐龍(1477-1546)始上奏朝廷，請置專官管理洞務，首開朝廷部議白鹿書院洞主之例，足證當時白鹿洞書院的名聲已是傾動天下。《白鹿書院志》載其事云：

<sup>56</sup>關於中國古代書院的藏書典藏管理與流通制度，可參見鄧洪波，《中國書院章程》(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2000)一書。

<sup>57</sup>鄧洪波，〈試論書院藏書的管理體系〉，《圖書館理論與實踐》第3期(1996.8)，頁44-46。

<sup>58</sup>(明)鄭廷鵠，《白鹿洞志》，卷十一，〈主洞李資元白鹿洞學交盤冊序〉，頁317。

<sup>59</sup>(清)毛德琦，《白鹿書院志》(《續修四庫全書》72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卷十，〈藝文·巡撫邵銳依提學道所擬禁約〉，頁4下-5上。

唐龍，字虞佐，蘭溪人，江西巡按御史。正德庚辰(15年，1520)按南昌，首詣書院，謁先聖畢，訪查書籍、田畝，無官綜理。奏起原任興化府教授蔡宗袞以為南康府教授，專主洞事。事下部議，從之。明興，未有以白鹿洞主為請者，茲異數也。……蔡宗袞，字希淵，山陰人。由進士授興化府學教授，踰年而歸。正德庚辰，御史唐龍上疏，起為白鹿洞主，乃授南康府學教授，主白鹿洞。敦復洞規，士風丕變。<sup>60</sup>

再考唐龍原奏，略云：

臣近日巡歷本府，首詣書院，展拜先聖先賢。見得祠殿荒涼，門廡零落，往來皆牛羊之跡，前後俱蔬稼之圃。及訪書籍，已多散亡，田畝亦浸遺失。詢厥所由，蓋因無官綜理，每年止是本府星子縣編僉「門子」二名，輪流看管，以致狼狽至此。夫必欲設官，尤恐費事，緣本府儒學距書院僅十五里，但得一學行教授兼管，即足矣。……臣訪得福建興化府教授蔡宗袞，由進士出身，學問深該、志行清古。……如蒙乞敕立部查議，將蔡宗袞改調南康府教授，不妨原務，兼總理書院，用修遺教。……以後員缺，常於進士內慎選銓補。<sup>61</sup>

綜上所述，可知白鹿洞書院自明初至正德末，除了成化初年胡居仁曾任洞主外，沒有專員管理。因位在南康府星子縣的轄境內，主管機關為南康府與星子縣，故僅由星子縣派遣二名「門子」，輪流看管日常雜務，如此簡陋的編制，自然導致藏書散亡、學田浸失。當時唐龍建議設置專員管理，由南康府儒學當中，擇一進士出身之教授，兼理白鹿洞書院的全部院務與日常營運。

正德 16 年(1521)，朝廷接受唐龍的建議，下令授予蔡宗袞南康府學教授，支正八品俸級，令其到任而不妨原職，綜理白鹿洞書院的一應事務，同時規定爾後員缺，仍應慎擇儒學教官兼管書院，但不限於南康府學，以為常制。從此以後，白鹿洞書院的藏書便有專人負責管理，「凡各部書籍見在、殘失數目，蔡宗袞俱已查對明白，裝造四冊，申解提學道討取鈐印，一留本道，一發本治，一發本學，一給付本洞『庫子』。」<sup>62</sup>也就是說，蔡宗袞到任後，即依照先前提學官李齡的規定，首先清點當時書院內的現存書籍，然後編製書目清單一式 4 冊，呈交提學官(江西按察副使或僉事)蓋印後，即分送提學官、南康府、南康府儒學、白鹿洞書院等四處留存備查。至於當時書院內書庫的

<sup>60</sup>(清)毛德琦，《白鹿書院志》，卷四，〈先獻〉，頁 65 下-66 上。

<sup>61</sup>(明)李夢陽，《白鹿洞書院新志》，卷四，〈起蔡宗袞為白鹿洞主劄付〉，頁 53-54。

<sup>62</sup>(明)李夢陽，《白鹿洞書院新志》，卷八，〈書籍志第十三〉，頁 143。

日常實際管理者，則是「門子」與「庫子」。

嘉靖年間，白鹿洞書院的員額編制又有些微調整。仍設洞主一名，掌理洞務，選擇學養優良且負時望之文士為之，多以儒學教官或南康府官員充之；另置教官二人，職掌教學與設備查管。萬曆、天啟時期，南康府知府袁懋貞曾說：「往例督洞教官二員，亦每年共給銀十二兩，茲欲訪問餽之遺，難同苜蓿之儉。議加一倍，每年支洞租銀二十四兩，送本廳自備往洞之需。至分督教官，勞逸應均。」<sup>63</sup>至此，白鹿洞書院的藏書管理人員，除了洞主與「門子」、「庫子」外，又多了二位教官。

## (二)藏書的典藏、管理與維護

為了處理藏書的日常維護與修補問題，以及防止書籍因人為因素而散失毀損，自成化初年開始，白鹿洞書院便實行過許多相關的辦法與措施。弘治年間，江西提學副使邵寶曾經延聘飽學之士入洞校勘圖書，以維持院內藏書的品質。《同治·永新縣志》載：

尹爽，字用晦。年十七，忽自奮曰：「不學，何名為人！」閉戶深研易理，泛及諸史百家。督學邵文莊(邵寶)見所試文，稱為國士，命校白鹿書院經籍。<sup>64</sup>

到了嘉靖初年，巡撫江西都御史邵銳(1480-1534)復因江西舉辦科舉考試，導致白鹿洞書院的藏書受到損壞或散失不全，於是下令：

一本洞儲書，專以教迪士類。近年江西科場，必取洞書應用，及至領回，缺者不敢言缺，失者不敢言失，洞書殘落，大半由此。今後江西科場書籍，布政司自備，該府毋得輒取鹿洞書籍送用，以致遺失。<sup>65</sup>

然而，後來邵銳的規定並未被貫徹執行，直到嘉靖 43 年(1564)時，白鹿洞書院仍然受到江西科舉借書之害，院內藏書因而損壞散佚的情況沒有獲得改善。於是，當時的洞主陳汝簡又續添了一些新的措施，制定書籍的修補、借閱與編製書目等許多辦法，來杜絕弊端。陳汝簡說：

如近時貢院之弊，取有常文，歸不完璧，其散亡也，不亦宜乎！茲立補輟之法，屬取借之禁，尚恐後之君子無所稽考。……近得青厓胡公親送《初學記》等三書入洞，迨篁溪鄭公(鄭廷鵠，1505-1563)修志之

<sup>63</sup>(清)毛德琦，《白鹿書院志》，卷十，〈藝文·知府袁懋貞申請洞主文〉，頁 15 下。

<sup>64</sup>(清)蕭玉春等，《同治·永新縣志》(臺北：江西永新旅台同鄉文獻委員會，1976)，卷十七，〈儒行·尹爽〉，頁 3 上。

<sup>65</sup>(清)毛德琦，《白鹿書院志》，卷十，〈藝文·巡撫邵銳依提學道所擬禁約〉，頁 4 下。

時，俱已亡矣！彼議欲立增置「書籍」一門，備見何書係何年收買，或何人發送，俾人所由來，而不忍遽至於散失也。為懼侵梓煩瑣，乃於經部之末，分註新增書籍，惟深致慨惜丁寧之意而已。自時厥後，不數年間，右文諸公有事茲邦者，發到書籍，已不啻數十百本，謂之無所觀感而然者不可也。茲仿鄭公成法，備查胡公以後，凡有增置書本，悉照原來年月開載，仍為詳考經、史、子集，類附登志。尚冀獲瞻是卷者，知洞學之書，人得而增之，而分散竊取者，或亦知所愧怍，悉為復還，不使部帙之殘缺也。如是，則積累以漸，數年之後，白鹿經史，又奚但汗牛充棟已耶！<sup>66</sup>

當時還頒布了《整書事宜》，明訂：「修整書籍，每五年一大修，三年一小修。南康府呈委主洞教官，慎選博識謹篤洞生四名，查理損壞書籍若干本，動支洞租，召募書匠逐一修整。」<sup>67</sup>

從此以後，白鹿洞書院藏書的保存與管理便日趨嚴格與健全，不但歷經多次的增補修繕，也編製了詳細的書目，且將新進的圖書隨到隨記，又於平時派遣專人負責查檢書籍狀況，洞主隨時督導抽查。此外，在新舊洞主交接時，必須完成點交，並造「交盤簿」，清楚記載書籍的來源、數量與現況，以利接管。嘉靖 45 年(1566)，洞主李資元指出：

夫洞學接管，必有盤交，慎職守也。交盤必有冊，詳記載也。紀載維何？書籍、祭器爾已。……但慎守者束之高閣，慢藏者則散佚不收，無怪乎道不明而禮不飭，徒為虛文虛器爾已。……余繼提舉洞事，通將經史子集類分先後，以聖製列于經部之先，志書附于史部之後。附子部者，諸子之創作也；附集部者，諸子之新選也。已經整修者，序列于前；未經整修者，附列于後，條具分明，總計壹百柒拾貳部，發予「門庫四役」，照數收藏看守。凡于四季，遇濕氣則加曝曬，有塵垢則加展拂，照類收拾，使經久不壞。……洞主講論之暇，時加檢查，則不啻載道有公器，而明道之功益不輟矣，夫豈有高束、慢藏者哉！……今查自貳拾參年(1544)以後，增入授受、某時某公、其書其數，皆有可紀，批閱講論，亦知所自來矣。<sup>68</sup>

根據李資元的敘述，可知當時白鹿洞書院的實際管理員有「門子」2 人與「庫

<sup>66</sup>(明)鄭廷鵠，《白鹿洞志》，卷十六，〈經籍〉，頁 427。

<sup>67</sup>(明)鄭廷鵠，《白鹿洞志》，卷十六，〈經籍〉，頁 427-428。

<sup>68</sup>(明)鄭廷鵠，《白鹿洞志》，卷十一，〈主洞李資元白鹿洞學交盤冊序〉，頁 317-318。

子」2人，共計4人，負責日常的典藏、維護、流通出納與管理工作，且得隨時視書籍的典藏狀況，進行曝曬、清潔等保護措施，使得藏書達到172部之多。同時，每部書都詳細紀錄其冊數、收受來源、典藏脈絡等資訊，提供日後之追查、參考與評價。

### (三)藏書的使用與流通

書院的藏書提供院內的教官、學者與生徒們之教學與閱讀使用，是中國古代書院制度形成以來相沿成習的一項傳統。至於學術文化，乃指最狹義的文化內容，包括文學藝術、科學技術、區域居民的教育狀況與文化素養，以及各類文化人才和文化成果等。由於各地的人文和自然環境的不同，學術文化總是呈現出鮮明的特徵。<sup>69</sup>就明代而言，由於理學的昌盛，使得江西書院的學術性藏書比一般儒學藏書豐富很多，因此，對於區域學術研究的推廣，書院藏書的影響力實在不容忽視。

嘉靖45年，白鹿洞書院洞主李資元曾經指出當時院內藏書總計有172部，且是由稱為「門庫」等4位差役，謹慎小心的收藏保管。一般而言，「門庫」是院內書籍的實際管理員，分為「庫子」與「門子」。當時白鹿洞書院規定：

「庫子」二名，每年星子支租參拾貳石，僱募鄰洞居民充當；「門子」二名，每年星子縣均徭編派，親自充當，年終交替。門庫不許擅離書院，致有器物損失；師生亦不得分外虐使。<sup>70</sup>

不過，「庫子」是聘僱人員，屬於官府之屬吏，為志願職，故其在職時間可以較長；而「門子」則是由星子縣轄下的百姓輪役充任，每年更換，為義務職，在職時間理論上會比較短。如此看來，「庫子」應該才是書院內藏書樓主要的專門管理人員，「門子」僅負責「看守本洞諸件，供給香燈，灑掃，并夜晚提鈴以謹火燭，不許諸生擅自役使借辦。」<sup>71</sup>然即便如此，「庫子」與「門子」仍需共同看管書樓與藏書，二者都得辦理圖書的典藏、出納與流通等業務。至於當時書院內的圖書使用規則，仍需按照一定的流程，大致為「在洞肄業諸生，凡有考究必須取書。取時書書名于門庫，覽畢，則門庫持帖類收。洞主講論之暇，時加檢查。」<sup>72</sup>也就是說，讀者欲借書時，必須先向「庫子」與「門子」登記，填妥借閱日期、書名和借閱者等資料後，才准借閱；等到閱

<sup>69</sup>編委會，〈歷代才俊出何方〉，《科學中國人》第7期(2001.7)，頁39。

<sup>70</sup>(明)鄭廷鵠，《白鹿洞志》，卷十八，〈洞學田下·給贍〉，頁464。

<sup>71</sup>(明)鄭廷鵠，《白鹿洞志》，卷十二，〈李齡規示諸生八事〉，頁324。

<sup>72</sup>(明)鄭廷鵠，《白鹿洞志》，卷十一，〈主洞李資元白鹿洞學交盤冊序〉，頁317。

覽完畢後，再由「庫子」與「門子」依書籍借閱登錄回收，然後分類歸架。總之，除由「庫子」與「門子」負責書院內書籍日常的典藏、維護、借閱與歸還等工作外，「門子」還需負責保持藏書樓內的燈光照明、環境的整潔與安全防護等事宜；而洞主則負最終督導之責。

為了使讀者養成尊經重道、愛護典籍、學而有序的讀書習慣，白鹿洞書院制定了許多嚴格的閱覽規則。例如要求師生們觀書，必須保持身體整齊清潔，尤其嚴禁諸生有「如小衣入文廟及各祠閒坐嬉笑，及將聖賢正論格言作戲語、不盥櫛觀書」等「侮慢聖賢」之行為，<sup>73</sup>違者將受到懲處。此外，生員們也被要求必須按照一定的科目順序來進行閱讀，不可逾越脫序，於是規定生員們「讀書必循序，不可躐等。先讀《小學》，次讀《四書》、《五經》，及御製書、史鑑，各隨資質高下。」<sup>74</sup>

## 六、結論

明代全國書院最多的省份便是江西，而藏書和刻書是書院的重要文化貢獻，為了提供學子們鑽研，書院大量地蒐集圖書與雕板，加以珍藏，以備教學使用。圖書的來源主要有：皇帝賜書、地方官府籌置、書院自籌購書，以及社會捐贈(地方官員、鄉紳、士民以個人身份捐贈)等途徑。另一方面，書院往往也會自行刻印圖書，有時還必須承擔地方官府刻書的部份任務，尤其是參與刊印地方文獻和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詩文集等工作。<sup>75</sup>

閱讀活動是一種社會現象，而且這種社會現象往往表現出明顯的地域文化特點。所謂地域文化特點，就是指閱讀活動發展的地域文化差異。明代的地方閱讀風氣，表現出明顯的區域文化特點。一地由於文化教育事業的發達、重教尚讀風氣之濃厚，以及藏書與出版業之發達、文人學者之輩出、文獻著述之繁富等現象，皆為影響一地閱讀風氣盛衰的主要因素。而閱讀活動的興衰，不僅引領和促進著整個明代的讀書風氣和學術文化的發展，也對後世產生重要的影響。<sup>76</sup>

若與歷代的中央政府藏書或大多數的私家藏書相比，明代江西的書院藏書旨在推廣地方教育與學術發展，凡是院內的學者或生徒，都能借閱藏書，故其利用率之高、讀者對象之廣、人數之多，都不是中央政府藏書或一般的

---

<sup>73</sup>(清)毛德琦，《白鹿書院志》，卷八，〈學規·提學高賁亨十戒〉，頁 10 下。

<sup>74</sup>(明)鄭廷鵠，《白鹿洞志》，卷十二，〈李齡規示諸生八事〉，頁 324。

<sup>75</sup>平雨，〈中國古代書院和出版業〉，《出版參考》，第 22 期(1995.11)，頁 4。

<sup>76</sup>王龍，〈明代閱讀活動發展的地域文化特點〉，《陰山學刊》第 3 期(2011.6)，頁 25。

私家藏書所能媲美的。綜括而言，明代江西的書院藏書十分注重藏書的利用，透過借閱的方式，不但大幅提升圖書的流通量，也打破了古代藏書重藏不重用的習慣。且在此過程中，明代江西書院亦逐漸地積累出豐富的藏書管理經驗，不僅匯集了以往書院藏書管理經驗之大成，也可說是替後來中國近現代學校圖書館的建立，譜下了序曲。

附錄：

#### 梅國書院藏書目錄：<sup>77</sup>

迂史節曰：「志藝文何也？紀載以示訓，而備去也；文藝之論不與焉，匪略也。是故首之聖製，經史諸類附焉，紀其目以示訓也。文以紀事，詩以詠物，各從其類；不者缺焉，不可也，紀其詳，以備考也。雜誌，志遺也，藉藝文以傳者也；而志則終矣。」

御製：《洪武正韻》一部十有六卷、《諸司職掌》一部、《為善陰隲書》一部十卷、《孝順事實書》一部十卷、《易經大全》一部二十二卷、《書經大全》一部二十卷、《詩經大全》一部二十卷、《春秋大全》一部三十五卷、《禮記大全》一部三十八卷、《大學大全》一部二卷、《中庸大全》一部二卷、《論語大全》一部二十卷、《孟子大全》一部十四卷、《性理大全》一部七十卷、《五倫書》一部六十四卷，已上御書共一十五部，俱洪武、永樂間頒降府學。弘治庚申(13年，1500)水毀南康、上猶，二學殘缺；崇義學新立，無頒。

制類：《欽賜大學衍義》一部、《欽降明倫大典》一部、《大明集禮》一部、《存心錄》一部、《洪武正韻》一部、《大明令》一部、《大誥》一部、《大明律》一部、《御製文集》一部、《皇明制書》一部、《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一部、《皇明政要》一部。

經類：《易經註疏》一部、《周易旁註》一部、《周易程傳》一部、《周易本義》一部、《周易纂言》一部、《周易本義啟蒙》一部、《周易本義通釋》一部、《周易傳註》一部、《易經大全》一部、《易圖漏識》一部、《書經註疏》一部、《古三墳書》一部、《書經旁註》一部、《書經傳註》一部、《書經大全》一部、《詩經註疏》一部、《詩經旁註》一部、《詩經傳註》一部、《書經大全》一部、《韓詩外傳》一部、《東萊讀詩紀》一部、《春秋左傳》一部、《春秋公

<sup>77</sup>(明)劉節，《嘉靖·南安府志》，卷24，〈藝文志一〉，頁1上-20上。

羊傳》一部、《春秋穀梁傳》一部、《春秋左傳註疏》一部、《春秋公羊傳註疏》一部、《春秋穀梁傳註疏》一部、《春秋胡傳》一部、《春秋大全》一部、《春秋繁露》一部、《春秋屬辭》一部、《春秋左傳分類》一部、《春秋正傳》一部、《禮記註疏》一部、《禮記集說》一部、《禮記纂言》一部、《禮記大全》一部、《五經正文》一部、《六經篆文》一部、《六經正誤》一部、《論語註疏》一部、《孟子註疏》一部、《孝經註疏》一部、《爾雅》一部、《爾雅註疏》一部、《周禮》一部、《周禮註疏》一部、《周禮集說》一部、《儀禮註疏》一部、《儀禮經傳》一部、《二禮經傳測》一部、《三禮考註》一部、《孔子家語》一部、《四書通義》一部、《四書傳註》一部、《四書或問》一部。

史類：《國語》一部、《戰國策》一部、《史記》一部、《西漢書》一部、《東漢書》一部、《三國志》一部、《晉書》一部、《宋書》一部、《南齊書》一部、《梁書》一部、《陳書》一部、《魏書》一部、《北齊書》一部、《周書》一部、《隋書》一部、《南史》一部、《北史》一部、《舊唐書》一部、《唐書》一部、《五代史》一部、《宋史》一部、《遼史》一部、《金史》一部、《元史》一部、《漢紀》一部、《後漢紀》一部、《元經薛氏傳》一部、《資治通鑑》一部、《通鑑前編》一部、《資治通鑑外紀》一部、《通鑑紀事本末》一部、《通鑑綱目》一部、《古史》一部、《大事記》一部、《大事記解題》一部、《兩漢詔令》一部、《通鑑續編》一部、《兩漢博聞》一部、《蜀漢本末》一部、《十七史詳節》一部、《貞觀政要》一部、《唐鑑》一部、《通志》一部、《綱目前編》一部、《續通鑑綱目》一部、《通鑑節要》一部、《史通》一部、《歷代通鑑纂要》一部、《史鈔》一部、《金佗粹編》一部、《春秋列傳》一部、《邵氏聞見錄》一部、《路史》一部、《世史正綱》一部、《遵堯錄》一部、《世史正綱》一部、<sup>78</sup>《讀史管見》一部、《馬班異同》一部、《小學史斷》一部、《杜氏通典》一部、《唐六典》一部、《漢雋》一部。

子類：《鬻子》一部、《老子》一部、《列子》一部、《莊子》一部、《三子口義》一部、《鶡冠子》一部、《亢倉子》一部、《關尹子》一部、《素書》一部、《子華子》一部、《荀子》一部、《管子》一部、《韓非子》一部、《尹文子》一部、《鄧析子》一部、<sup>79</sup>《公孫龍子》一部、《淮南子》一部、《賈誼新書》

<sup>78</sup>此書重複著錄，或板本不同，或為疏忽，或其他原因，不得而知。

<sup>79</sup>應是《鄧析子》。



一部、《揚子法言》一部、<sup>80</sup>《太玄經》一部、《劉向說苑》一部、《潛夫論》一部、《徐幹中論》一部、《孔叢子》一部、《文中子》一部、《抱朴子》一部、《化書》一部、《孫子》一部、《五子書》一部、《尉繚子》一部。

類書類：《藝文類聚》一部、《初學記》一部、《白孔六帖》一部、《太平御覽》一部、《冊府元龜》一部、《玉海》一部、《事類賦》一部、《皇朝類苑》一部、《群書集事》一部、《文獻通考》一部、《事文類聚》一部、《百川學海》一部、《說郛》一部、《山堂考索》一部、《黃氏日抄》一部、《類說》一部、《苕溪叢話》一部、《野客叢書》一部、《東軒筆錄》一部、《容齋隨筆》一部、《耕讀餘覽》一部、《翰墨全書》一部、……《屏山集》一部、《真西山讀書記》一部、《陸象山集》一部、《慈湖遺書》一部、《正學類編》一部、《大學衍義》一部、《聖學心法》一部、《聖學格物通》一部、《大學衍義補》一部、《困學紀聞》一部、《大學衍義纂要》一部、《禮經會元》一部、《論衡》一部、《薛文清公讀書錄》一部、《經濟文衡》一部、《武經總要》一部、《胡敬齋居業錄》一部。

文類：《文選》一部、《古文苑》一部、《文心雕龍》一部、《文粹》一部、《文苑英華》一部、《兩漢文類》一部(節編集)、《文鑑》一部、《三國文類》一部、《國朝文類》一部、《兩漢文鑑》一部、《文選備遺》一部、《文章類選》一部、《皇明文衡》一部、《文章正宗》一部、《續文章正宗》一部、《文章辨體》一部、《廣文選》一部、《崇古文訣》一部、《秦漢文》一部、《兩漢書疏》一部、《三蘇文粹》一部、《文則》一部、《文式》一部、《文斷》一部、《文章軌範》一部、<sup>81</sup>《古文會編》一部、《藝苑菁莪》一部、《文話》一部。

奏議類：《歷代名臣奏議》一部、《宣公奏議》一部、《皇朝名臣奏議》一部、《包公奏議》一部、《李忠定公奏議》一部、《宋史奏疏撮要》一部。

詩賦類：《楚辭》一部、《古賦辨體》一部、《陳思王集》一部、《阮步兵集》一部、<sup>82</sup>《漢魏詩》一部、《選詩》一部、《鮑明遠集》一部、《唐詩正聲》一部、《唐音》一部、《詩品》一部、《唐詩品彙》一部、《雅頌正音》一部、《詩話》一部、《唐詩紀事》一部、《唐諸家詩》一部、《唐宋名賢詞》一部、《唐

<sup>80</sup>應是《揚子法言》。

<sup>81</sup>應是《文章軌範》。

<sup>82</sup>應是《阮步兵集》。

詩正體》一部、《樂府詩集》一部、《唐詩絕句》一部、《陶靖節集》一部、《陸謝詩集》一部、《陳子昂集》一部、《嵇叔夜集》一部、《李元賓集》一部、《劉長卿集》一部、《岑嘉州集》一部、《駱賓王集》一部、《李翰林集》一部、《韋蘇州集》一部、《李長吉集》一部、《杜工部集》一部、《皇明風雅》一部、《孟浩然集》一部、《白樂天集》一部、《四詩正體》一部、《山谷詩集》一部、《陸放翁集》一部、《高太史集》一部、《陳后山集》一部、《白沙詩集》一部、《東里詩集》一部、《熊士選集》一部、《澄江詩集》一部、《太白山人集》一部、《鄭少谷集》一部。

集類：《蔡中郎集》一部、《郭景純集》一部、《張曲江集》一部、《顏魯公集》一部、《韓昌黎集》一部、《柳柳州集》一部、《李文公集》一部、《皮日休集》一部、《安陽集》一部、《武溪集》一部、《宛陵集》一部、《六一居士集》一部、《南豐類稿》一部、《嘉祐集》一部、《蘇東坡集》一部、《司馬溫公傳家集》一部、《黃山谷集》一部、《擊壤集》一部、《張文潛集》一部、《淮海集》一部、《唐子西集》一部、《徐節孝集》一部、《道卿集》一部、《毘陵集》一部、<sup>83</sup>《渭南集》一部、《王梅溪集》一部、《陳止齋集》一部、《葉水心集》一部、《陳龍川集》一部、《元遺山集》一部、《文文山集》一部、《道園集》一部、《劉靜修集》一部、《許魯齋集》一部、《吳草廬集》一部、《青陽集》一部、《宋學士集》一部、《王忠文集》一部、《蘇平仲集》一部、《遜志齋集》一部、《解學士集》一部、《吳頤安集》一部、《楊東里集》一部、《王柳菴集》一部、《胡祭酒集》一部、《吳康齋集》一部、《羅一峯集》一部、《尹澄江集》一部、《張東白集》一部、《龍阜文集》一部、《彭文思集》一部、《黃忠宣集》一部、《何椒丘集》一部、《懷麓堂稿》一部、《丘瓊臺集》一部、《吳匏菴集》一部、《類博稿》一部、《楊文懿公集》一部、《王守溪集》一部、《林見素集》一部、《程篁墩集》一部、《學史》一部、《容春堂集》一部、《李空同集》一部、《簡端錄》一部、《何大復集》一部、《甘泉文集》一部、《羅圭峯集》一部、《徐迪公集》一部、《鄭少谷集》一部、《鈐山堂集》一部、《蔡虛齋集》一部。

字書類：《東書堂法帖》一部、《淳化帖》一部、《智永千文帖》一部、《聖

---

<sup>83</sup>應是《毘陵集》。

教序帖》一部、《多寶帖》一部、《鍾繇帖》一部、《蘇帖》一部、《許氏說文》一部、《六書統》一部、《六書正譌》一部、《六書本義》一部、《說文字原》一部、《書學正韻》一部、《古今韻會》一部、《宣和書畫譜》一部、《韻府群玉》一部、《玉編》一部、《廣韻》一部、《韻譜》一部、《韻學直音》一部、《篆額》一部、《隸釋》一部、《韻學集成》一部、《千祿字》一部、《鍾鼎篆文》一部、《圖書寶鑑》一部。

志類：《山海經》一部、《水經》一部、《一統志》一部、《江西通志》一部、《河南通志》一部、《四川通志》一部、《山東通志》一部、《廣東通志》一部、《廣西通志》一部、《湖廣通志》一部、《中都志》一部、《姑蘇志》一部、《松江志》一部、《昆陵志》一部、<sup>84</sup>《杭州志》一部、《溫州志》一部、《處州志》一部、《寧波志》一部、《會稽志》一部、《赤城志》一部、《嚴州志》一部、《福州志》一部、《泉州志》一部、《興化志》一部、《漳州志》一部、《邵武志》一部、《吉安志》一部、《臨江志》一部、《瑞州志》一部、《撫州志》一部、《建昌志》一部、《贛州志》一部、《黃州志》一部、《武昌志》一部、《沔陽志》一部、《長沙志》一部、《蒲圻志》一部、《安慶志》一部、《淮揚志》一部、《淮安志》一部、《廬州志》一部、《徐州志》一部、《泗州志》一部、《滁州志》一部、《廣德州志》一部、《赤城會通記》一部、《廣州志》一部、《南雄志》一部、《瓊州志》一部、《雷州志》一部、《濮州志》一部、《丹徒志》一部、《吳縣志》一部、《慈溪志》一部、《新安文獻志》一部、《崖山志》一部、《鉛山志》一部、《德清志》一部、《桐廬志》一部、《孝豐志》一部、《鴈山志》一部、《武夷志》一部、《白鹿洞志》一部、《鎮遠志》一部、《成都志》一部、《重慶志》一部、《雍大記》一部。

雜類：《呂氏春秋》一部、《越絕》一部、《高麗圖經》一部、《太乙書》一部、《觀象玩占》一部、《釋名》一部、《方言》一部、《弘明集》一部、《博古圖》一部、《焦氏易林》一部、《釋道藏經目錄》一部、《天文祥異賦》一部、《道樞》一部、《乾象》一部、《遁甲圖局》一部、《內經素問》一部、《王氏農書》一部、《齊民要術》一部、《天文分野》一部、《三元參贊》一部、《大觀草本》一部、《玉髓經》一部、《地理發微》一部、《地理囊金》一部、《地理正途》一部、《玉機微義》一部、《青囊經》一部、《陰符經》一部、《地理樞要》一部、《步天歌》一部、《參同契》一部、《葬經》一部、《四十二章經》

<sup>84</sup>應是《昆陵志》。

一部、《醫經小學》一部、《靈棋經》一部、《本草集要》一部、《內經素問》一部、《爛柯經》一部、《東垣十書》一部、《欣賞編》一部、《丹溪纂要》一部、《適情錄》一部。

已上俱藏梅國書院內御書樓，用備誦讀考索。<sup>85</sup>

## 徵引書目

### 一、傳統文獻

- (明)李夢陽，《白鹿洞書院新志》，載白鹿洞書院古志整理委員會主編，《白鹿洞書院古志五種》，北京：中華書局，1995。
- (明)周偉等，《白鹿洞書院志》，載白鹿洞書院古志整理委員會主編，《白鹿洞書院古志五種》，北京：中華書局，1995。
- (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臺北：世界書局，1980。
- (明)張自烈，《芑山文集》，《叢書集成續編》188，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
- (明)焦竑，《國朝獻徵錄》，《明代傳記叢刊》111，臺北：明文書局，1991。
- (明)費案等，《嘉靖·廣信府志》，《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45，上海：上海書店，1990。
- (明)黃文鸞等，《正德·新城縣志》，《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46，上海：上海書店，1990。
- (明)劉節，《嘉靖·南安府志》，《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50，上海：上海書店，1990。
- (明)鄭廷鵠，《白鹿洞志》，載白鹿洞書院古志整理委員會主編，《白鹿洞書院古志五種》，北京：中華書局，1995。
- (明)黎喆等，《弘治·撫州府志》，《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47，上海：上海書店，1990。
- (清)毛德琦，《白鹿書院志》，《續修四庫全書》72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清)張廷玉，《明史》，《百衲本二十四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
- (清)趙之謙等，《光緒·江西通志》，《中國省志彙編》4，臺北：華文書局，1967。
- (清)蕭玉春等，《同治·永新縣志》，臺北：江西永新旅台同鄉文獻委員會，1976。

### 二、近人論著

---

<sup>85</sup>本書目之類例，乃當時梅國書院的私家分類，許多書籍的類目可能未盡合適，特請讀者留意。

(一)專書

何東紅、朱賽虹，《中國官府藏書》，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9。

李才棟，《江西古代書院研究》，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

陳榮華、陳柏泉、何友良，《江西歷代人物辭典》，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

趙連穩，《中國書院藏書》，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9。

鄧洪波，《中國書院章程》，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2000。

(二)期刊論文

文革紅，〈江西小說刊刻地--「雲林」考〉，《明清小說研究》第1期(2010.2)，頁212-219。

文毅，〈明代私人藏書興旺原因及特徵〉，《黔南民族師專學報》第2期(1999.3)，頁98-102。

王安春，〈明代江西廣信府的造紙業〉，《上饒師範學院學報》第4期(2001.9)，頁66-71。

王咨臣，〈江西最大的刻書作坊—潯灣書鋪街〉，《江西圖書館學刊》第2期(1992.7)，頁74；81。

王偉凱，〈明代圖書的國內流通〉，《社會科學輯刊》第2期(1996.3)，頁105-109。

王國強，〈中國古代藏書的文化意蘊〉，《圖書與情報》第3期(2003.8)，頁20-24。

王龍，〈明代閱讀活動發展的地域文化特點〉，《陰山學刊》第3期(2011.6)，頁25-29；2。

平雨，〈中國古代書院和出版業〉，《出版參考》，第22期(1995.11)，頁4。

朱黎明，〈略論中國藏書文化的人文主義精神〉，《江西圖書館學刊》第4期(2004.12)，頁83-84。

沈俊平，〈明中晚期坊刻制舉用書的出版及朝野人士的反應〉，《漢學研究》第27卷第1期(2009.3)，頁141-176。

胡兆量、黃恩涌、韓茂莉，〈中國人才地理特徵〉，《經濟地理》第1期(1998.3)，頁8-14。

唐朝暉、歐陽光，〈江西文人群與明初詩文格局〉，《學術研究》第4期(2005.4)，頁141-145。

張來芳，〈江西古代藏書家〉，《中國典籍與文化》第2期(1999.5)，頁23-25。

曹國慶，〈明代江西科第世家的崛起及其在地方上的作用〉，《中國文化研

究》第 4 期(1999.11)，頁 51-58；3。

陳冠至，〈明代江西地方官府藏書事業研究—以各級儒學為考察中心〉，《圖書資訊學刊》第 13 卷第 2 期(2015.12)，頁 29-66。

陳國生，〈明代人物的地理分布研究〉，《學術研究》第 1 期(1998.1)，頁 55-61。

陸漢榮、曹曉帆，〈古代書院藏書重要來源之一：書院刻書〉，《圖書館建設》第 1 期(1995.1)，頁 69-70。

舒原、余峰，〈中國書院的圖書徵集制度〉，《湖南大學學報》第 1 期(1998.2)，頁 32-33。

萬明，〈朱元璋的教育思想與明初的教育發展〉，《安徽史學》第 4 期(1994.10)，頁 16-19。

劉鳳、敖江彬，〈明代江西地域文化的特徵及其成因分析〉，《成功》第 9 期(2007.9)，頁 148-149。

編委會，〈歷代才俊出何方〉，《科學中國人》第 7 期(2001.7)，頁 39-41。

蔡儀、蔡小初，〈書院藏書談〉，《江西教育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1 期(2002.2)，頁 82-85。

鄧洪波，〈中國書院藏書的借閱制度〉，《江蘇圖書館學報》第 4 期(1998.8)，頁 15-18。

鄧洪波，〈試論書院藏書的管理體系〉，《圖書館理論與實踐》第 3 期(1996.8)，頁 44-46。

鄧洪波，〈簡論中國書院藏書的五個來源〉，《江蘇圖書館學報》第 1 期(1997.2)，頁 3-6。

蕭東發、鍾洪、王波，〈中國古代書院藏書概論〉，《圖書館》第 1 期(2001.2)，頁 70-75。

羅立、羅曉鳴，〈古代書院的藏書制度〉，《高校圖書館工作》第 4 期(2001.8)，頁 50-51；56。

### (三)學位論文

胡定鴻，《明代江西書院與科舉互動關係研究》，南昌：江西師範大學教育學院碩士論文，2008。

鄭飛，《明清江西書院學規初探》，南昌：江西師範大學教育學院碩士論文，2007。

(由衷感謝評審的細心審閱與指導意見，讓本文減少很多的錯誤，特此致謝)

## 板本研究

## 從清康熙刊《才調集》談古代書籍的代刻

郭明芳\*

書坊刻書多半以求售為目的，然亦有一種「代刻」業務。所謂「代刻」，即書坊代第三人刻書之謂。代刻書或是私人與書坊間刻書契約，刻成後或全歸第三人，或兩相分沾。歷來似未有談及「代刻」書問題，僅陳正宏在《東亞漢籍版本學初探》中〈越南漢籍裏的中國代刻本〉<sup>1</sup>一篇談有清代中國廣東代越南刻書情形。事實上，所謂「代刻」存在本土久矣。

自雕版印刷發展以來，有官府刻書、有書坊刻書，私人刻書較為少見，蓋私人於財力無法支應之故。隨著雕版印書擴展，加上明代以來商品經濟日益增強，私人刻書逐漸增加。然私人刻書多半止於家大業大或本身即有豢養刻工者，後者如吳興閔、凌二家。至於一般文人想要刻自己文集尚稱困難。沈津曾就明清書坊印於扉葉的書價進行討論，結論是縱使這時期雕版印刷十分發達，其書價仍屬高昂。換句話說雕版印書仍非一般人所能達成。書價的組成包括刻書、印書的成本，舉凡刻工、印工，以致於裝訂，門市販售均需考量成本。

明末透過書坊代刻書籍應已發展，且甚發達。筆者曾在一篇討論天啟間刊印的《籌海圖編》分析該書為胡宗憲後人與書坊之間合作的產物<sup>2</sup>。當然此類例子尚多，延及清代亦見之，其中清康熙四十三年垂雲堂刊韋穀《才調集》亦可一探。

《才調集》今日僅見明萬曆刊本，以及崇禎間汲古閣刊本。入清以後，以康熙四十三年汪氏垂雲堂刊本為著稱。然而汪氏垂雲堂刊本或有著錄「宛委堂刊本」。其兩者關係如何，是書為前後書版轉移，或借版刷印，或是書坊代刻，前人多未論及。<sup>3</sup>以致於同一書或著錄汪氏垂雲堂刊本，或著錄宛委堂刊本，

\* 東吳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sup>1</sup> 北京市：百家出版社，頁 125-142，2014 年 11 月。

<sup>2</sup> 見拙撰〈籌海圖編在明末清初流傳研究--兼談版本學上本衙藏版為坊私合作可能性〉，《古文獻整理與研究》（陝西省社科院編，北京市：中華書局）第 2 輯，頁 87-118，2016 年 11 月（實際發行時間在 2017 年 8 月）

<sup>3</sup> 僅知探究《才調集》版本專文有：

1. 劉瀏〈才調集版本源流考〉，《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10 年 4 期，頁 78-81，2010 年 7 月。

2. 周小豔〈二馮校本才調集考略〉，《中國典籍與文化》2013 年 2 期，頁 101-104，2013 年 4 月。

又由於扉葉有「二馮先生」字，或如中國國圖著錄「馮氏宛委堂」刊本等。

林陶村先生曾就此問題提出自己的見解，且合於事實，然未有確切結論，其云：

**刊本雖異，其實兩家版本當互有關聯。**宛委堂本板心有「垂雲堂」三字，可證垂雲堂本問世在宛委堂本之前，很可能是商業間的快速覆刻，畢竟是暢銷書嘛！或者同業借用板片，改個書名頁，也許值得方家深入考證。<sup>4</sup>

另外，學苑汲古網站<sup>5</sup>著錄北大藏本，「是書有康熙四十三年垂雲堂原刻本，其後板歸宛委堂，鐫『宛委堂藏板』。此鐫『宛委堂發兌』者為當時翻刻本。」其說是否恰當？前有「藏版」者為轉版，經比對有「發兌」者亦為同版，怎麼可能無照相、影印技術下，同一書可以翻刻如此相同？

就此問題，筆者不認為是轉版。是書之所以有兩個堂號，其前後應有不同，亦即有「發兌」者為有償借版刷印經銷印記，有「藏版」者為書版轉移印記。前者是否涵蓋有書坊「代刻」而刷印販售，亦需進一步討論。

此書為汪氏所刊無疑。汪氏者，汪瑤字文珍，安徽新安人，生平未詳。垂雲堂或為其室名。據〈才調集序〉稱：

近日諸家尚韋穀《才調集》，爭購海虞二馮先生閱本為學者指南，轉相撫寫，往往以不得致為憾。甲申春，余獲交鈍吟次君，服之馮丈，始知汲古閣毛氏所藏鈍吟手閱定本，默庵評閱附載其中，丹黃甲乙，各有原委，其從子簡緣先生實能道其所以然。因托友人假汲古閣所藏，並影寫宋刻，取沈刻本暨錢校本，重加校讎，而乞例言于簡緣，遂謀登梓。庶同志者感佩兩先生嘉悉後學之德，且不慮撫寫之難云。康熙甲申八月新安後學汪文珍書城氏謹識。

序言「甲申春，余獲交鈍吟次君」，此稱甲申為康熙四十三(1704)年，鈍吟即馮班(1602-1671)。汪文珍因得交馮班次子而知有馮閱本《才調集》。而在此之前，馮本以為眾所周知，並爭相傳抄購置。汪文珍透過友人借得汲古閣藏馮氏原本，並就錢、沈二本重校並謀付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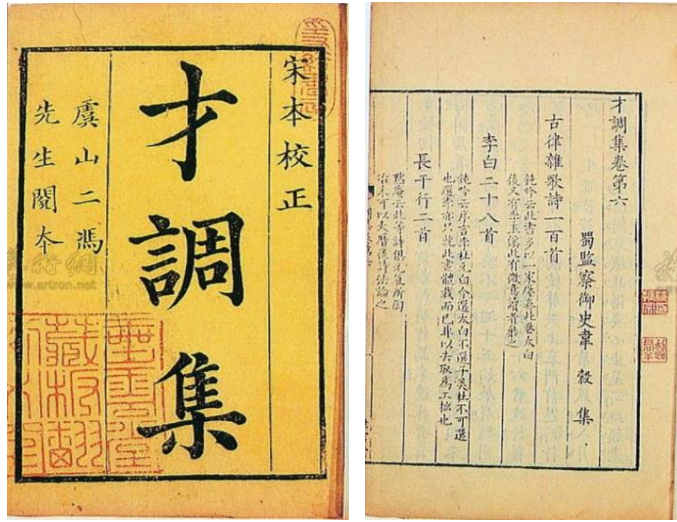
今檢美國國會圖書館著錄一部版式行款為左右雙欄，每半葉八行、十九字，版心白口，單黑魚尾，魚尾下書「才調集」，卷次與葉次，版心下緣有「垂

<sup>4</sup> 文見老淘臉書，現筆者附文本文之末。

<sup>5</sup> 網址：<http://rbsc.calis.edu.cn:8086/aopac/jsp/indexXyjc.js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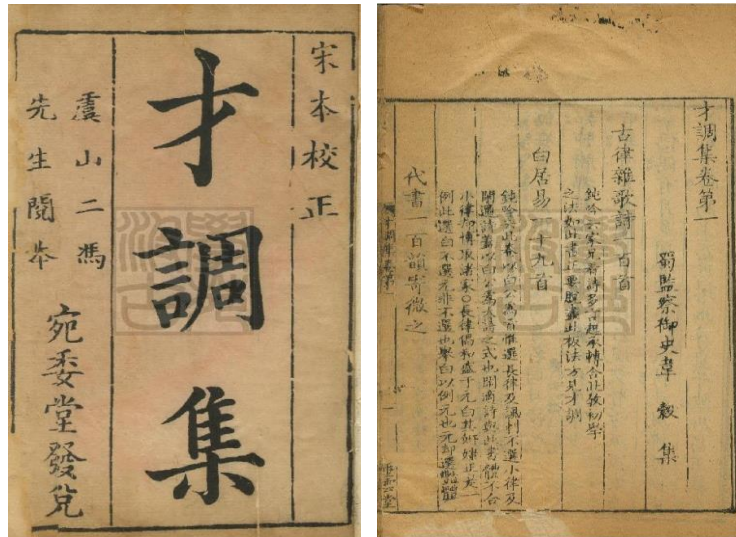


雲堂」字者，即當年汪氏刊本。此本又有該館附記：「1929年4月3日入藏，入藏號379064。康熙甲申八月新安後學汪文珍書城氏識語。書名頁右方題『宋本校正』，中縫下題『垂雲堂』。鈐有『垂雲堂藏板』印」。無獨有偶地，上海朵雲軒1997年春拍上拍號731號出現一部《才調集》(存一函兩冊)，扉葉敘述與國會館同，然無「垂雲堂」印並鈐有「垂雲堂藏版翻刻必究」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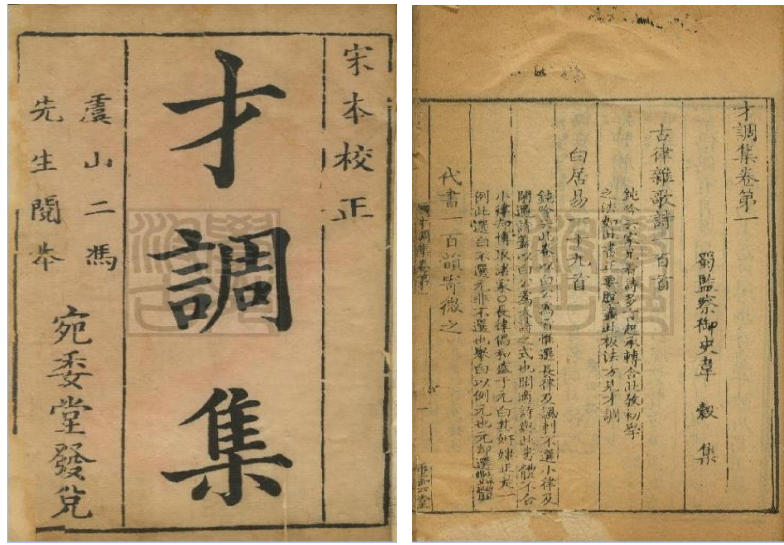


朵雲軒上拍書影

此應垂雲堂所刊無疑。然而北大與加拿大哥倫比亞大學所藏與垂雲堂刊本同版，扉葉均作「宛委堂發兌」，所不同者，北大作「宛委堂刊本」，哥倫比亞大學則作「垂雲堂刊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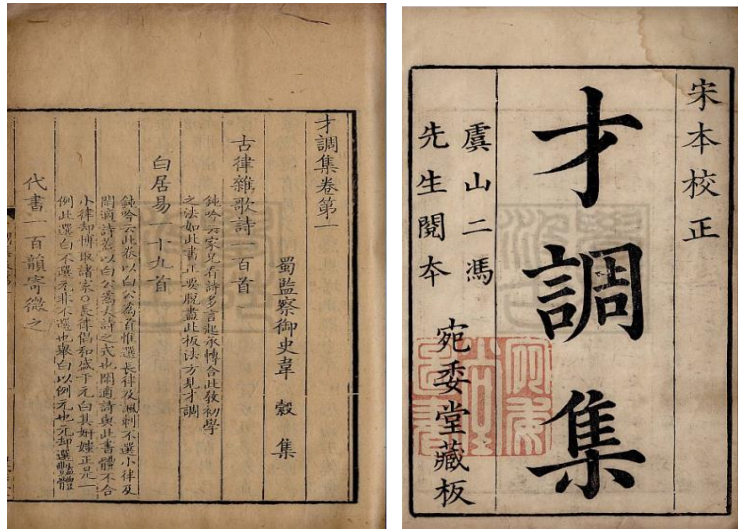
北大藏委宛堂刊本書影



加哥大藏垂雲堂刊本書影

此二本均左右雙欄，每半葉八行、十九字，版心白口，單黑魚尾，魚尾下書「才調集」，卷次與葉次，版心下緣有「垂雲堂」字。再核兩本字畫均一，應同版所印。北大本有扉葉，作：「宋本校正。才調集。虞山二馮先生閱本/宛委堂發兌。」

另見有蘇大藏本，字畫較為清晰，應較早所印。其扉葉與前述北大與加哥大藏本同，惟將「發兌」改「藏版」並鈐「宛委堂圖書」印。而為何如此？



蘇大藏本書影

若說垂雲堂書版轉移至宛委堂，則以實物對照頗有扞格不合，較晚的宛

宛委堂藏版本竟比較早的宛委堂發兌本為清晰。轉版之說則不予考慮。

筆者主張此書為汪氏安徽垂雲堂所刊，然汪氏或財力不足，進而與書坊宛委堂合作刊行此書。刊成後，汪氏得書若干，版心刻「垂雲堂」，扉葉或鈐「垂雲堂藏版」、「垂雲堂藏版翻刻必究」等印，用以宣示此書為汪氏所刊。同時，代刊書的宛委堂不僅書版藏於其處，又獲得書籍刷印權，將扉葉改「宛委堂藏版」（此本應較早）或「宛委堂發兌」，用以經銷發售。如此，雙方各得其利。其後，書版為宛委堂所得，又另行刷印販售。

按，**宛委堂**，瞿勉良編《中國古籍版刻辭典》<sup>6</sup>頁 402 著錄有「宛委堂」與「宛委山堂」似與此不符。其著錄「宛委山堂」為明末清初洛陽人李際期的室名。際期字更生。未言有刻過《才調集》。又著錄「宛委堂」為明嘉靖間浙江嘉興人項德棻室名，亦未言刻有此書。至於垂雲堂或汪瑤、汪文珍則未見著錄。

檢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夏樹芳著《奇字通》著錄「天啟四年宛委堂刊本」。

又於學苑汲古網站檢得宛委堂刊印不少宋瑩刊書籍，如中國民大館藏《顧嗣立詩選》一卷，註記云：「康熙癸未(42年)宋瑩序言刻書事。『曆』不諱。封面又鐫十五子姓名及字號。《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集部總集叢編 386、《中國叢書綜錄》1 第 874 頁均著錄為『宋氏宛委堂刻本』，參館藏 SG4171/821-1(538527)封面所鈐『姑蘇閭門內吳趨坊徐河橋北塊宛委堂書舖發兌』印，疑誤。」又該館藏顧棫編《歸錢尺牘》五卷，有扉葉，作「宛委堂發兌」，卷末鐫「虞山如月樓刊」長方木記，版心下鐫刻工名「敬公」、「公勝」等。另北大藏同書則另鈐「宛委堂圖書」印。此印與上述《才調集》同。



中國民大館藏《歸錢尺牘》書影



宛委堂發兌印書影

又鄭州大學藏陳維崧輯、蔣國祥校訂《篋衍集》十二卷，扉葉作「宜興

<sup>6</sup> 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2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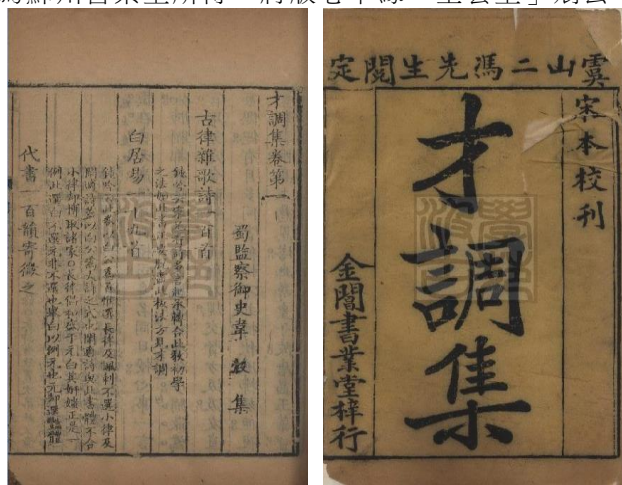
陳其年先生元本/芸暉草堂藏板」並鈐印「姑蘇閶門內吳趨坊徐河橋北塊宛委堂書鋪發兌」。蔣國祥蘇州人，臺灣首任知府蔣毓英之子，清初刻書家，曾校刻有《兩漢紀》、《臺灣府志》。

又上海朵雲軒 2013 年上拍一部《才調集》(拍號 2021 號)，有扉葉作「宛委堂藏版」並鈐宛委堂凌氏藏書章記」。或可知凌氏為宛委堂主人。



朵雲軒 2013 年上拍書影

據此，或可知宛委堂當清初康熙間蘇州凌氏代刻或經銷各地圖書之書肆。此書書版後來為蘇州書業堂所得，將版心下緣「垂雲堂」剝去，再刷印梓行。



南開藏後印本

本文嘗試就康熙四十三年刊行之《才調集》作考察，一般著錄同一年內有兩種刻書堂號，蓋由於此書之刻乃私人委諸書坊，刻成後，均沾書籍，又各自標記版權所所致。此類「代刻」書籍少有探討，《才調集》如此，清初蘇州想必也有，如寶翰樓<sup>7</sup>，其餘各地應也是如此，尚待再探究。

<sup>7</sup> 寶翰樓部份詳拙撰〈從蘇州寶翰樓出版品看清初出版文化〉，《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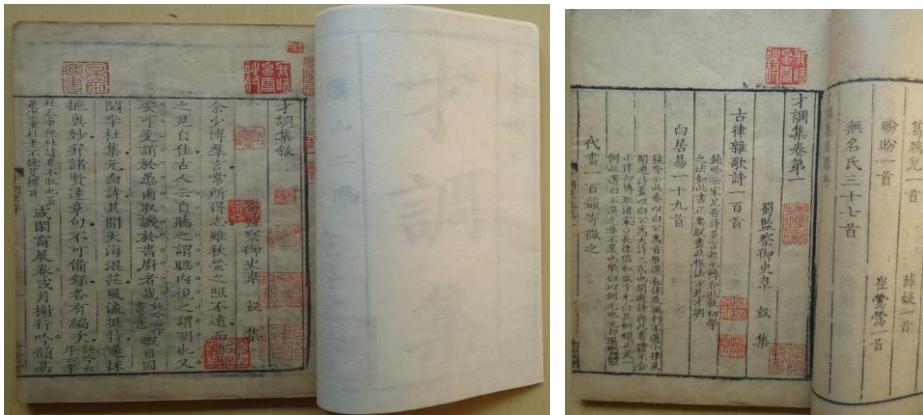
## 附錄：林陶村撰〈康熙宛委堂本才調集〉

「才調」兩字，臺灣上了年紀的老一輩，大抵都耳熟能詳，其意義略同本事、本領等。才調一詞，可能起源甚早，至少唐人選詩就有著名的《才調集》一書，此書版本複雜，但明末清初刊本，都可算是稀見之書了。《才調集》是蜀監察御史韋穀編集。年輕時代好聚書，曾買了一套精裝本舊詩選本，包括《唐人選唐詩》、《元人選元詩》、《明人選唐詩》等。其中《唐人選唐詩》是明人毛晉的崇禎元年彙刊本，收有唐詩選本九種，我之知有《才調集》自茲始。

十數年之後，再於舊肆買到康熙四十三年宛委堂刊本。此本為海虞二馮先生評閱本，二馮即馮默庵、馮鈍吟，是清初風行的唐詩選本，新安汪文珍跋後有云：「近日詩家尚韋穀《才調集》，爭購海虞二馮先生閱本，為學者指南，轉相模寫，往往以不得致為憾。」此跋反應書市趨勢，也是汪文珍重新校刊動機。

汪文珍跋語，又交代版本來源，即假汲古閣所藏鈍吟手閱定本，再借影寫宋刻及沈刻本、錢校本等參校重刊。檢閱古籍書目，康熙四十三年刊本《才調集》，版本有二，一是垂雲堂藏板本，一是宛委堂刊本。前者有四冊本與五冊本，藏大陸國圖，後者僅見臺大圖書館著錄。刊本雖異，其實兩家版本當互有關聯。宛委堂本板心有「垂雲堂」三字，可證垂雲堂本問世在宛委堂本之前，很可能是商業間的快速覆刻，畢竟是暢銷書嘛！或者同業借用板片，改個書名頁，也許值得方家深入考證。

總之，同年兩本並存的情形，很像道光間兩廣節署與翰墨園的六色套印杜詩，長得有如孿生兄弟，出版史上類似的案例，所在多有，且舉此例分享同道！（2017.12.23）



## 文獻整理

### 蕭繼宗〈含羞草賦〉考釋

吳福助 顧敏耀\*

#### 【作者】

蕭繼宗(1915-1996)，字幹侯，湖南湘鄉婁底鎮人。中央政治學校法律系畢業。曾任皖報社社長、青島市新聞處長、江蘇省政府參議、陸軍總司令部上校副組長等職。1955年8月，執教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講授大一國文、各體文選、歷代文選、楚辭、詞曲選等課程。1959年接長中文系主任。1965年9月，赴美國加里福尼亞州立大學(UCLA)講學一年。1969年11月任「文史研究所籌備委員會」委員，負責籌備中國文學研究所事宜。1970年6月接長中國文學研究所主任。1972年8月又接長中國文學系主任。1974年2月兼教務長。1975年6月起，轉任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央委員會副秘書長、正中書局董事長、臺灣大學中文系兼任教授。著有《實用詞譜》、《孟浩然詩說》、《友紅軒詞》、《獨往集》、《興懷集》、《湘鄉方言》、《花間集評校》、《麝塵蓮寸集評訂》等書。先生除作育英才外，並從事文藝創作與文化工作之推廣，於1994年5月，榮獲國家文藝獎特別貢獻獎<sup>1</sup>。

#### 【提要】

含羞草，學名 *Mimosa pudica* Linn.。英文俗稱 Humble-plant、Sensitive Plant 等。日文稱「御辭儀草」(おじぎそう)，或「眠り草」(ねむりぐさ)。中文又名知羞草、呼喝草、怕醜草、羞謫草、怕羞草、指佞草、怕癢花、懼內草、愛暈草、假死草、感應草等。閩南語則稱見笑草(kiàn-siàu-chnáu)，或驚撓草(kia<sup>n</sup>-ngiau-chnáu)。豆科(Leguminosea)，含羞草屬(Mimosa)。多年生草本植物。莖常為綠紫色，密生細毛與銳刺。葉對生，二回羽狀複葉，具長柄。觸碰時因葉柄膨壓作用，葉片閉合，葉柄下垂。花為紫紅色，小型繡球花狀。莢果扁平彎曲。可入藥，能鎮靜安神，清熱解毒。原產於熱帶南美洲，17世紀年間由西洋人引入台灣<sup>2</sup>。

含羞草，清代台灣方志屢有記載，例如：「含羞草：高二、三寸，葉似槐，

\* 吳福助，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退休。顧敏耀，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

<sup>1</sup> 參考：(1)謝鶯興、高于婷〈蕭繼宗先生著作目錄〉，《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新第45期，2005年6月。(2)王建生《蕭繼宗先生研究：生平交遊篇》，臺北：華藝學術出版社，2015年8月初版。

<sup>2</sup> 李岡榮、鄭元春《常見的台灣青草藥：300種常見的青草藥植物》第2冊(台北：西北國際，2012)，頁106-109。

瓜之，葉即下垂，如婦女含羞然。」<sup>3</sup>又：「見笑花：即含羞草。花黃，葉似槐，瓜之下垂。」<sup>4</sup>等。清領時期遊宦文人屢有相關詩作，如孫元衡〈羞草〉：「草木多情似有之，葉憎人觸避人嗤。也知指佞曾無補，試問含羞卻為誰？」<sup>5</sup>、張若靄〈含羞草〉：「萱花自昔可忘憂，小草如何卻解愁？為語世人休怪詫，風情太甚要含羞。」<sup>6</sup>等。

日治時期澎湖造林時，含羞草曾被指定為植栽：「以草埔為中心。左右植含羞草及蔓荊在堤防間，亦作高低，在低部則植主本，在高部則植副本及含羞草。」<sup>7</sup>當時亦有不少漢詩作品以含羞草為題，如莊櫻癡〈含羞草〉：「仙茅能縮又能伸，屈軼貞心不媚人。未許癡愚來染指，豈容輕薄近相親。」<sup>8</sup>劉雲從〈含羞草〉：「青青遙看滿江濱，映日迎風色又新。最愛含羞嬌體態，王孫多少往來頻。」<sup>9</sup>詩人們不約而同地，都以擬人手法，書寫此一特殊植物。

綜觀台灣清領時期、日治時期至戰後以來的諸多賦作，頗有不少以特定植物為主題者，譬如朱士玠〈夾竹桃賦〉讚嘆夾竹桃是造物者的神奇創造，林萃岡〈秋牡丹賦〉歌頌花王的夔然獨絕，卓肇昌〈荊桐花賦〉暗寓作者「珊瑚骨節」的自我期許，許式金〈雁來紅賦〉凸顯不與爭春的特質等<sup>10</sup>。蕭繼宗〈含羞草賦〉為迄今僅見的，以含羞草為主題的賦作。此賦收錄於蕭繼宗《興懷集》（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0，頁6）。該書目錄頁標示此篇的寫作時間與地點為：「六十二年癸丑·台中」，亦即西元1973年，當時作者正擔任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兼系主任。作者於文末自註云：「含羞草，英人謂之謙草（Humble plant），則比德於君子，抑又進矣。」含羞草是東海大學校園早期普遍常見的植物，作者看到校園內隨處生長的含羞草，它受到外力刺激後，葉片會收縮下垂，這種特殊習性，誠然可以比德於謙謙自牧的君子。作者緬懷

<sup>3</sup> 周鍾瑄主修，《諸羅縣志》（台北：大通書局，1987），頁224。

<sup>4</sup> 沈茂蔭《苗栗縣志》（台北：大通書局，1987），頁84。

<sup>5</sup> 孫元衡《赤崁集》（台北：大通書局，1987），頁63。或云為張湄之作，見董天工《台海見聞錄》（台北：大通書局，1987），頁59。

<sup>6</sup> 范咸纂輯《重修台灣府志》（台北：大通書局，1987），頁796。或云為張湄之作，見董天工，《台海見聞錄》，頁59。或云為范咸之作，見盧德嘉《鳳山縣採訪冊》（台北：大通書局，1987），頁516。

<sup>7</sup> 不著撰者〈澎湖造林設計〉，《漢文台灣日日新報》，1910年11月18日，第5版。

<sup>8</sup> 《詩報》，第40期，1932年8月1日，頁3。

<sup>9</sup> 《詩報》，第41期，1932年8月15日，頁6。

<sup>10</sup> 廖國棟〈台灣詠物賦主題之研究〉，《南台學報》，第38卷第4期，2013年12月，頁229-254。

平生，慨嘆時事，因而深情地撰寫此賦，藉以書寫心志，並記錄校園早期風貌。如今東海校園由於長年採用機器割草除地，含羞草幾乎已被剷除淨盡，罕見芳蹤了。此賦不但為台灣四百年來首篇以含羞草為題的賦作，也是東海大學校園文學開創先鋒的唯一賦作，誠為彌足珍貴的東海校史文獻。

本賦採用擬人化的手法，多視角全方位地具體描繪刻劃含羞草的特殊習性和狀貌，從而塑造含羞草既嬌羞答答，婀娜多姿，而又有為有守，堅貞固執，足以比德於謙謙君子的風姿。作者超脫平庸，充分發揮創造性想像力，藝術形象生動飽滿，細膩感人，兼又能突顯地方風物特色，令人愛誦不已。

賦文依韻可分為三段。首段韻腳「土」、「羽」、「圃」、「雨」、「舞」、「主」、「俯」、「侮」，皆屬上聲韻，除了「主」屬六語韻之外，其餘皆屬七虞韻。次段韻腳「雯」、「勻」、「伸」、「人」、「雲」、「巡」、「顰」、「春」，皆屬上平聲韻，除了「雯」與「雲」屬十二文韻之外，其餘皆屬十一真韻。末段又回到上聲韻，韻腳「始」、「芷」、「紫」、「止」、「子」、「恥」、「矢」、「齒」、「市」、「氏」，皆屬四紙韻。作者運用押韻結構營造不同的氛圍，始之以謹飭節制，繼之舒坦開闊，收束則端嚴肅穆，音韻感覺呼應著段落的主題內容，獨具匠心。

### 【原文】

芄芄弱卉<sup>1</sup>，盛生南土<sup>2</sup>。蕊聚垂旂<sup>3</sup>，葉分展羽。既族殖於丘原<sup>4</sup>，亦羅生于階圃。若采翟<sup>5</sup>兮迎風，比巴且<sup>6</sup>兮沐雨。莖不謝<sup>7</sup>兮蟻緣<sup>8</sup>，花不辭<sup>9</sup>兮蝶舞。方鋪荼<sup>10</sup>兮搖曳，固舒張而自主。若外物之見侵，斯葉合而枝俯。森剌棘<sup>11</sup>以亢身<sup>12</sup>，亦莫敢兮予侮。

### 【考釋】

1. 〔芄芄〕音ㄉㄨㄣˊ ㄉㄨㄣˊ，草木繁茂的樣子。《詩經·鄘風·載馳》：「我行其野，芄芄其麥。」
2. 〔南土〕南方地區，此指台灣。
3. 〔垂旂〕形容花蕊披散的樣子。旂，音ㄉㄨㄣˊ ㄨㄛˊ，同「旒」，旌旗下垂的飄帶之類飾物。
4. 〔丘原〕山丘與平原。
5. 〔采翟〕彩色的長尾野雞。翟，ㄉㄨㄣˊ ㄨㄛˊ，長尾的野雞。《書·禹貢》：「羽畎夏翟。」
6. 〔巴且〕芭蕉，或作「巴苴」。《漢書·司馬相如傳上》：「諸柘巴且。」
7. 〔謝〕推卻、拒絕。
8. 〔緣〕攀爬。



9. 〔辭〕拒絕、不接受。
10. 〔鋪葦〕繁多茂盛貌。班固〈西都賦〉：「五穀垂穎，桑麻鋪葦。」葦，音ㄘㄨㄛˊ，通「紛」，茂盛貌。
11. 〔森剌棘〕森，挺立排列的樣子。剌棘，音ㄌㄨˋ ㄩˋ ㄇㄛˋ，尖刺。
12. 〔亢身〕立身，置身。亢，同「抗」。宋岳珂《程史·吳畏齋謝贄啟》：「抗身以衛社稷。」

### 【散釋】

枝葉繁茂，看起來很柔弱的含羞草，在南方的大地上，分佈得相當普遍，生長得非常良好。花蕊聚成一球向下低垂，葉子就像羽毛一樣開展著。成群在山丘與平原上繁殖，也長在台階與花圃上。宛似雉雞般迎著風，又如芭蕉沐浴在雨中。莖枝不拒絕螞蟻往上攀爬，花朵也不推卻蝴蝶前來飛舞。茂盛的羽葉搖曳動盪，舒展自如。如果有別人前來侵犯，葉片就會合攏起來，葉柄也同時往下低垂。身上長滿了小刺，保護著自己，沒有人敢來隨便欺負。

### 【原文】

當夫日上錦雯<sup>1</sup>，露轉珠勻。慵眸漸展，倦腕徐伸。弱顏兮固植<sup>2</sup>，誠婉婉<sup>3</sup>兮佳人。明璫<sup>4</sup>兮翠羽<sup>5</sup>，素月兮柔雲<sup>6</sup>。態易倦而婀娜<sup>7</sup>，足將進而逡巡<sup>8</sup>。腮透脂而浮暈，眉舒黛而轉顰<sup>9</sup>。知守身之如玉<sup>10</sup>，獨脈脈<sup>11</sup>而含春<sup>12</sup>。

### 【考釋】

1. 〔錦雯〕多彩的朝霞。雯，ㄨㄣˊ，形成花紋的雲彩。
2. 〔弱顏兮固植〕弱顏，含羞的容顏。固植，堅貞的心志。「植」，通「志」。《楚辭·招魂》：「弱顏固植。」
3. 〔婉婉〕ㄨㄢˊ ㄨㄢˊ，柔順的樣子。《禮記·內則》：「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婉聽從。」
4. 〔明璫〕用珠玉串成的耳飾。三國魏曹植〈洛神賦〉：「無微情以效愛兮，獻江南之明璫。」
5. 〔翠羽〕翠鳥的羽毛。古代多用作飾物。此指用翠鳥羽毛裝飾的髮釵。《文選·曹植〈七啟〉》：「戴金搖之熠燿，揚翠羽之雙翹。」劉良注：「金搖，釵也。熠燿，光色也。又飾以翡翠之羽於上也。」
6. 〔素月兮柔雲〕素月，潔白的月亮，形容臉龐。柔雲，形容秀髮。
7. 〔婀娜〕輕盈柔美的樣子。
8. 〔逡巡〕徘徊不進、滯留。逡，音ㄑㄨㄢˊ。
9. 〔眉舒黛而轉顰〕黛，青黑色的顏料，古時女子用以畫眉。黛眉，特指女

子之眉。𦉰，ㄉㄨㄛˇ，皺眉。

10. 〔守身之如玉〕潔身自愛，保持品德和節操，不為外物所移。
11. 〔脈脈〕形容藏在內心的思想感情，有默默地用眼睛表達情意的意思。唐杜牧〈題桃花夫人廟〉：「細腰宮裏露桃新，脈脈無言幾度春。」
12. 〔含春〕指帶著笑容。《明珠緣》第 41 回：「盈盈粉面媚含春，疑是凌波出洛神。」

### 【散釋】

當早晨的太陽伴隨朝霞出現，露水滾動流轉，恍如圓珠。慵懶地張開惺忪的睡眼，緩慢地伸展軟弱的手臂。容顏雖然含羞答答，心志卻是堅貞無比，誠然是溫柔婉約的俏麗佳人。耳戴珠玉串成的明璫，頭插翠羽裝飾的寶釵。素淨的臉龐有如月亮，秀髮更像烏雲一般。神情看似疲乏慵懶，體態卻是婀娜多姿。蓮步像要前移，卻又遲疑徘徊。臉頰白皙，泛著紅暈。雙眉烏黑，既開展舒懷，轉瞬又斂蹙憂愁。雖然堅持固執，守身如玉，偏又含情脈脈，經常微笑盈盈。

### 【原文】

若乃驚飆<sup>1</sup>掩<sup>2</sup>至，暑餘秋始。或拔木而偃<sup>3</sup>林，固摧蘭而敗芷<sup>4</sup>。於是欽翻<sup>5</sup>收青，遺榮<sup>6</sup>曳紫。側身<sup>7</sup>處變，時止則止。其謙謙以自牧<sup>8</sup>，則豈弟<sup>9</sup>之君子。處富貴而不淫<sup>10</sup>，安賤貧而不恥。弗枉尺以直尋<sup>11</sup>，寧潔身以自矢<sup>12</sup>。懼干進<sup>13</sup>之可羞，懷相鼠之有齒<sup>14</sup>。貴全身於叔季<sup>15</sup>，謝紛華於朝市<sup>16</sup>。守知足之不辱<sup>17</sup>，庶<sup>18</sup>無慚於老氏<sup>19</sup>。

### 【考釋】

1. 〔驚飆〕突發的暴風；狂風。三國魏曹植〈吁嗟篇〉：「驚飆接我出。」
2. 〔掩至〕突然偷襲而來。
3. 〔偃〕音一ㄩㄢˇ，倒伏。
4. 〔固摧蘭而敗芷〕蘭芷，蘭草與白芷。皆香草。《楚辭·離騷》：「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
5. 〔翻〕音ㄈㄢˇ，鳥類的翅膀。此指葉片。
6. 〔榮〕花朵。
7. 〔側身〕置身。
8. 〔謙謙以自牧〕恭敬謙虛地自我修養。《易·謙》：「謙謙君子，卑以自牧。」

- 孔穎達疏：「恒以謙卑自養其德也。」按本賦作者自註云：「含羞草，英人謂之謙草(Humble plant)，則比德於君子，抑又進矣。」錄供參考。
9. 〔豈弟〕即「愷悌」，和樂平易。《左傳·僖公十二年》：「《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杜預注：「愷，樂也；悌，易也。」
  10. 〔富貴而不淫〕不為金錢、地位所迷惑。《孟子·滕文公下》：「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11. 〔枉尺以直尋〕比喻小有所損，而大有所獲。《孟子·滕文公下》：「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朱熹《集注》：「枉，屈也；直，伸也。八尺曰尋，所屈者小，所伸者大也。」
  12. 〔矢〕發誓。
  13. 〔干進〕謀求仕進。《楚辭·離騷》：「既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祗？」
  14. 〔相鼠之有齒〕出自《詩經·鄘風·相鼠》，該篇共三章。根據〈詩序〉：「相鼠，刺無禮也。」首章二句為：「相鼠有皮，人而無儀。」全篇內容在諷刺不注重禮儀的人和禽獸沒有兩樣。後用以諷刺或比喻無禮。《幼學瓊林·卷四·鳥獸類》：「人惟有禮，庶可免相鼠之刺。若徒能言，夫何異禽獸之心。」按：《詩經》〈相鼠〉所謂的老鼠，是特指「拱鼠」，黃鼠的別名。《關尹子·三極》：「聖人師蜂立君臣，師蜘蛛立網罟，師拱鼠制禮，師戰蟻置兵。」南朝宋劉敬叔《異苑》：「拱鼠形如常鼠，行田野中，見人即拱手而立，人近欲捕之，跳躍而去。秦川有之。」參閱明李時珍《本草綱目·獸三·黃鼠》。
  15. 〔叔季〕末世。《魏書·釋老志》：「叔季之世，闇君亂主，莫不眩焉。」
  16. 〔紛華〕繁華，富麗。《史記·禮書》：「出見紛華盛麗而說，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心戰，未能自決。」
  17. 〔朝市〕本指早市。《周禮·地官·司市》：「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此處泛指名利之場。晉陶潛〈感士不遇賦〉：「擁孤襟以畢歲，謝良賈於朝市。」
  18. 〔知足之不辱〕自知滿足，就不會招致羞辱。《老子》：「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19. 〔庶〕相近、差不多。
  20. 〔老氏〕指老子。漢張衡〈東京賦〉：「思仲尼之克己，履老氏之常足。」

【散繹】

至於暴風突然來襲，那是夏末秋初的時節。把樹木連根拔起，樹林整個倒伏在地，花花草草都被摧殘殆盡。此時只好把青翠的葉片收斂起來，不過還留下紫色的花朵拖曳著。置身於風雲變色之際，應該停下腳步的時候就要停下來。恭敬謙虛地修養自己，儼然是安樂和易的翩翩君子。不為金錢或地位所迷惑，身處於貧賤之中也不會感到羞恥。不肯斤斤計較而貪求事物，寧願以潔身自愛來自我要求。畏懼因為謀求仕進而不知羞恥，更要效法「拱鼠」遵守禮儀，不可不倫不類，被人譏刺。在亂世能夠保全自身是很可貴的，在名利之場也要不炫目於繁華熱鬧。認真遵守著「知足就不會招來羞辱」的原則，差不多就可以不愧於研讀過道家經典名著《老子》一書了。



草叢中的含羞草

## 研究資料彙編

## 徐復觀教授研究資料彙編--近人對徐復觀之政治、文化的研究(二)

謝鶯興\*

11. 〈專制政治·儒家精神·現代自由主義：徐復觀政治思想述論〉，胡治洪，  
《人文論叢》，2008年5月。

按：本篇文章收於《中國哲學史學會 2004 年年會暨中國傳統哲學當代價值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目前尚未查得哪間圖書館典藏，僅暫據網路資料所見。「內容提要」說：「本文比較全面地梳理了徐復觀先生的政治思想，並參照現代自由主義的基本理念，對徐先生的儒家政治觀進行了勾稽和評價。」以下分數個單元論述。

「前言」提出徐復觀半生學術事業的最突出、也是最具現實意義的成就，乃在於他通過對中國思想史的爬梳剔抉和對西方現代社會政治的深入查究，從而對古今一切專制政治的無情批判、對中西政治思想及實踐之優長和缺失的軒輊批評、以及對儒家德性民主精神的熱烈闡揚。

第一單元概述徐氏切身體驗了現實政治的無比沉重，同時切近而深刻地認識了現實政治的黑暗，從而以各種方式對之進行了揭露和批判。以〈我所瞭解的蔣總統的一面〉及一般地論及現實政治時，徐先生的措辭為例，說明民國時期的政治狀況。

第二單元討論對於現實政治的厭惡與痛恨導致徐氏在其思想史研究中深入掘發了專制體制的歷史淵源。徐氏認為「秦漢以上，有封建而無專制。」到了秦統一天下，根據法家長期所追求的政治形態而建立了「典型專制政治」，中國歷代沿用了二千年。分別論述在專制體制的牢籠下，社會各層面各群體都遭到荼毒或壓迫，從家族、諸侯、知識分子皆無法避免，著重探討專制體制下的知識份子的命運必然是悲劇性的，以及知識份子性格演變出的「曲學阿世派」。專制政治下的人民大眾，作為專制政體理論基礎的法家思想，有其歷史具體的肯定，通過一個強有力的政治控制力搏集在一起等，徐氏從客觀趨勢肯定了專制政治的歷史合理性，都可體現其思想方法中的辯證因素。

---

\* 東海大學圖書館流通組組員

第三單元概述五四以來，中國知識份子對於歷史與現實中的專制政治基本上都是持批判態度的。徐氏提出「中國文化的層級性」，從學理上對專制政治與儒家傳統進行了分疏，就儒家傳統卻何以往往被視作與專制政治同質的觀念形態，認為是由儒家的特質所決定，專制政治對於儒家的利用便是儒家背負這一惡名的客觀原因。其典型事例就是所謂「三綱」說的產生過程。同時也指出徐氏認為儒家傳統也存在著局限性，某些觀念具有增加專制政治的負面內涵的潛勢。就因儒家傳統與專制政治之間存在著這些錯綜複雜的關係，所以，徐氏立志對二者加以分疏從而闡揚儒家真精神。

第四單元提出徐氏明確指出，儒家社會政治思想具有甚至富於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的精神。分：1.自由。根據現代自由主義的基本理念，區別於一般自由或主觀感覺自由的社會政治範疇的自由。2.平等。儒家擁有豐富的思想資源，義務是發自各人的德性，德性是平等的，所以義務也是平等的。因為是平等的，所以它是雙方的而不是片面的。3.民主。儒家的民本思想，不是指人民作為統治者進行統治的根本，在儒家政治思想中，以民為本與以民為主乃是一脈貫穿的。4.法治。現代自由主義的法治理念即指「法律的統治」。若將法解釋為政治上所應共同遵守的若干客觀性的原則，及由此等原則而形之為制度，見之於設施，則接近於法治主張。作者提出中西傳統容或在思想出發點上存在著互有責權的集體主義與原子式個人主義的差異，但要之儒家真精神與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社會政治價值決不是根本異在或完全反對的價值體系，二者恰恰具有極大的互補性。

第五單元探討儒家缺乏關於制度安排的構想，以至其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思想精髓基本上止步於一種精神訴求。涉及權原認定與德、政(德、法)劃界，現代自由主義在制度安排方面有其獨到的長處。然而，對於現代自由主義在理論和社會政治實踐方面的深刻困境，徐氏認為儒家精神中卻擁有豐富的資源可以給予補救。點出「儒家的政治思想必歸結於民主政治，而民主政治之應以儒家思想為其精神之根據」，[132]這就是徐復觀先生政治思想的「大綱維」

第六單元認為徐氏學術事業的最有意義的貢獻在於他張揚了儒家民主政治精神，其政治思想以及作為其政治思想之背景的文化觀

念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亦即儒家德性民主精神向著現代制度架構的落實以及現代制度架構向著儒家德性民主精神的提升。

結論提出徐氏在其劃界于狹隘的文化保守主義和「全盤西化」論的中道文化觀基礎上所形成的政治思想具有高度的現實合理性，實際上指出了當代中國民主政治和民主社會建設的可取途徑。只有徹底批判古今一切專制政治，同時積極闡揚包括儒家文化在內的民族傳統中的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精神，進而充分涵納西方自由主義在制度安排上的優長，並且自覺揚棄原子式個人主義以及由之產生的種種弊端，「把儒家精神，與民主政體，融合為一」，才可能建立既具有現代性、又擁有民族文化心理根基的中國式的民主政治和民主社會。

12. 〈徘徊於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之間：徐復觀的社會觀辯證〉，謝曉東，《中共寧波市委黨校學報》，2008年第3期，2008年7月，頁124-128。

按：「前言」說：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是社會政治哲學的兩種基本理論類型，認為徐復觀的社會觀頗有特色與代表性。以下分數個單元論述。

第一單元「對個人主義的理解」。分析徐氏的個人主義，一是對個人主義的基本看法，即含有自私自利的意思，認為若沒有與權利相並行的義務觀念，則將會失去個人主義的意義。二是對個人主義價值的評價，指出個人主義的反獨裁價值，其可能流入虛無主義和極權主義的危害。三是對個人主義的對立面--極體主義的認識。

第二單元「對中國傳統社會的解釋」。先考察儒家自我觀實質上是一種個人與社會關係的思考，認為是整體性，綜合性的，對社群持一種目的論的觀點，是積極入世的。指出徐氏力圖通過對儒家精神的新詮釋而創建一種合理的處理個人與社會關係的理論模式。

第三單元「尋求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實踐層面的平衡」。一是考察西方社會存在的問題。二是對儒家的個人與社會關係予以新詮釋。三是對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在實踐層面的平衡作了一些探索。

13. 〈徐復觀與《民主評論》的民主想像：儒家／民主的多重詮釋〉，李淑珍，《中國儒學》第五輯，2010年9月，頁89-136。

按：是篇分數個單元論述：

第一單元「前言：流亡者的『建國方略』」。歸納徐復觀的觀察，有三個方向的反省：一是革命實踐研究院，二是雷震所創《自由中

國》，三是徐氏的《民主評論》等三者間的同異。提出撰文的目的是有三，一是檢討各陣營間的分歧與爭議；二是還原當年徐氏與錢、唐、牟等人的對話情境，以期對徐氏思想有更深刻的理解；三是將當年《民主評論》的論辯，就 21 世紀的時空衡量其價值。

第二單元「徐復觀與《民主評論》」。先概述徐氏創辦《民主評論》的理由、時空背景以及共同創辦人。再討論從創刊開始所面臨的稿源不足，發行量太小，財務果窘等問題。

第三單元「中國傳統與民主政治：徐復觀與錢穆的思想歧異」。分為幾個主題討論。一是儒家政治思想：「典範儒家」立場，從 1951 年起，徐氏開始對儒家的批判思考：儒家政治思想是從統治者的立場思考，德治思想假定君子之德可收風行草偃之效，對中國孝道思想演變的研究反映他推崇先秦儒孝貶抑後世儒家的傾向。二是中國傳統政治：「歷史儒家」立場。指出徐氏與錢氏二人對於傳統中國政治是否專制見解殊異，在傳統中國知識分子性格，中國歷史發展歷程，民主政治定義等問題有截然不同的看法。三是他山之石：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藉由美國漢學家李文森《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三部曲》評估徐氏與錢氏的爭論。

第四單元「學術與政治之間：徐復觀與唐君毅的君子之爭」。分別從幾個主題討論，(一)政治的「形式」與「內容」，指出徐氏認為的「視民主政治為一具有普遍性的『政治形式』」，是徐氏對政治「形式」和「內容」的解讀。(二)學術思想與民主政治的關係：「層級性」抑或「平行性」？提出唐氏與徐氏二人對於「政治與學術之間關係」爭論的緣由、觀點，加以牟氏贊同唐的見解，徐氏指出政治與學術最大的區別，是質與量的區別。(三)民主政治價值之衡定：徐唐之辯的回響，提出勞思光加入論爭，支持唐氏的觀點，不同意徐氏將「政治活動」看成和「文化精神」平行的界域；提出余英時於近 40 年後批評牟、唐二人的心態與徐氏異曲同工；歸結出這一場辯論，在「各說各話，離誰也沒有說服誰」的情形下落幕。

第五單元「結論：21 世紀初的省思」，分為幾個主題討論，(一)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分別討論徐氏與同儕支撐《民主評論》長達 17 年的艱辛歷史，說明徐氏在威權時代所想像的民主樣貌，檢討他和《民主評論》友人在幾項重大議題上的分歧，從當代角度反省其



意義。(二)台灣的民主實踐，討論徐氏的儒家式民主之說有其內在的限制，民主制在台灣落實的情形，未如徐氏所期待的那麼美好，歸結：將儒家教養看作公民教育的一項資源，將有助於民主政治秩序的穩定與清明。(三)中國大陸的民主前景，提出大陸發展民主的遠景揣測，一是大陸推動民主化的動力與台灣的「本土意識」不同，有「民主運動」與「民族主義」互相排斥的情形。

14. 〈論徐復觀對儒家民主思想的發明〉，劉國民，《孔子研究》，2011年第5期，頁50-59；又見《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學報》，第4期，2011年7月，頁59-64。

按：本文分幾個單元論述。

第一單元，先引徐復觀諸篇論述儒家的德治，指出德治的基本要求是為政治者首先有德，建立其道德人格，是為政者的身教、政治行為、以德教化的前提和保證，德治的基本目的是使人民成為有德之人。從而展開創造性的解釋：德治即是無為而治，人君不能以自己的私意治人民，而要消解自己的好惡，尊重、順應和實現人民的好惡。

第二單元，討論徐氏把儒家的德治解釋是無為之治，以及其解釋的根據、目的與其重要意義何在。首先提出「徐先生對儒家之德治思想的創新闡釋，一方面是從儒家的文獻材料中抽象出來的，另一方面又受到他的時代經驗、思想傾向的啟發和引導。」接著說「德治即無為之治的主要內容有二：一是人君消解其好惡和才智；二是尊重、順應和實現人民的好惡」。三是人民有善性，具有尊嚴和價值，人民的好惡和要求是正當合理的，應予以尊重、順應和實現。

第三單元，討論德治在要求統治者以人民的好惡為好惡的政治思想上，涵育著深刻的民主政治的精神，「是徐先生把德治解釋為無為之治的主要目的。」

15. 〈徐復觀對傳統民主精神的闡發〉，李進，《孔子研究》，2012年第1期，頁85-92。

按：前言提出「徐復觀一生學術活動之一大宗旨乃在於抉發傳統思想文化中的自由民主精神」，以下分數個單元論述。

第一單元「民本：民為政治主體」。提出徐氏對傳統民主精神的闡發，從辨析民主的內涵及其與民主的關係入手。一方面關注權力

的歸屬，強調權力屬於人民，人民是政治的主體；一方面不主張直接民主，而主張人民委托政府行使權力，強調對權力的制約。點出徐氏的民本，特指其中的民主性思想內容。

第二單元「性善論：民主政治之人性理據」。指出徐氏闡發傳統民主思想及其精神的基本進路是：將儒家性善論置於政治哲學的視野下，作為民主政治的人性論理據和價值根源進行考察。認為中國文化是從內在的心性中去確立價值的根源與依據，而政治自由根源於人生的要求，民主政治乃是人類內在價值的必然要求。

第三單元「德治：政治權力的道德自律」。指出徐氏對儒家民主思想的梳理，由性善說的闡發，自然展開為對德治思想的創造性詮釋：人君自修「無為」之德以消解其主體性，同時承認並回歸人民才是政治主體的政治理念。作者最後提出「至其將君德外化為客觀制度的設想，顯然係針對中國政治史上法治缺失之弊而發的矯枉之論，並非欲以法治替廢德治」的看法。

16. 〈徐復觀的政治思想之基本性格及其限定〉，歐陽詢，《江漢學術》，第 31 卷 5 期，2012 年 10 月，頁 49-53。

按：本篇前言藉用韋政通評論徐復觀的中國思想史研究是「以保守主義衛道」。以下分數個單元論述。

第一單元「自由主義：儒家精神與民主精神之貫通」。首先指出徐氏對文化涵義的幾種界定，如：「文化是由生活的自覺而來的生活自身及生活方式這方面的價值的充實與提高。」徐氏並對文化與文明作出截然的分殊：文明是科學系統，文化是價值系統。接著引用學者對徐氏依托儒家德性所闡發的自由思想，稱之為「文化自由主義」或「道德上的自由主義」。並指出他的民主政治思想充滿了內部矛盾。

第二單元「無為而治：儒家的德治與民主政體之貫通」。提出「無為而治」是徐氏打通儒家的德治與民主憲政之管道，歸納出與民主政體的相同之處：1.在政治主體方面，儒家的德治與民主政體皆以人民為主體；2.在人性論方面，儒家的德治與民主政體皆以性善論為前提；3.在治國方略方面，傳統儒家的禮治與民主政體的法治皆以無為而治為祈向；4.在政治目的方面，儒家的德治與民主政體皆以先富後教，成就至善為旨歸。亦逐一評論徐氏在這四點上的矛盾

之處。

第三單元「結語」。指出徐氏把「返本開新」作為理論體系的思想語法與思想綱領，並為此從民主精神亦即自由主義精神與民主政體兩個管道，對儒家的德治主義與現代民主政治進行導通與融會，但乃評論徐氏頗具創新之意和合理之處，但如付諸實際，很難逃避一治一亂的循環悲劇。

17. 〈在休謨與康德之間：論徐復觀政治哲學的基本走向--以其對先秦儒家政治哲學的研究為例〉，謝曉東，《徐州工程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9卷3期，2014年5月，頁27-31。

按：作者在前言提出從政治哲學角度，把徐復觀定位為埃德蒙·伯克式的自由-保守主義，認為徐氏政治哲學的基本走向是介於休謨和康德之間，而加以分數個單元論述。

第一單元「徐復觀先生對先秦儒家政治哲學的基本詮釋」。指出徐氏對孔子和儒家的政治哲學的核心觀念：「德治」，可以用無為而治詮釋，有六種分析面。對於孔子的德治思想與教的觀念，徐氏引入了教育的觀念。指出徐氏注意到孟子的自律倫理學。荀子的政治和孔孟的主要差異在於禮治思想，注意到荀子蘊含的關於優良政府和正義的思想。

第二單元「介於休謨與康德之間的孔孟荀政治哲學」。指出徐氏對先秦儒家政治哲學的分析與詮釋，把人們引領到儒家政治哲學的源頭--先秦。作者提出，先秦儒家政治哲學的主題是：人性、優良政府和正義。認為自律或他律和優良政府觀念，對儒家的適用性，人們比較容易接受；正義觀念確實是適用於儒家。認為孔孟荀的政治哲學，就世界範圍而言大體介於康德與休謨之間，集先秦儒學大成的《大學》類似羅爾斯，而將先秦儒學和古典自由主義放在同一平台衡定。

第三單元「徐復觀政治哲學的基本走向：依違於休謨與康德之間」。作者說明本文的立論，發現徐氏的政治哲學的基本走向，其實就是介於休謨和康德之間，整合了孔孟荀的基本思路而得到的結論，所以才把先秦儒學和古典自由主義放在同一論域予以分析。

「結論」中認為徐氏的政治哲學具有很強的理論張力，為儒家政治哲學的現代重構，指示了較為明確的方向，提出可資借鑒的理

論資源，對自由主義的中國化具有相當的啟示。

18. 〈現代新儒學與民主法制建設〉，宋志明，《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 29 卷 2 期，2012 年 3 月，頁 23-28。

按：作者在前言說他認為儒學中確實存在著有利於民主法制建設的資源，能否把這種資源開發出來，是儒學能否實現現代轉化的關鍵所在。以下分數個單元探討。

第一單元概述熊十力對儒學的新的評價：一種是孔子創立的大同學，是理想化的儒學；一種是後儒傳述的儒學，是歷史上實際起作用的儒學。努力溝通儒學與民主政治的聯繫。

第二單元分別論述徐復觀與牟宗三。認為徐氏承繼熊氏之觀點，努力在儒學中挖掘有利於民主政治的因素，論證儒學與民主政治的契合性，較正視歷史實際，大力倡導民主政治，重塑現代儒者的形象。提出徐氏處理傳統儒家學說與民主政治的關係的三點主張：一是轉變立場，改變傳統儒生為帝王師的心態；二是個體獨立，改變傳統儒學的人身依附觀念；三是以儒家精神提升民主政治。牟氏對儒學與民主法制之關係的看法，與徐氏相近，但具有強烈的思辨色彩，牟氏認為傳統儒學的內聖發達，而外王學薄弱，形成有道統而無政治的局面，主張「曲通」：從德性主體轉出知性主體，從而與民主接榫。

第三單元作者提出：「認同現代新儒家關於儒學與民主法制建設兼容的看法，但不認同他們由『內聖開出新外王』的說法。」作者認為民主等外王事功是各種因素共同發揮作用的合力的結果，但儒學對於外王事功確實可以發揮促進作用，對民主法制建設可以產生積極的影響。認為民主是一種政治制度，也是一種政治文明，民主政治文明是民主制度得以實施的擔保。建設民主政治文明，需發掘儒家留下的思想資源。提出：儒學可能對於民主制度建設幫助不大，而對民主政治文明建設却有裨益。

19. 〈儒學與民主:文化保守主義民主觀念的近百年變化〉，李維武，《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 年第 5 期，2010 年 7 月，頁 37-44。

按：「前言」提出選取 20 世紀中國文化保守主義開展中五位有代表性的思想家：杜亞泉、梁啟超、梁漱溟、張君勱、徐復觀，就他們對儒學與民主政治的關係所作的思考與探討進行考察。

第一單元「杜亞泉：從儒學中發現中國自己的民主觀念」。從陳獨秀在〈今日之教育方針〉提出「惟民主義」開始，新文化運動興起，指出杜亞泉在主編的《東方雜誌》上發表對民主觀念的反思，以一種悲觀的、懷疑的心態來加以看待，以中國傳統的民本思想來強調中國自古即有自己的民主觀念，拒斥西方近代的民主觀念。

第二單元「梁啟超：論儒學與民主觀念的內在聯繫」。敘述梁氏完成《先秦政治思想史》，力圖立足於思想史研究，從歷史與理論的結合上說明儒學與民本觀念的內在聯繫。提出梁氏對於中國古代的民本思想與西方近代的民主觀念的不同，作了認真辨析與明確區分，發現民本思想的局限與不足。

第三單元「梁漱溟：用儒學作為民主政治的人生觀基礎」。敘述梁氏完成《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在面對近代中國的現實，思考如何用儒家思想擁引西方近代的民主概念，使之能在中國文化土壤中扎根生長、開花結果。分析西方化根源，發現其普遍性因素：科學、民主，與人生問題相聯繫，只有中國化、東方化才能為人類提供正確的人生態度。

第四單元「張君勱：在民主政治基礎上承緒儒學」。敘述張氏的《明日之中國文化》，認為民主政治是以自由精神為其基礎的，其民主觀念，與自由精神直接聯繫，以自由精神為基礎，中國民主政治的建設，不能拋開中國文化傳統，不能拋開作為中國文化主流的儒家思想。主張在民主政治基礎上承緒儒學，

第五單元「徐復觀：以儒學打通中國走向民主政治的道路」。敘述徐氏在認肯民主政治的前提下，承緒儒家思想，在儒學與民主政治的聯繫上，是從中國思想史研究入手：立足中國文化的傳統與精神，吸取儒家政治思想的資源，打通中國走向民主政治的道路。

第六單元「總論」，從兩方面說明文化保守主義民主觀念近百年變的總體走向與基本脈絡，體現 20 世紀中國文化的新精神與新傳統，顯示富有生命力、帶有啟發性的內容。

20. 〈港臺新儒家對中國民主政制的批評與想像〉，翟志成，《新亞學報》，第 32 卷，2015 年 5 月，頁 131-185

按：作者在「引言」概述，從鴉片戰爭之後，中國文化在要衝擊下日漸瓦解崩，中國知識人之間的反傳統思潮主流與文化保守主義思潮的

抗衡，探討「全盤西化」與「守故開新」近百年來的中國學術文化思想史中的互相批駁，互相影響，互相依存。

第一單元「『亡天下』的悲憤與反思」。概述大陸易幟，大陸政權對選擇留在大陸的知識分子的迫害，進行反民主反中國文化的事實；選擇到港臺的新儒家代表人物：徐復觀、唐君毅、牟宗三，發現中國文化與西方的民主精神是「暗合」且「相通」的，而正式把中國文化與中國的民主建構，作出正面意義的連結和深入的理論反思。

第二單元「徐復觀的政治、文化和學術三大批判」。分數節探討。一、概述唐君毅、牟宗三對民主政治的興趣，只限於書齋中的學理分疏，徐復觀則對民主政治的學理分疏和對民主運動的實際參與，一直保持極大的興趣和熱忱。並概述徐氏對中國文化的態度三階段的改變。二、概述徐氏到臺灣後開始對以儒家思想為主流的中國文化，作實事求是的評價和考量。三、概述徐氏在消除國人對中國文化的誤解，認為要從三方面著手：1.學術上的清算與批判；2.文化上的清算與批判；3.政治上的抗議與批判；創辦《民主評論》進行這三大批判。四、說明徐氏的政治批判是針對中共和國民黨，文化批判是批判中國文化在現代的脫序現象以及中國近代知識分在精神和道德方面的墮落現象，徹底反中國文化的全盤西化派。五、概述徐氏學術批判的用心所在是把中國文化的真精神和攙雜在其中的專制毒素嚴格分開，其學術著作被接受與信服的原因，得力於其新考據法，指出具有五大優點；採用考據對考據的方式，使當時學術主流派不再以「無根遊談」來看待新儒家。

第三單元「牟宗三的『對列格局』和『自我坎陷』」。概述牟宗三、徐復觀、張君勱、唐君毅等聯名發表的〈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認為中國文化存有民主政治思想的「種子」，何以不能建立類似西方近代之民主制度，歸咎於國人之政治主體的未能建立。牟宗三在《政道與治道》中，提出「對列格局」，是西方文化之所以能發展科學和建構民主政治的根本精神之所在。晚年再提出「良知的自我坎陷」學說，以補「對列格局」之難以解決的問題。

第四單元「唐君毅對民主政制的批評與想像」。分為收節論述：一、民主政治為何沒有在中國出現，指出唐氏認為中國文化思想有

民主的根苗，即是傳統儒家的「人性本善」和「心同理同」的哲學理路。從思想文化之外看出社會條件的不具備，是中國過去不能成就民主政治的重要原因。二、對西方民主政治的批評。作者歸納唐氏的批判有四：1.對民主人士「不能發見其可敬之處」；2.民主政治在根源處的「內在矛盾」和「不平等」；3.對民主選舉的運作方式有所保留；4.庸人政治的危機。

「結語」中，作者先概述〈文化宣言〉分為十二節，各節的內容，認為最有創見和最具特色的地方，在於第八節和第九節所討論的科學與民主，為今日中國的救亡圖存所亟需；但中國文化亦有許多遠勝西洋之寶物，同樣值得西方文化學習和引進；故在第十一節和第十二節提出西方人至少在五個方面應向中國文化學習。

**21.〈徐復觀的政治理念：兼論徐、牟政治理念之異同〉，顏炳罡，《齊魯學刊》，1994年第6期，1994年11月，頁73~79。**

按：是篇「前言」提出牟宗三和徐復觀二人對儒家經世致爵問題的闡發，理論風格有異，側重點也各不同，但二者可以相互補充，相互印證。從他們的政治理念中可以窺見當代新儒家的理想追求。分收個單元探討。

一、政治理念與政治現實的二重張力。概述清末龔自珍、魏源以降至五四及以後的學者，反省中國傳統政治的得失利弊，盼得解決之道。認為徐復觀立足於儒家人文主義的立場，對中國傳統政治作出客觀的反省，指出儒家文化是中國文化的主體，在政治上表現出來的最高原則是「德治主義」，努力實現的對象是「民本主義」。並指出中國傳統政治有四方面的不足：1.儒家政治思想總居於統治者地位思考；2.德治者由修身以至治國平天下，由盡己之性以至盡人之性，在現勢中少了一道曲折；3.政治主體未立；4.政治的發動力完全在朝野而不在社會。根本原因即在於「權原關係」，導致政治上的二重主體性。

二、政治的常數與變數：德治主義與民主政治的融合。敘述徐氏認為民主主義是一種生活方式。人類由於發現了這種生活方式，於是個體與群體得以融合，儒家的德與禮的思想，可以使民主主義有真正的根期；民主政治才能生穩根，發揮其最高價值。但儒家的德治主義却不能解決中國今日的政治困局，只有民主政治才是中國

政治發展的正軌和坦途，從儒家思想中可以與民主政治相通的方面疏導出來，以推動中國當代民主政治建設--從政治的內容和政治的形式共建；其追求的民主主義形式為英美式的民主形式，以自由主義為基礎的。

三、徐、牟政治理念之異同。指出徐氏、牟氏兩位都認為儒家的政治理想是德治主義，都為儒家的德治理想活轉於現代而努力，徐氏側重於現實政治的剖析，牟氏側重於傳統政治紐結的疏理。二人都冷靜地分析中國傳統政治的不足，揭示中國未走上民主政治的根源：中國傳統政治的主體未立，缺少人民的政治自覺。牟氏從中國政治形式的根源尋求中國未走上民主政治的原因，認為須使根本精神有所轉變；徐氏從理想與現實脫節上挖掘中國未走上民主政治的根源，認為是直接從政治層面上入手解決政治問題，。

22. 〈儒家自由主義與西化自由主義：徐復觀、殷海光政治哲學之比較〉，任劍濤，《原道》，第四輯，1998年4月，頁79-109。後收錄於《徐復觀與中國文化》，篇名為〈自由主義的兩種理路：儒家自由主義與西化自由主義：徐復觀、殷海光政治哲學之比較〉。

按：是篇前言概述徐復觀屬文化保守主義陣線，殷海光屬自由主義一系，從學術理路看，有三個層面：「自由的思想資源」、「自由的制度保證」、「自由的社會認同」，可以透觀二人自由主義學說的異同；從二人論述的比較分析基礎上，可以看到「儒家自由主義如何可能」。本文即從這四個方面比較詮釋。

一、「自由的思想資源：輸入與本有」。首先概述引介西方自由主義思想的第一人嚴復，後繼者胡適，到殷海光三人的見解，歸納西化自由主義論中國自由主義的思想資源有三個支點：1.中西自由思想有態度與制度的疏離與依存的差異；2.中西主流思想對自由有排斥與原創的巨大區別；3.中西社會在自由的內在理念與外在保障條件上有實質的不同。接著分析徐復觀的：文化發生以自由為前提，則都應具有自由的思想資源。分解徐氏的論證為：1.給予自由一個學理化的定義；2.自由主義只是一種生活的精神態度；3.自由主義者是在解消束縛的同時自我規範，在優化既有規範中達成自由。歸納徐氏以本有的儒家思想資源為直接基礎建構中國現代自由主義理



論，相應於西化自由主義，可稱為儒家自由主義。

二、「自由的制度保證：構造與轉進」。西方輸入的自由才能支持中國邁向解放與富強的民主政治之路，或是儒家思想也可以為之提供充足的內源動力，為關注自由內在理念的詮解，以及外在保障條件的問題。首先指出殷氏的推導邏輯是有自由不能保證通向民主，有民主不能保證它保障自由，既要有自由也要有民主，二者才能互利互益；而孔儒構造的制度，具有濃密而又強厚的規範性，中國傳統政治無力給自由民主提供生長激素。接著指出徐氏認可殷氏建立民主制度的必要性與目的的追求論述，但認為殷氏的論述是以三個不能成立的假設為前提的：1.儒家與自由民主處於隔絕狀態；2.中國傳統政治制度缺少民主因子；3.棄置傳統，接納完全西式的民主才能實現中國政的制度轉換。分別敘述：1.徐氏全面論證儒家通向民主的可能性與必然性；2.挖掘了傳統政治中富有民主性的制度因素。

三、「自由的社會認同：危機與生機」。首先概述殷氏確信民主只有重新構造才足以保障自由，宣告儒家傳統和古典政制的歷史終結，因而只能倚重邏輯的力量，從世界的大趨勢，從接受新知並賦有歷史命感的知識分子身上，三方面的思路探尋，却使殷氏感到危機與失望。接著概述徐氏揭示了儒家政治思想有自由人權民主的豐厚資源，有民主政治所要求的政治舉措之傳統儲備，因此自由主義者達到自我的自覺，必須從傳統中解放，對傳統進行洗煉，賦予新的內容，創造更合理更豐富的傳統和社會；但這種創造又不能完全脫離傳統，只要略加改造，就可以變換成為現代自由民主最強的動力；對接傳統政治與民主政治的最有利條件也由歷史提供出來的。

四、「邏輯與歷史之間：儒家自由主義如何可能」。先分析兩種理路的自由主義的類型特點與理論命運，試圖判斷儒家自由主義足可納西化自由主義的理論優勢於自身，使自身的理論蘊涵作更大幅度的開展。分析殷氏西化自由主義自身的幾重矛盾，提出儒家自由主義必需依賴兩個條件的具備：在學理闡釋的基本方法上的轉向；走出儒家－民主的對局觀。指出吸納市場秩序為儒家自由主義提供了現實出路。

## 手稿整理

### 館藏徐復觀教授手稿整理(二)：殷周之際的宗教中人文精神的躍動

#### 壹、整理方法的修正

筆者在進行徐復觀先生〈生與性--中國人性論史的一個方法上的問題〉手稿比對時，是以發表的單篇論文為主，「先掃描該篇，經轉換為文字，經校對後才比對與手稿的差異，亦即試圖藉由比對，瞭解手稿和初發表的論文間的差異。再比對收於專書中的內容，究竟有多少的變動。」但在「進行的方法」提到的，是希望「呈現手稿的內容為主，其間的差異，分別以引號(「」或『』)標示，並利用註腳進行隨頁註。」然而有讀者建議，各篇完整的手稿，他們不易見到，不若以彙編為專書內容為主，反倒容易取得，透過註語的說明更能掌握。此為整理第二篇手稿的修正之一。

對於手稿與單篇發表的文章(簡稱「論文」、彙整為專著(簡稱「專書」)等三者的比對，僅採用單引號(「」)與雙引號(『』)做為區別，分別加註語予以說明。在閱讀上却造成困擾，不易區別其差異，故改採用〔〕符號表示單篇論文與收入專書間的差異；採用【】符號表示手稿與單篇論文、收入專書間的差異；並於註語說明其間的不同。手稿之字跡未能辨識者，乃以「■」標示。此其二。

本文改以專書之內容為基礎，標示之方式：1.論文出現之文字而不在專書之中，則逕予補入，並加註語；2.專書出現之文字而不在論文中者，則在註中標示論文的文字，以示與專書的差異；3.手稿出現之文字而不在專書或論文之中者，逕予以補入，並加註語說明，專書或論文中未見者；4.專書或論文出現之文字而不在手稿之中者，則在註中標示其內容文字的差異。

其它則仍依第一章整理的方法處理。

#### 貳、〈周初宗教中人文精神的躍動〉內容的比對

##### 〔第二章、周初宗教中人文精神的躍動〕<sup>1</sup>

##### 〔一、概述〕<sup>2</sup>

中國【的】<sup>3</sup>人性論，發生於人文精神進一步的反省。所以人文精神之出

<sup>1</sup> 按，論文及手稿皆無「第二章」等3字，有副標示：「中國人性論史初稿之一」等字。手稿作「殷周之際的宗教中人文精神的躍動」，1960年11月5日在《民主評論》第11卷21期發表。

<sup>2</sup> 按，論文及手稿皆無此節的標題。

現，【為】<sup>4</sup>人性論得以成立的前提條件。中國文化，為人文精神的文化，現時固已成為定論。〔但此處得先提醒一句，中國的人文精神，在以人為中心的這一點上，固然與西方的人文主義相同；但在內容上，却相同的很少，而不可輕相比附。中國的〕<sup>5</sup>人文精神【之出現】<sup>6</sup>，並非突然【出現】<sup>7</sup>，而【係】<sup>8</sup>經過長期孕育【而來】<sup>9</sup>，尤其是經過了神權的精神解放而來【的】<sup>10</sup>。

人類文化，都是從宗教開始，中國也不【能】<sup>11</sup>例外。但是文化形成一種明確【而合理】<sup>12</sup>的觀念，因而與人類行為以提高向上的影響力量，則須【要文化】<sup>13</sup>發展到有某程度的自覺性。宗教可以誘發人的自覺【，表現人的自覺】<sup>14</sup>；但原始宗教，常常是由對【於自然現象及各種災害省察的恐怖而投靠向不可知地力量的皈依；這種由■下】<sup>15</sup>【天災人禍】<sup>16</sup>的恐怖情緒而來的原始性地【對神秘之力的】<sup>17</sup>皈依，並不能表示何種自覺的意義。即在高度發展的宗教中，也因人、因時代之不同，而可成為人地自覺的助力；也可成為人地自覺的障礙。從遺留到現在的殷代銅器來看，中國文化，到殷代已【經】<sup>18</sup>有了很長的歷史，完成了相當高度地發達。但從甲骨文中，可以看出殷人的精神生活，還未脫離原始狀態；他們的宗教，還是原始性地宗教。【及】<sup>19</sup>當時他們的行為，似乎是通過卜辭而【〔完〕<sup>20</sup>全】<sup>21</sup>決定於外在的神--祖宗神、自然神、及上帝。周人的貢獻，便是在傳統的宗教生活中，注入了自覺的精神；把文

<sup>3</sup> 按，手稿作「之」字。

<sup>4</sup> 按，手稿作「及」字。

<sup>5</sup> 按，此 60 餘字，論文及手稿僅用「但此種」三字替代。

<sup>6</sup> 按，專書及論文皆無此 3 字。

<sup>7</sup> 按，手稿作「而來」。

<sup>8</sup> 按，手稿作「是」字。

<sup>9</sup> 按，專書及論文皆無此 2 字。

<sup>10</sup>按，手稿無此字。

<sup>11</sup>按，專書及論文皆無此字。

<sup>12</sup>按，手稿無此 3 字。

<sup>13</sup>按，專書及論文皆無此 3 字。

<sup>14</sup>按，專書及論文皆無此 6 字。

<sup>15</sup>按，專書及論文皆無此 30 餘字。

<sup>16</sup>按，手稿無此 4 字。

<sup>17</sup>按，手稿無此 6 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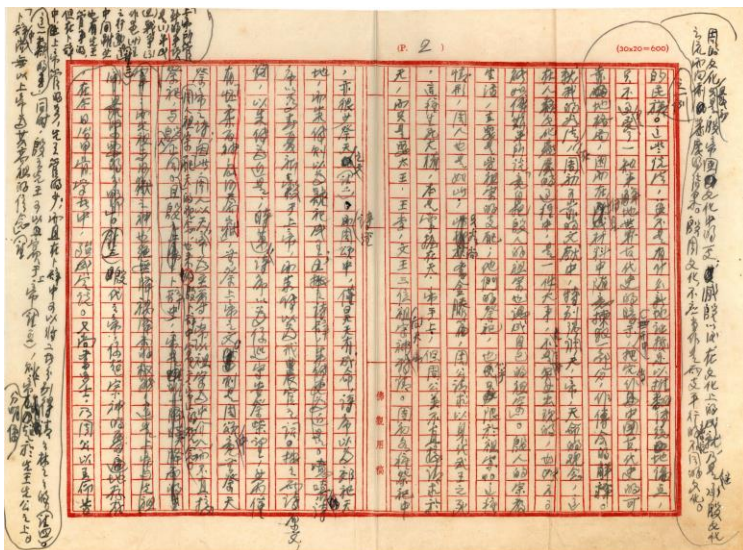
<sup>18</sup>按，手稿無此字。

<sup>19</sup>按，專書及論文皆無此字。

<sup>20</sup>按，論文無此字。

<sup>21</sup>按，手稿僅作「一」字。

化在器物方面的成就，提昇而為觀念方面的展開，以啟發中國道德地人文精神的建立。【以下試略加申述。】<sup>22</sup>



<sup>22</sup>按，手稿無此 6 字。

〔二、周初文化的系屬問題〕<sup>23</sup>

近來談殷周文化關係的人，我覺得有兩點偏【見】<sup>24</sup>。第一點，忽視了殷代文化，是經過了長期發展的結果，於是認為殷代的上帝，【皆】<sup>25</sup>是部落的宗神；而周人所稱的上帝，乃是以殷人的宗神為自己的宗神(註一)。第二點，一方面強調中國古代文化與〔中近東〕<sup>26</sup>的關係，好像古代的文化交流，比現在還容易。【但另】<sup>27</sup>一方面却忽視殷代的「帝國地」性質【(註二)】<sup>28</sup>，忽視了周人自述的「革命」的意義，〔更忽視了殷周的世系是同出於帝嚳，〕<sup>29</sup>而把殷周看作先是兩個互不相干，後來却互相敵對的兩個文化系統不同的部族。甚至許多人把周對殷的革命，看作是歷史上野蠻民族，征服了有高度文化的民族之一例。這些說法，並不是有什麼新地證據足以推翻傳統地論點，只不過是受了【不完全】<sup>30</sup>地世界古代史【的知識】<sup>31</sup>的暗示，無形中把它當作中國古代史的可靠地格局，因而在【現成】<sup>32</sup>材料中隨意揀取一部分，作附會的解釋。〔周公在殷遺民前強調「殷革命命」，以證明周革殷命之為正當(註三)；由此可知周未取殷之前，固承認殷之政權係由天所命，亦即係天之代表；則夏殷在未亡時，原為當時所共同承認之共主，殆無疑義。所以〕<sup>33</sup>就我的看法，【周的文化，最初只是殷帝國文化中的一支；滅殷以後，在文化〔制度〕<sup>34</sup>上的成就，乃是繼承殷文化之流而向前發展的結果。殷周文化，不應當看作是兩支平行的不同系統的文化。《論語》「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為政〉)。又「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八佾〉)，這分明是說周文化係由殷文化的繼承發展而來。】<sup>35</sup>在周初可靠的文獻中，特別強調天、帝、天命的觀念，這在人類文化發展的過程中，是一件大

<sup>23</sup>按，論文及手稿在此節序號及標題作「一、周初文化，是殷帝國文化中的一支流」。

<sup>24</sup>按，手稿作「差」字。

<sup>25</sup>按，專書及論文皆無此字。

<sup>26</sup>按，論文及手稿皆作「西方」。

<sup>27</sup>按，手稿無此 2 字。

<sup>28</sup>按，手稿無此「註二」。

<sup>29</sup>按，論文與手稿無此 15 字。

<sup>30</sup>按，手稿作「一知半解」。

<sup>31</sup>按，手稿無此 3 字。

<sup>32</sup>按，手稿作「傳統」。

<sup>33</sup>按，論文和手稿皆無此 70 餘字。

<sup>34</sup>按，論文無此 2 字。

<sup>35</sup>按，手稿無此 120 餘字。

事；【既不可能是】<sup>36</sup>突然出現的，也決不可能如傅斯年所說〔的，〕<sup>37</sup>「竟自把殷人的祖宗也認成自己的祖宗」。殷人的宗教生活，主要是受祖宗【神】<sup>38</sup>的支配〔：他們的祭祀，也似乎只限於祖宗，【乃至其他自然神；到現在為止，似乎還沒有發現祭天、帝的可靠證據。〕<sup>39</sup>他們與天、帝的關係，都是通過自己的祖宗作中介人。周人的情形，也正是】<sup>40</sup>如此。【只看】<sup>41</sup>《尚書·金縢篇》，【是記載】<sup>42</sup>周公請求以身代武王之死【的故事】<sup>43</sup>。這種生死大權，本是掌握在天、帝手【中】<sup>44</sup>；但周公並不直接請求於天，而只是要太王、王季、文王三位祖宗神，向天、帝轉請。〔周初各種祭祀中，亦似無祭天之文（註三）。《詩經·周頌》中，僅〈昊天有成命〉，《詩序》以為是郊祀天地，而《朱傳》則以為是疑祀成王；〈噫嘻〉，《詩序》以為是春夏祈穀於上帝，而《朱傳》則以為是戒農官之詞。按之兩詩原文，以《朱傳》為近是。〈時邁〉，《詩序》以為係巡守告祭柴望，然內僅有『懷柔百神，及河喬嶽』。【並】<sup>45</sup>無祭天之明文。則是《周頌》中竟無祭天祭帝之詩；因此，〕<sup>46</sup>周人以天、帝為至尊，〔故〕<sup>47</sup>常以祖宗為中介人，〔而不直接祭祀，〕<sup>48</sup>與殷人正同【（註四）】<sup>49</sup>。周人祖宗「配天」的觀念，也來自殷卜辭中「賓于帝」的觀念。【傅氏以卜辭中的帝，指的是宗神；但】<sup>50</sup>殷卜辭中，「上帝所管到的事項是（一）年成，（二）戰爭，（三）作邑，（四）王之行動」（〔註五〕<sup>51</sup>）。「這中間雖然也有先王管事的，但在卜辭中，這一類的事，上帝管的多，先王管的少；而且在卜辭中可以將二者分別得清清楚楚的」（〔註六〕<sup>52</sup>）。同時，殷【之】<sup>53</sup>先王可以賓于上帝（〔註七〕<sup>54</sup>），則

<sup>36</sup>按，手稿作「是不可能」。

<sup>37</sup>按，論文及手稿皆無此字。

<sup>38</sup>按，手稿無此字。

<sup>39</sup>按，專書此處少 40 餘字。

<sup>40</sup>按，此 50 餘字，手稿僅作「這種情形，周人也是」。

<sup>41</sup>按，專書及論文皆無此 2 字。

<sup>42</sup>按，手稿無此 2 字。

<sup>43</sup>按，手稿無此 3 字。

<sup>44</sup>按，手稿作「上」。

<sup>45</sup>按，手稿無此字。

<sup>46</sup>按，專書此處作「而不直接祭祀，」等 6 字，即少了約 170 餘字。

<sup>47</sup>按，論文及手稿皆無此字。

<sup>48</sup>按，專書無此 6 字。

<sup>49</sup>按，手稿無此 2 字。

<sup>50</sup>按，此 16 字，手稿僅作「且」。

<sup>51</sup>按，論文此處作「註四」，手稿作「註三」。

<sup>52</sup>按，論文此處作「註五」，手稿作「註四」。

上帝分明係超於先王先公之上。「卜辭中尚無以上帝為其高祖的信念」(〔註八〕<sup>55</sup>)，殷代之帝，係超【祖】<sup>56</sup>宗神的普遍地存在，在今日治甲骨學者中，殆成定說。又《尚書·多士》，乃周公以王命告殷頑民之辭；〈多方〉為周公以王命告多國，尤其是「殷侯尹民」之辭。〈多士〉一篇中稱「帝」者六，稱「上帝」者二，皆指【最高神】<sup>57</sup>之上帝而言；其中「自成湯至於帝乙」之「帝乙」，乃殷祖宗中之冠以「帝」字者。〈多方〉稱「帝」者三，皆係指【最高神】<sup>58</sup>之上帝而言；其中「乃至於帝乙」之「帝乙」，正與〈多士〉中所稱之帝乙相同。殷之先王先公，有冠以帝字者，亦有不冠以帝字者；就〈多士〉〈多方〉兩篇考之，是周初對於上帝之帝，與殷〔先王先公〕<sup>59</sup>中之以帝稱者，區分得甚為清晰。【何曾有周人把殷人的宗神當作自己宗神之說？】<sup>60</sup>「帝」與「天」常互用；然稱帝則表現此至高無上之神的人格性者特重，而天乃此一人格神所居住之世界。殷人既有明顯之上帝觀念，卜辭中有「帝令」之名詞，則殷人亦必有天之觀念，而「帝令」即等於天命。卜辭中之「天」字皆作「大」字用，似未見有作天字本義用的；但我因下面兩個理由，覺得不應因此便斷定殷代沒有天字。(一)此時天與大適用，〔〈多士〉之〕<sup>61</sup>「大邑商」亦稱「天邑商」；有作「大」義之天字，亦當有作「天」本義之天字。(二)不能因今日所能看到之甲骨材料，【以】<sup>62</sup>概括殷代全部之材料。殷代除甲骨文以外，尚「有冊有典」(〔註九〕<sup>63</sup>)。今日《尚書》中之《商書》，不僅不是戰國時晉人之作或宋人之擬作(〔註十〕<sup>64</sup>)，且其文字雖經多次之傳抄轉述，當傳抄轉述之際，常有以今譯古之情形；但其原始材料，皆出於當時典冊散亂之遺，為研究歷史者的重要立足點。〔一種新思想、觀念之出現，在歷史中是一件大事。由思想觀念出現之前後，以推論相關典籍出現之先後，這係過去考據家所忽略了

<sup>53</sup>按，專書及論文皆無此字。

<sup>54</sup>按，論文此處作「註六」，手稿作「註五」。

<sup>55</sup>按，論文此處作「註七」，手稿僅作「註」。

<sup>56</sup>按，專書及論文皆無此字。

<sup>57</sup>按，手稿作「普遍性」。

<sup>58</sup>按，手稿作「普遍性」。

<sup>59</sup>按，論文作「祖先公」，手稿作「祖先」。

<sup>60</sup>按，手稿無此 19 字。

<sup>61</sup>按，論文及手稿皆無此 3 字。

<sup>62</sup>按，專書及論文皆無此字。

<sup>63</sup>按，論文作「註八」，手稿作「註七」。

<sup>64</sup>按，論文作「註九」，手稿作「註八」。

的一個重要方法。《虞書》中之思想、觀念，較《周書》為豐富，故其成立當遠在《周書》之後。《商書》中之思想觀念，較《周書》為貧弱，故其成立，自在《周書》之前。〕<sup>65</sup>不能因〔現有〕<sup>66</sup>甲骨文中無本義之天字，遂否定《商書》之真實性；而《商書》中固屢用天字【及天命一詞】<sup>67</sup>。居住於黃河大平原，對於頭頂上有日月星之蒼蒼地大圓形的形象，一直到由銅器所代表的技術已經很進步的殷代，對【它】<sup>68</sup>尚無明顯地感受性，似乎是說不通的。何況當時的農業已成為經濟的基礎，而農業與天時天象又是如此密切。若在此種情形之下，尚不能浮出「天」的觀念，不能加【它】<sup>69</sup>一個名稱，那才是【歷史上】<sup>70</sup>不可理解的事。因此，周初的天、帝、天命【等】<sup>71</sup>觀念，都是屬於殷文化的系統。此外，殷人不僅以龜作貞卜之用，且視龜為寶物。〈大誥〉是周公相成王將黜殷時所作的；一則曰「甯王(文王)遺我大寶龜」。再則曰「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于得吉卜」。三則曰〕<sup>72</sup>「甯王惟卜用」；則是對龜及卜的觀念，亦與殷無異。總括的說，周原來是在殷帝國的政治、文化體系之內的一個方國；他關於宗教方面的文化，大體上是屬於殷文化的一支；但在文物制度方面，因為它是方國的關係，自然沒有殷自身發展得完備。殷之與周，決不可因偶有「戎殷」一詞，便忘記了對「大邑商」而自稱為「小邑」的情形，認為是兩個不同質的文化系統。【但人類精神的自覺，並不一定受物質成就的限制。周之克殷，乃係一個有精神自覺的統治集團，克服了一個沒有精神自覺〔或自覺得不夠〕<sup>73</sup>的統治集團。】<sup>74</sup>先釐清了這一點，才能對《尚書》中周初的文獻，作順理成章的了解。

〔三、敬的觀念之出現〕<sup>75</sup>

周人在宗教方面，雖然是屬於殷的系統；但在周人的領導人物中，却可

---

<sup>65</sup>按，論文及手稿皆無此 130 餘字。

<sup>66</sup>按，論文及手稿皆無此 2 字。

<sup>67</sup>按，手稿無此 5 字。

<sup>68</sup>按，手稿無此字。

<sup>69</sup>按，手稿作「上」字。

<sup>70</sup>按，手稿無此 3 字。

<sup>71</sup>按，手稿作「的」字。

<sup>72</sup>按，論文及手稿皆無此 16 字。

<sup>73</sup>按，論文無此 6 字。

<sup>74</sup>按，手稿無此 60 字。

<sup>75</sup>按，論文此節的序號及標題作「二、敬的觀念之提出，及原始宗教的情況」，手稿作「二、敬的觀念之提出，及原始宗教的轉化」。



以看出有了一種新精神躍動。因為有了這種新精神的躍動，【才】<sup>76</sup>使傳統的宗教有了新地轉向，也即是使古代整個地文化，有了新地【發展】<sup>77</sup>。

周人革掉了殷人的命(政權)，成為新地勝利者；但通過周初文獻所看出的，並不【像】<sup>78</sup>一般民族戰勝後的趾高氣揚的氣象，而是《易傳》所說的「憂患」【意識(〔註十一〕<sup>79</sup>)】<sup>80</sup>。憂患【意識】<sup>81</sup>，不同於作為原始宗教動機的恐怖〔、絕望〕<sup>82</sup>，一般人常常是在恐怖〔絕望〕<sup>83</sup>中感到自己過分地渺小，而放棄自己的責任，一憑外在地神為自己作決定。在憑外在地「神」【為自己】<sup>84</sup>作決定後的行動，對人的自身來說，是脫離了自己【的】<sup>85</sup>意志主動、理智導引的行動；這種行動是沒有道德評價可言，因而這實際是在觀念地幽暗世界中的行動。由卜辭所描出的「殷人尚鬼」的生活，正是這種生活。「憂患」與恐怖〔、絕望的〕<sup>86</sup>最大不同之點，在於憂患心理的形成。乃是【從】<sup>87</sup>當事者對吉凶成敗的深思熟考而來的遠見；在這種遠見中，主要發現了吉凶成敗與當事者行為的密切關係，及當事者在行為上所應負的責任。憂患正是由這種責任感來的要以己力突破〔點〕<sup>88</sup>困難而尚未【突破】<sup>89</sup>時的心理狀態。所以憂患意識，乃人類精神開始【直接】<sup>90</sup>對事物【發生責任感】<sup>91</sup>的表現，也即是精神上開始有了人地自覺的表現。

此種憂患【意識】<sup>92</sup>的誘發因素，【從《易傳》看，當】<sup>93</sup>係來自周文王與

<sup>76</sup>按，手稿作「而」字。

<sup>77</sup>按，手稿作「轉向」。

<sup>78</sup>按，手稿無此字。

<sup>79</sup>按，論文作「註十」。

<sup>80</sup>按，手稿作「精神『註九』」。

<sup>81</sup>按，手稿作「精神」。

<sup>82</sup>按，論文及手稿皆無此2字。

<sup>83</sup>按，論文及手稿皆無此2字。

<sup>84</sup>按，手稿無此3字。

<sup>85</sup>按，手稿無此字。

<sup>86</sup>按，論文及手稿皆無此3字。

<sup>87</sup>按，手稿作「由於」字。

<sup>88</sup>按，論文及手稿皆無此字。

<sup>89</sup>按，手稿作「破突」字。

<sup>90</sup>按，手稿作「取得」字。

<sup>91</sup>按，手稿作「之主宰性」字。

<sup>92</sup>按，手稿作「精神」。

<sup>93</sup>按，此5字，手稿僅作「應」字。

殷紂間的微妙而困難的處境【（〔註十二〕<sup>94</sup>）】<sup>95</sup>。但此種精神地自覺，却正為周公召公們所繼承擴大。〈大誥〉是「周公相成王將黜殷」（〈書序〉）時作的，一則曰【「予惟小子，若涉淵水」，再則者曰】<sup>96</sup>「肆予冲（幼）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蠹（驚擾）鰥寡，哀哉。予造（遭）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冲人，不卬（我）自恤」。**【再】**<sup>97</sup>則曰「朕言（語詞）艱日思（日思其艱之意）」。**〈君奭〉**是周公告召公之詞，他說「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康誥〉**是周公居攝，封康叔於康時對康叔的告戒（〔註十三〕<sup>98</sup>）。康叔統三監之地的成功與失敗，實即周室政權之成功與失敗，故本篇最可代表周公的政治思想。《孔叢子》說〈康誥〉是「稱述文王之德，以成勅戒之文」；《孔叢子》雖屬偽書，但這兩句話却很中肯綮的。**【〈康誥〉中〔有六處是以「王曰嗚呼」為發端之辭，表露這種意識最為明顯〕<sup>99</sup>。】**<sup>100</sup>〈召誥〉是「召公因周公之歸，作書致告達之於王」（〔註十四〕<sup>101</sup>）的。所以它是召公對成王所作的一篇政治教育，與〈康誥〉同其重要。**【周公之歸，成王乃真即王位，這在後世，應當有一番祝頌之辭；但】**<sup>102</sup>召公一開始便說「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憂）。嗚呼，曷其奈何弗敬」。

〔在以信仰為中心的宗教氣氛之下，人感到由信仰而得救，把一切問題的責任交給於神，此時不會發生憂患意識；而此時的信心，乃是對神的信心。只有自己擔當起問題的責任時，才有憂患意識。〕<sup>103</sup>這種憂患意識，實際是**【蘊蓄著】**<sup>104</sup>一種堅強地意志和奮發的精神。所以〈大誥〉中一則說「無毖（告）于恤（**【艱苦，】**<sup>105</sup>勿訴說自己之艱苦），不可不成乃甯考（文王）圖功」。又說，「天闔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率甯王圖事」。《蔡傳》對上句的解釋是「言天之

<sup>94</sup>按，論文作「註十一」。

<sup>95</sup>按，手稿無此註。

<sup>96</sup>按，專書及論文皆文此 12 字。

<sup>97</sup>按，手稿作「三」字

<sup>98</sup>按，論文作「註十二」，手稿作「註十」。

<sup>99</sup>按，此 20 餘字，論文作「表現得最明顯的是『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的話」。

<sup>100</sup>按，此 20 餘字，手稿作「表現得最明顯的是『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的話」。

<sup>101</sup>按，論文作「註十三」，手稿作「註十一」。

<sup>102</sup>按，專書及論文皆無此 25 字。

<sup>103</sup>按，論文及手稿皆無此 70 餘字。

<sup>104</sup>按，手稿作「代表」2 字。

<sup>105</sup>按，專書及論文皆無此 2 字。

所以閉塞艱難，國家多難者，乃我成功之所在」。在憂患意識躍動之下，人的信心的根據，漸由神而轉移向自己本身行為的謹慎【與】<sup>106</sup>努力。這種【謹慎與】<sup>107</sup>努力，〔在周初是〕<sup>108</sup>表現在「敬」、「敬德」、「明德」等觀念裏面。【尤其是一個敬字，實貫穿於周初人的一切生活之中，這是直承憂患意識的警惕性】<sup>109</sup>而來的精神斂抑、集中，及對事【的】<sup>110</sup>謹慎、認真的心理狀態。這是人【在】<sup>111</sup>時時反省自己的行為。規整自己的行為的心理狀態。【周初所強調的敬的觀念，與宗教的虔敬，近似而實不同。宗教的虔敬，是人把自己的〔主〕<sup>112</sup>體性消解掉，將自己投擲於神的面前而澈底皈歸於神的心理狀態。周初所強調的敬，是人的精神，由散漫而集中，並消解自己的官能欲望於自己所負的責任之前，凸顯出自己主體的積極性與理性作用。敬字的原來意義，只是對於外來侵害的警戒，這是被動的直接反應的心理狀態。周初所提出的敬的觀念，則是主動的，〔反省的，〕<sup>113</sup>因而是內發的心理狀態。這正是自覺的心理狀態，與被動的警戒心理有很大的分別。所以〔《尚書·無逸》「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這把敬的心理狀態，反映得很清楚。因此，〕<sup>114</sup>周人的哲學，可以用一個「敬」字作代表。〔周初文誥，沒有一篇沒有敬字。〕<sup>115</sup>至於經常與敬字連用的【德】<sup>116</sup>字，原來【<sup>117</sup>應為「惠」字，後人以德為惠，而惠反廢。許氏《說文》【對惠字的解釋是】<sup>118</sup>「外得於人，內得於己也。从直从心」。我覺得這依然是後起之義。按〈康誥〉「朕心朕德惟乃知」，將心與德對舉【；〈君奭〉「公曰，嗚呼，君

<sup>106</sup>按，手稿無此字。

<sup>107</sup>按，手稿無此 3 字。

<sup>108</sup>按，論文及手稿皆無此 4 字。

<sup>109</sup>按，此 30 餘字，手稿僅作「敬是由警惕」5 字。

<sup>110</sup>按，手稿無此字。

<sup>111</sup>按，手稿無此字。

<sup>112</sup>按，論文作「本」。

<sup>113</sup>按，論文作「經過理智選擇後」。

<sup>114</sup>按，論文無此 70 餘字。

<sup>115</sup>按，論文無此 12 字。

<sup>116</sup>按，手稿無此 310 餘字。

<sup>117</sup>按，手稿無此 3 字。

<sup>118</sup>按，手稿無此 7 字。

惟乃知民德，罔不能厥終，惟其終」，孫星衍《尚書古今文注疏》「汝亦知民之行，無不能其初，惟其終之難乎」，此德之必釋為行之顯證。〕<sup>119</sup>而】<sup>120</sup>《論語·先進篇》「德行，顏淵，閔子騫……」，以「德」與「行」連為一詞；〔《中庸》「庸德之行」數語，與《易·乾·文言》「庸行之謹」數語，同屬引孔子之言，係同一出處；而《中庸》之「德」，在《乾文言》即引作「行」。〕<sup>121</sup>周初文獻的「德」字，都【指的是】<sup>122</sup>具體的行為；若字形從直從心為可靠，則其原義亦僅【限能】<sup>123</sup>是直心而行的負責的行為；【作為負責行為的惠，開始並不帶有好或壞的意思，所以有的是「吉德」，有的是「凶德」；而周初文獻中，只有在惠字上面加上一個「敬」字或「明」字時，才表示是好的意思。】<sup>124</sup>後來乃演進而為好的行為。因好的行為多是與人以好處，乃引伸而為恩惠之德。好的行為【係】<sup>125</sup>出于【人之】<sup>126</sup>心，於是【外在的行為，進而內在化為人的心的作用，遂】<sup>127</sup>由「德行」之德，發展【成】<sup>128</sup>為「德性」之德。「敬德」是行為的認真，「明德」是行為的【正大】<sup>129</sup>明智。〈康誥〉中的「明德慎罰」，「敬哉」，〈召誥〉中之「曷其奈何弗敬」，「王其疾敬德」，乃周初文獻之一貫精神，隨處可以看到。周人建立了一個由「敬」所貫注的「敬德」、「明德」的觀念世界，來照察、指導自己的行為，對自己的行為負責，這【正是中國人文精神最〔早〕<sup>130</sup>的出現；而此種人文精神，是以「敬」為其動力的，這便使其成為道德的性格，與西方之所謂人文主義，有其最大不同的內容。在此人文精神之躍動中，周人遂能〔在制度上作了飛躍性的革新（註十五）。並〕<sup>131</sup>】<sup>132</sup>把他所繼承的殷人的宗教，給與以本質的轉化。

<sup>119</sup>按，論文無此 50 餘字。

<sup>120</sup>按，此 58 字，手稿皆無，僅作「即」字。

<sup>121</sup>按，論文及手稿皆無此 40 餘字。

<sup>122</sup>按，手稿作「是指」。

<sup>123</sup>按，手稿無此 2 字。

<sup>124</sup>按，手稿無此 64 字。

<sup>125</sup>按，手稿無此字。

<sup>126</sup>按，手稿無此 2 字。

<sup>127</sup>按，手稿無此 18 字。

<sup>128</sup>按，手稿無此字。

<sup>129</sup>按，專書及論文皆無此 2 字。

<sup>130</sup>按，論文作「先」字。

<sup>131</sup>按，論文無此 16 字。

<sup>132</sup>按，此 89 字，手稿僅作「這是文化發展中的一大飛躍。在此飛躍中，周人」等 19 字。

## 錢穆論學手書

魏元珪\*

民國 57-58 年(1968-1969)，我任教於台北外雙溪東吳大學，在東吳安素堂(教堂)旁邊，有一花園別墅，是謂素書樓，內寓有國學大師錢穆先生。錢先生當時未在東吳大學任教，乃任教於陽明山文化大學，故少有過從。但承東吳大學石超庸校長之囑，託我前往拜謁錢先生，並邀其前來東吳演講，惟因錢先生事忙而未果。以後我轉任中原理工學院及國立陽明醫學院，故少有機會再參訪錢先生了。

民國 69 年(1980)以後，我轉任東海大學，完成拙作《荀子哲學》一厚冊，乃逕寄錢先生賜教。錢先生夫人，乃我在廈門大學肄業的同學，但比我晚兩屆。民國 38 年(1949)大陸變局，我來台灣，她卻轉道香港，以後在新亞書院就學，而結識錢先生。

錢先生收到我贈書時，正生病住院，由其夫人轉達與他，並且當面誦讀大綱及內容，迄其病癒後，始批卷閱覽。

民國 70 年(1981)，錢先生約我前往面敘，當即遵囑前往士林外雙溪素書樓拜謁先生。承蒙接待茶敘，相談甚歡。其夫人說起廈大故事，尤感深切。我與錢先生相敘是第二次了，當即請益中國思想史及國學有關論題，先生侃侃而談，收穫尤多。

我與錢先生對道家老子，看法顯然迥異。錢先生是《古史辨》右派人物，他強調老子後於莊子，其成書在漢朝之時，我則不能認同。因為按《老子》帛書甲乙本之出土，帛書甲本用小篆文，而帛書乙本則用隸書，按其用字，即可知非漢時之作品。尤其當《郭店楚墓竹簡》出土後，更證明《老子》竹簡成書於戰國時期，因其乃用大篆書體，寫於竹簡上，足可證明是先秦時期之作品。

老子確為春秋時期之人，其年代比孔子早二十年。我在拙作《老子思想體系探索》(國立編譯館出版，1997)一書之緒論，曾對《古史辨》派各家有所辯駁，其中有〈駁錢穆先生對老子年代之誤植〉一文，惜該時錢先生已作古了。若錢先生尚健在而當遐齡，自能面見《帛書甲乙本老子》，以及以後《楚墓竹簡老子》之出土，恐當另作別觀了。

錢先生重考據，但多章句中比附援引，或在史料中參酌其意見。若能以

---

\* 魏元珪，東海大學哲學系教授退休

出土之資料，面臨考古之科學證據，則恐對錢先生之治學，別有一番方向。

錢先生為人和睦，對後進尤多提攜。在民國早期振興國學，提倡中華文化，自有莫大貢獻，其功自不可沒。

拙作《老子思想體系探索》，凡六十萬字以上。當完成時，錢先生已謝世，否則當可呈其賜教。可惜歲月無情，無法了此學緣，不無遺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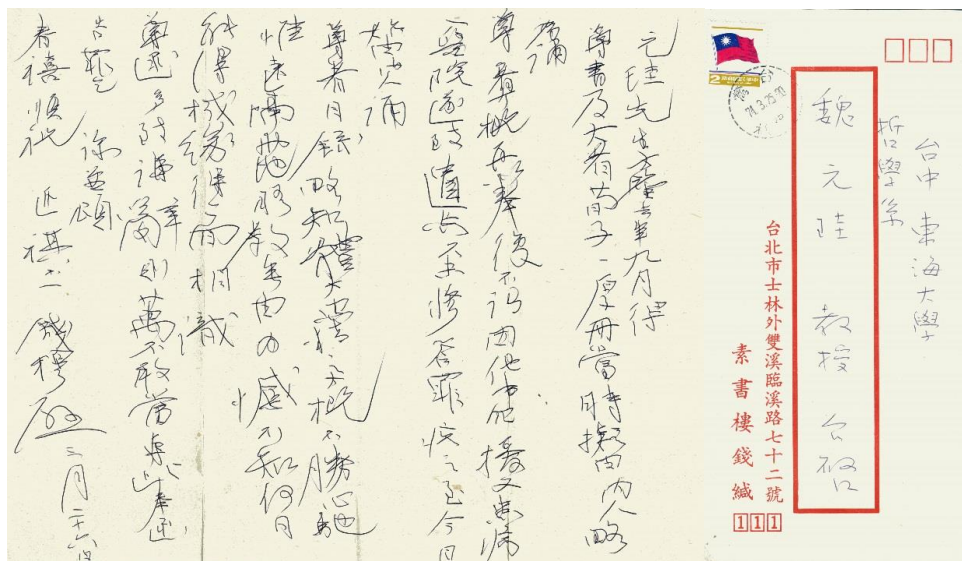
民國以來，國事多所板蕩，而有為有守之學人中，錢先生堪為典範。惜錢先生逝世時，若干重要出土資料，未能及身見到，故難免堅持民國早期《古史辨》派之觀點，否則必有一番偉大的謙論也。近日重閱錢先生覆函，不禁懷思先輩，動念故人。時光匆匆，歲月無情，緬懷先哲，特此撰寫點滴，以資紀念。

### 【錢穆論學手書】

元珪先生大鑑：去年九月，得 尊書及大著《荀子》一厚冊，當時擬由內人略為誦 尊著大概，再以奉復。不料因他事冗擾，又患病入醫院，遂致遺忘。久未修答，罪疚之至。今日始由內人誦讀尊著目錄，略知體大思精之大概，不勝心馳。惟遠隔兩地，晤教無由為憾！不知何日能得機緣，得一面相識？尊函多致謙辭，則萬不敢當。專此奉函告罪，乞 諒。並頌 春禧。順祝 近祺。不一。

錢 穆啟 三月二十六日(1981年)

### 【錢穆論學手書原蹟】



魏元珪教授提供

## 學人年表

### 陳曉蓄教授大事年表

謝鶯興\*

#### 1931年(1歲)

父母由日本留學歸國<sup>1</sup>。4月，出生於上海。

#### 1931年至1934年(1至4歲)

「九一八事變」後，因父親駐守長城，由母親攜帶子女守候於北平。

#### 1937年(7歲)

「廬溝橋事變」，抗日戰爭全面發生，退居西南的湖南、貴州、四川及西北的陝西、河南諸省。

#### 1943年(13歲)

抗戰末期，就讀沙坪壩南開中學<sup>2</sup>。

#### 1945年(15歲)

抗戰勝利後返回上海，就讀於衛理會蘇州景海女中，畢業後隨即考取大學。

#### 1949年(19歲)

跨海來臺之後，最初寄居在風城新竹，為了偏愛山色樹蔭，擇居在近山的市郊。

#### 1951年(21歲)

8月，擔任省立新竹工職代課教師，至1952年7月考上國立臺灣大學止。

#### 1952年(22歲)

9月，考進國立臺灣大學，就讀中文系一年級<sup>3</sup>。

#### 1955年(25歲)

6月，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系畢業，取得文學士學位。

---

\* 東海大學圖書館流通組組員

<sup>1</sup> 此據陳曉蓄老師的補充。年表初稿甫成，透過吳福助老師設法取得陳老師在美國耶魯大學圖書館共事的友人協助，寄送到居住在美國的陳老師，請她增訂。承蒙陳老師的補充與修正，不一一交待交處。

<sup>2</sup> 參見〈對酌〉，與聶華苓對話，提及：「抗戰末期，我就在沙坪壩唸中學。」「啊！我也在沙坪壩的南開中學讀書。」（《松風集》）。

<sup>3</sup> 參見〈楓葉〉，提及：「記得是民國四十一年，在萬分艱難中，我又重新回到學校唸書。」（《松風集》）。

8 月，擔任私立純德女中教師，至 1956 年 5 月受聘於東海大學止。

#### 1956 年(26 歲)

6 月，受聘為東海大學秘書。

7 月，發表〈登東山〉(詩)、〈兩夜〉(散文)<sup>4</sup>。

11 月 2 日，發表〈宋詩的特質--宋詩評介概言上〉(論文)、〈落花生--山居散記之一〉、〈含羞草--山居散記之二〉(散文)<sup>5</sup>。

#### 1957 年(27 歲)

8 月，受聘為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助教<sup>6</sup>。

11 月 26 日至 12 月 1 日，參加東海勞作指導室為顧及學生於期中考期間的健康與辛苦，發動教職員工協助洗碗的行動，志願到女生宿舍洗碗。<sup>7</sup>

是年，撰寫〈桐花夢〉<sup>8</sup>。

#### 1958 年(28 歲)

6 月，發表〈陳簡齋及其詩〉<sup>9</sup>。

10 月，因 823 砲戰發生，悼念砲戰中失蹤的朋友，撰寫〈無邪愛--為懷念金門砲戰中失蹤的記者 W·S 君而寫〉<sup>10</sup>。



取自第一屆畢業紀念冊

#### 1959 年(29 歲)

3 月，發表〈姑蘇之戀〉<sup>11</sup>。

6 月，發表〈東坡詞的欣賞〉<sup>12</sup>。又，發表〈相見歡〉、〈江城子〉詞四

<sup>4</sup> 是篇提及：「到大度山中，這該是第五個夜晚。」據以繫之。

<sup>5</sup> 兩篇散文以「微」筆名發表，見《東風》第 2 期，收入《松風集》。

<sup>6</sup> 按，1957 年 11 月 16 日《東海大學校刊》第 2 版「東海大學 46 學年度上學期教員名錄」，記載中文系：「助教陳曉蓄」，住址：「東海路 32 號」。

<sup>7</sup> 參見 1957 年 12 月 1 日《東海大學校刊》第 4 版「師生共同勞作，發揚親愛精誠」。

<sup>8</sup> 是篇提及：「一年來，我匆匆的奔波於臺中、臺北途中」，故據以繫之。收入《松風集》。

<sup>9</sup> 見《東風》第 4 期，收入《詩詞論叢》(台北：文星書店，1961 年 5 月)。

<sup>10</sup> 是篇提及：「九月二十六日，數天來，匪徒們瘋狂的砲火掩沒了黑暗邊沿的燈塔--金門島。無數個溫暖的家被摧毀了，無數英勇的軍民正在為自由而浴血！當天我拿到早報以後，幾乎是整個早晨，憂傷的用報紙遮蓋著臉。」篇末署「四十七年十月」。收入《松風集》。

<sup>11</sup> 以「蓄」筆名發表。見《東風》第 7 期，收入《松風集》。

<sup>12</sup> 見《文學雜誌》第 6 卷 4 期，頁 20~24，收入《詩詞論叢》。



闕<sup>13</sup>。

### 1960年(30歲)

1月，發表〈放翁詞及其感情生活〉<sup>14</sup>。

4月，發表〈踏莎行〉詞二闕<sup>15</sup>。

5月，發表〈千古詞人李易安〉<sup>16</sup>。

6月1日，發表〈蘇幕遮<sup>聆樂考夫斯基</sup>悲愴交響曲〉、〈玉樓春〉、〈踏莎行<sup>雨中春遊</sup>〉三闕詞，〈秦觀浣溪沙〉、〈辛棄疾生查子〉二篇詞境試釋<sup>17</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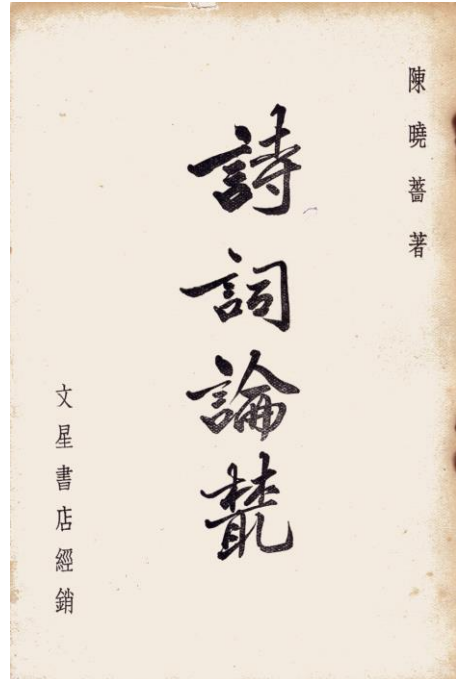
9月，以中文系助教，兼授國文課程<sup>18</sup>。

### 1961年(31歲)

1月1日，發表〈一斛珠<sup>詠一品紅</sup>〉、〈浪淘沙〉、〈太常引〉、〈浪淘沙〉四闕詞，〈歐陽修〉、〈晏幾道浣溪沙〉二篇詞境試釋<sup>19</sup>。

春，參加第二屆東海中文系畢業生嘉義烏山頭旅遊，撰〈踏莎行〉二闕<sup>20</sup>。

5月，由台北文星書店出版《詩詞論叢》<sup>21</sup>。



<sup>13</sup>見《東風》第8期，收入《松風集》。

<sup>14</sup>見《暢流》第20卷11期，頁5~7，收入《詩詞論叢》。

<sup>15</sup>見《東風》第10期，收入《松風集》。

<sup>16</sup>見《文星》第6卷1期(總31)，頁25~26。收入《詩詞論叢》。

<sup>17</sup>見《東海文學》創刊號，詞收入《松風集》，詞境試釋收入《詩詞論叢》。

<sup>18</sup>據49.10.16校刊「四十九年度教職員名錄及任課一覽表」。

<sup>19</sup>見《東海文學》第二期，詞收入《松風集》，詞境試釋收入《詩詞論叢》。

<sup>20</sup>詞牌下分別題：「阿里山之遊」、「雨中春遊」。按，〈孫克寬年表〉「1961年」，春天，曾與中文系畢業生一起到嘉義烏山頭旅遊；11月15日在《東海文學》發表〈阿里山遊山詩〉、〈嘉南春旅紀事〉，故據以繫之。

<sup>21</sup>是書收鄭騫〈題辭〉及作者〈後記〉外，共收7篇論文及6位詞家15闕詞作的詞境淺釋。7篇論文篇名如下：1.陳簡齋及其詩，2.呂居仁及江西詩社宗派圖，3.東坡詞欣賞(附集評)，4.漫談小山詞(附集評)，5.千古詞人李易安(附集評)，6.放翁詞及其感情生活(附集評)，7.納蘭詞讀後(附集評)。詞境淺釋收：歐陽修詞采桑子、蝶戀花、浣溪沙三闕，晏幾道詞生查子二闕、鷓鴣天三闕，蘇軾詞卜算子一闕，秦觀詞浣溪

8 月，升等為東海大學中文系講師<sup>22</sup>。

9 月，講授理工學院大一國文(文選、孟子)及大二國文(詩、詞部份)。

11 月 15 日，撰〈虞美人蘭潭行〉、〈踏莎行阿里山之遊〉、〈行香子〉、〈攤破浣溪紗詠桃花〉四闕詞<sup>23</sup>。

農曆 12 月 8 日，撰〈踏莎行〉一闕<sup>24</sup>。

### 1962 年(32 歲)

1 月 18 日，與聶華苓拜訪梁容若教授，於夜遊東海之後，撰〈對酌〉<sup>25</sup>。

4 月，發表〈高閩仙與唐宋詩舉要〉<sup>26</sup>。

6 月 11 日至 14 日止，參加在東海奧柏林室舉行的中畫研究班師生畫展，作品以校景及花鳥為主<sup>27</sup>。

6 月 15 日，撰〈霜天曉角詠梅〉四闕、〈踏莎行辛丑臘八日戲擬水仙翠禽圖並題〉五闕詞<sup>28</sup>。

9 月，講授國文<sup>29</sup>。

### 1963 年(33 歲)

3 月 3 日，接受北溝故宮博物院莊尚嚴館長的邀請，到霧峰北溝與諸前輩修禊，撰〈踏莎行〉二闕<sup>30</sup>。

---

沙、滿庭芳、踏莎行、臨江仙四闕，辛棄疾詞菩薩蠻、生查子二闕，姜夔詞揚州慢一闕。

<sup>22</sup>據 50.10.01 校刊「五十學年度新改聘及升等教師一覽表」。

<sup>23</sup>見《東海文學》第三期，收入《松風集》。

<sup>24</sup>詞牌下題：「辛丑臘八日戲擬水仙翠禽圖並題」。

<sup>25</sup>發表於《聯合報》副刊，收入《松風集》。是篇提及：「華苓從臺北到東海兼課，已快一學期了。」又說：「六年的山居生活已使我懶散到極點，除了上課外，讀讀書，看看畫，養養鳥，種種花，簡直一事無成，頂多寫寫讀書札記，戲填小詞」。按，據「五十學年度文學院教員及任課一覽表」(民國 50 年 11 月 1 校刊)記載，是年聶華苓開始在中文系兼授現代文藝之小說戲劇。又〈孫克寬先生學行年表〉「1961 年 9 月 14 日」條，記載孫先生「與徐復觀先生聯名推薦聶華苓小姐在東海中文系兼授現代文藝課程」(見《孫克寬教授紀念專輯》頁 36，謝鶯興編，台中：東海大學圖書館，2017 年 2 月 6 日)，故據以繫之。

<sup>26</sup>見《圖書館學報》。第 4 期，頁 75~84。

<sup>27</sup>見《東海大學校刊》第 73 期，1962 年 6 月 15 日第 3 版，「要聞集錦」。

<sup>28</sup>見《東海文學》第四期，收入《松風集》。

<sup>29</sup>見《東海大學校刊》第 77 期，1962 年 11 月 16 日第 5 版，「五十一學年度第一學期文學院教員及任課一覽表」。

<sup>30</sup>詞牌下題：「癸卯三月三日應莊館長尚嚴之邀陪諸前輩修禊於北溝故宮博物院分韻得水字聊賦小詞二闕以塞責(其一蕭韻)」。收入《松風集》。

3月20日，撰〈鳳凰臺上憶吹簫詠螢〉、〈南歌子山中桃花零落盡矣為賦此解〉二闕、〈相見雨餘推窗，見風竹數竿青翠欲滴因賦〉、〈浣溪紗〉五闕詞<sup>31</sup>。

6月25日，發表〈微笑·人生〉<sup>32</sup>。

11月10日，撰〈少年游〉二闕、〈踏莎行〉二闕、〈攤破浣溪紗〉二闕，共六闕詞<sup>33</sup>。

### 1964年(34歲)

4月，發表〈漁歌子〉三闕、〈西江月〉共三闕詞<sup>34</sup>。

5月23日，提出升等為副教授的申請案。

6月15日，發表〈賈島的生平與他的詩〉<sup>35</sup>。

7月，發表〈司空圖與詩品〉<sup>36</sup>。

8月15日，發表〈劉長卿生平事跡初考(上)〉<sup>37</sup>。

9月15日，發表〈劉長卿生平事跡初考(中)〉<sup>38</sup>。

9月，講授國文<sup>39</sup>。

10月15日，發表〈劉長卿生平事跡初考(下)〉<sup>40</sup>。

11月15日，發表〈秋宵小唱〉、〈有所思戲效長吉體〉、〈踏莎行題梅花水仙圖〉、〈踏莎行國父誕生百周年紀念遙憶中山陵〉、〈踏莎行(又)〉、〈水龍吟〉等詞，〈李煜浪淘沙試釋〉、〈歐陽修蝶戀花試釋〉兩篇<sup>41</sup>。

12月，發表〈論「象外象、景外景」兼談晚唐二李詩〉<sup>42</sup>。

是年撰寫〈山中短簡〉<sup>43</sup>、〈夢谷·蘆葦·晴天〉<sup>44</sup>。

<sup>31</sup>見《東海文學》第5期，收入《松風集》。

<sup>32</sup>見《中央日報》副刊，收入《松風集》。

<sup>33</sup>見《東海文學》第6期，收入《松風集》。

<sup>34</sup>見《東海文學》第7期，收入《松風集》。

<sup>35</sup>見《中國一周》第738期，頁1~4。

<sup>36</sup>見《現代學苑》第1卷4期，頁21~26。

<sup>37</sup>見《大陸雜誌》第29卷3期，頁11~14。

<sup>38</sup>見《大陸雜誌》第29卷4期，頁23~28。

<sup>39</sup>參考《東海大學校刊》第108期，1964年12月1日第4版，「五十四學年度第一學期文學院專任教員及一般學科任課一覽表」。

<sup>40</sup>見《大陸雜誌》第29卷5期，頁30~35。按，此三篇連載，後來收入傅璇琮、羅聯添編《唐代文學研究論著集成》，三秦出版社，2004年。

<sup>41</sup>見《東海文學》第8期。

<sup>42</sup>見《現代學苑》第1卷9期，頁7~14。

<sup>43</sup>是篇提及：「畢業後，我來到東海，這一住就是八年」，故據以繫之。

<sup>44</sup>是篇提及：「到大度山上八年了，我還是第二次走入夢谷」，故據以繫之。收入《松風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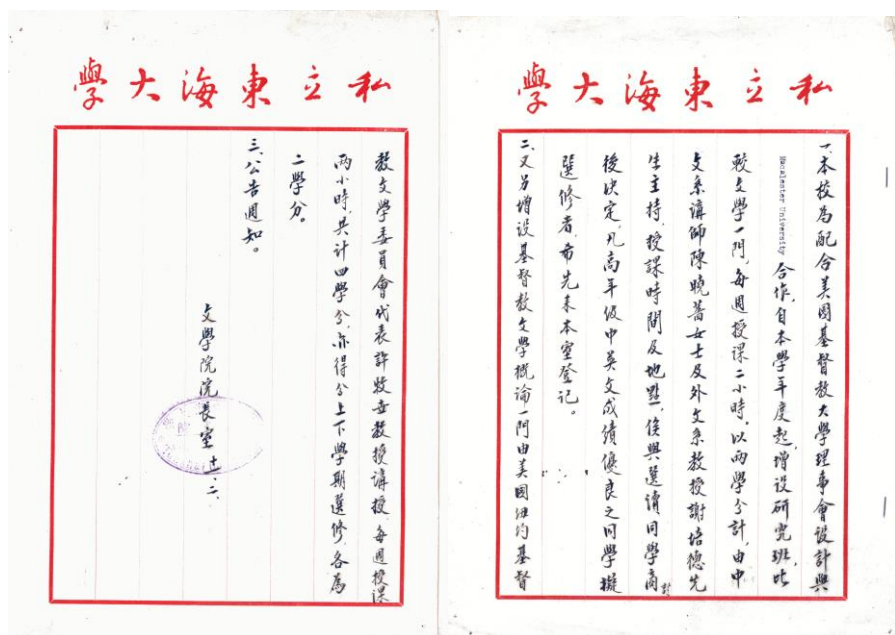
1965 年(35 歲)

3 月，發表〈談司空圖的詩論：「韵外致與味外旨」〉<sup>45</sup>。

6 月，發表〈陶淵明及其詩〉<sup>46</sup>。

8 月，因歐保羅教授先後喪子，撰〈喪禮〉<sup>47</sup>。

9 月，在中文系講授「國文」及「比較文學」課程<sup>48</sup>。



<sup>45</sup>見《現代學苑》第 1 卷 12 期，頁 21~26。

<sup>46</sup>見《現代學苑》第 2 卷 3 期，頁 1~6。

<sup>47</sup>是篇提及：「從老遠的美國到臺灣來，一下子失掉兩個孩子，要是我，我會發瘋。」歐先生還撐起精神去教主日學哩！他說：啊！我忽然發現，我有了更多的孩子！」據歐保羅夫婦〈歐家大事記〉記載，1965 年 8 月 20 日，大兒子司提病故；9 月 18 日，次子腓力與歐保羅一起到東海附近的古堡野餐，不幸失足跌落坑底而去世，見鄔錫芬編《側耳傾聽--宣教士歐保羅夫婦的跫音》頁 302，故繫於此年。是篇發表在《中央日報副刊》，收入《松風集》。

<sup>48</sup>見《東海大學校刊》108 期，「五十四學年度第一學期文學院專任教員及一般學科任課一覽表」，1965 年 12 月 1 日。按，本校政治系退休教授張玉生老師於 2017 年 7 月 18 日，提供一份文學院院長室發出的「公告」：「一、本校為配合美國基督教大學理事會設計與 Macalester University 合作，自本學年度起，增設研究班，比較文學一門，每週授課二小時，以兩學分計，由中文系講師陳曉蓄女士及外文系教授謝培德先生主持。授課時間及地點，俟與選讀同學商討後決定。高年級中英文成績優良之同學擬選修者，希先與本室登記。二、又另增設基督教文學概論一門，由美國紐約基督教文學委員會代表許牧世教授講授，每週授課兩小時，共計四學分，亦得分上、下學期選修，各為二學分。三、公告週知。文學院院長室十一、二」。

是年撰〈我佇立在風裏〉<sup>49</sup>。

### 1966年(36歲)

2月，發表〈有所思〉詩兩首、〈江南思〉詩三首<sup>50</sup>。

受邀赴台中師範專科學校演講，講題為〈新文學與舊文學〉<sup>51</sup>。

6月，發表〈登高〉。<sup>52</sup>又，發表〈秦觀滿庭芳試釋〉、〈歐陽修蝶戀花試釋〉<sup>53</sup>、〈洞仙歌手植蝴蝶蘭一株，辛勤護持，今春花發，並帶連理，香滿簾櫳，因賦小詞，聊寄閑情〉、〈水龍吟〉詞二闕<sup>54</sup>。

8月，獲得升等為副教授<sup>55</sup>。

11月12日，孫中山先生誕辰紀念，撰〈踏莎行〉二闕<sup>56</sup>。

是年，在中文系講授「比較文學」<sup>57</sup>、「國文」<sup>58</sup>等課程。當選為教務委員會委員。

### 1967年(37歲)

1月，發表〈皎然與詩式〉<sup>59</sup>。

2月7日，發表〈洞仙歌手植蝴蝶蘭一株，辛勤護持，今春花發，並帶連理，香滿簾櫳，因賦小詞，聊寄閑情〉<sup>60</sup>、〈水龍吟〉<sup>61</sup>、〈山坡羊〉、〈一半兒〉詞四闕<sup>62</sup>。

5月25、26日兩天，編導《新西廂記》四幕五場話劇，由東海外籍師生(學生係攻讀中文系)以華語在銘賢堂演出<sup>63</sup>。

9月，在中文系講授「比較文學」<sup>64</sup>、「國文」<sup>65</sup>等課程。

<sup>49</sup>是篇提及：「到大度山上，一晃又是十年了」，以其1955年到東海大學任職計算，繫於此年。收入《松風集》。

<sup>50</sup>見《東海文學》第10期，詞收入《松風集》。

<sup>51</sup>講稿收入《松風集》。

<sup>52</sup>見《東風》第3卷8期，收入《松風集》。

<sup>53</sup>按，試釋歐陽修〈蝶戀花〉詞之內容，已以「詞境淺釋」為題釋過(收入《詩詞論叢》)，但兩篇之內容卻不同。

<sup>54</sup>見《東海文學》第11期，詞收入《松風集》。

<sup>55</sup>據《東海大學校刊》113期，〈五十五學年度教職員人事動態〉，1966年11月2日。

<sup>56</sup>詞牌下題：「國父誕生百周年紀念遙憶中山陵」，故繫於此年。收入《松風集》。

<sup>57</sup>據〈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歷年課程表〉(《東海中文學報》第5期)記載。

<sup>58</sup>參考《東海大學校刊》第114及115合期，1966年11月30日第5版，「五十五學年度文學院及一般學科任課教員及課程一覽表」。

<sup>59</sup>見《東海學報》第8卷1期，頁113~125。7月，再刊於《東海文薈》第8卷，頁73~85。

<sup>60</sup>〈洞仙歌〉已刊登《東海文學》第11期，明顯重收。

<sup>61</sup>〈水龍吟〉已刊登《東海文學》第11期，明顯重收。

<sup>62</sup>見《東海文學》第12期，前二闕詞收入《松風集》。

<sup>63</sup>見《中央日報》1967年5月27日報導。

<sup>64</sup>據〈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歷年課程表〉(《東海中文學報》第5期)記載。

12 月，發表〈殘山夢最真(讀曲雜感一則)〉<sup>66</sup>。

### 1968 年(38 歲)

2 月，出版《松風集》<sup>67</sup>，台中光啟出版社。

5 月，發表〈皎然詩式十九體及其詩例〉<sup>68</sup>。

是年，在中文系講授「比較文學」、「國文」<sup>69</sup>等課程。

12 月，發表〈韓愈及其詩〉<sup>70</sup>。

### 1969 年(39 歲)

是年與孫克寬教授同兼《東海文學》第 14 期的顧問<sup>71</sup>。

8 月，遠赴美國進行研究，就讀於



<sup>65</sup>見《東海大學校刊》第 122 期，1967 年 12 月 31 日第 5 版，「五十六學年度文學院教員及任課一覽表」。

<sup>66</sup>以「曉蓄」名字發表。此期《東海文學》未標年月，據所收〈聖誕的祝福〉一文，暫繫於 12 月。見《東海文學》第 13 期。

<sup>67</sup>是書無序跋，僅有「提要」附在版權頁上。散文與拾翠詞作兩部份。散文分含「夢谷絮語」與「山居散記」兩主題，另有 15 篇不屬於此兩主題。「夢谷絮語」收：1.散步日記，2.新綠，3.枕畔的書，4.我佇立在風裏，5.溪水，6.這是春天，7.群山在呼喚，8.柵欄外，9.萬籟，10.八月，11.稻禾青青。「山居散記」六章收：1.雨夜，2.含羞草，3.落花生，4.星空，5.遲開的杜鵑，6.夢谷。其它 15 篇分別是：1.山中短簡，2.畫荷，3.風雨故人，4.夢谷·蘆葦·晴天，5.訪梅，6.登高，7.楓葉，8.姑蘇之戀，9.桐花夢，10.無邪愛，11.對酌，12.葬禮，13.微笑人生，14.也談錦瑟，15.新文學與舊文學。「拾翠詞稿」收：漁歌子 6 闕，相見歡 5 闕，霜天曉角 4 闕，攤破浣溪紗 3 闕，南歌子 2 闕，少年游 2 闕，虞美人 1 闕，踏莎行 10 闕，西江月 1 闕，浪淘沙 2 闕，木蘭花 1 闕，一斛珠 1 闕，太常引 3 闕，江城子 1 闕，蘇幕遮 1 闕，浣溪紗 1 闕，東坡引 2 闕，行香子 1 闕，一叢花 1 闕，鳳凰臺上憶吹簫 2 闕，水龍吟 2 闕，洞仙歌 1 闕。

<sup>68</sup>見《東海學報》第 9 卷 1 期，頁 127~144。

<sup>69</sup>見《東海大學校刊》第 126 期，1968 年 12 月 16 日第 9 版，「五十七學年度第一學期文、理、工學院教員及任課一覽表」。但〈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歷年課程表〉(《東海中文學報》第 5 期)記載，「比較文學」是從 1966 年由陳教授首先開授，到 1967 年，1968 年就沒有表列其開課資料了。

<sup>70</sup>見《現代學苑》第 5 卷 12 期，頁 11~16。「中國文化研究論文目錄」標示為「57 年 11 月」。

<sup>71</sup>按，是期未標示出版年月，以第 15 期於 1970 年 1 月，推知第 14 期在 1969 年出版。版權頁「顧問」列孫克寬、陳曉蓄二人名字，〈編後心情〉說：「首先應感謝孫克寬老師和陳曉蓄老師的支持和幫助。」

Oberlin College(Post Graduate)<sup>72</sup>。

### 1970年(40歲)

4月10日，指導中文系陳銘堯撰寫〈以小說的角度分析左傳的文章〉學士論文<sup>73</sup>。

續入 Atlanta University，獲圖書館學研究所碩士學位。

### 1971年(41歲)

9月，接受 Yale University 邀約，至該校東方圖書館工作<sup>74</sup>，直到退休。

10月，發表〈稻禾青青(譯作)〉<sup>75</sup>。

### 1972年(42歲)

5月，發表〈大地〉<sup>76</sup>。

### 1990年(60歲)

首次遊歐洲，由法國，至意大利、英國，並造訪各地圖書館及博物館。

### 1998年(68歲)

第二次訪歐洲，由英國，至比利時、德國，沿萊茵河，遊覽之後由法國返回美國。

### 2001年(71歲)

---

<sup>72</sup>按，《東海校友通訊》第1卷2期(1969年10月15日)「各系近況」，刊載：「該系(中文系)本年度人事變動頗大，除梁容若、徐復觀兩教授退休外，方師鐸教授休假，陳曉蕃副教授赴美研究。」又，1969年10月10日《東海大學校刊》第2版，標題：「退休深造高就各適其所」報導：「陳曉蕃……以上或由校方資送或係政府補助赴國外研究者。」但《東海校友通訊》第2卷2期(1970年9月15日)「院系近況報與君知」記載中文系：「方師鐸教授休假屆滿，下年度仍將開聲韻學與訓詁學」，且「校友來鴻」有署「七外順夫」(林順夫)信，提及：「大約是三個禮拜前，陳曉蕃女士從奧柏林來普大，從陳女士那裡得知你將接那個職務，真恭喜你了。」信的日期為「1970年5月3日」，則所謂「赴美研究」，應是到奧柏林大學研究。2017年3月23日，第4屆中文系陳文華校友蒞校，表示陳老師於1969年利用機會到美國進修，一年後(1970年)即留在美國奧柏林大學修學位，後來即在耶魯大學東亞圖書館服務至今。

<sup>73</sup>論文末尾評語云：「用新的眼光去批評古典文學，易流於偏頗，往往歪曲了作品，而就自己的立場說話，不是『削足適履』，就有『牽強附會』之嫌。然陳銘堯同學〈從短篇小說角度看左傳〉論文，在緒論中，即闡明《左傳》有歷史與文學的雙重價值。僅就其文學方面的價值來討論，並分析其文學技巧。在《左傳》文章中抽樣舉例以分析之，方法平實可取，可作為今後進一步研究之基礎。」

<sup>74</sup>按，陳老師於信中提及：「Yale 大學邀約我去編輯《四庫全書》書卡分類的重任。」

<sup>75</sup>見《中央月刊》，第3卷12期，頁131~134，原文已收入《松風集》。重新發表者，為中英對照本。

<sup>76</sup>見《中央月刊》，第4卷7期，頁115~118，原文已收入《松風集》。重新發表者，為中英對照本。



與趙復三先生結婚。仍在耶魯大學東亞圖書館任職。

**2003 年(73 歲)**

由耶魯大學東亞圖書館退休，留居美國。



退休時與耶魯大學東亞圖書館同仁及高階主管合照(李碧瑤女士提供)

**2005 年(75 歲)**

6 月 20 日至 21 日，回臺灣，參加臺灣大學思亮館國際會議廳舉辦「鄭因百先生百歲冥誕國際學術研討會」。

**2008 年(78 歲)**

因心臟病開刀住院。

**2011 年(81 歲)**

年初，透過東海大學外文系魏淑珠教授轉告，表示願意將其置放於美國的個人藏書，贈予東海大學圖書館典藏<sup>77</sup>。

7 月，由臺中港進口 142 箱贈書，由東海大學支付所有打包、裝箱及運費等費用。

**2014 年(84 歲)**

---

<sup>77</sup>按，陳老師於信中說：「由於對東海的懷念，在退休之前，把自己的藏書選擇可用的，把它們整理出來，贈送給東海。」



3月28日，東海圖書館採編組依照「贈書處理原則」，完成所有4000餘冊書籍的分類編目作業，入庫典藏。

### 2016年(86歲)

11月25日，東海圖書館特藏室開始蒐集陳曉薈教授的相關資料及發表的著作。

### 2017年(87歲)

1月12日，吳福助教授惠贈陳曉薈教授著作《松風集》及是書掃描檔、影印本。

1月16日，吳福助教授惠贈陳曉薈教授著作《詩詞論叢》。

3月20日，東海圖書館採編組提供完整的陳曉薈教授贈書清單，合計4107筆資料。

	E	F	G	H	I	K	L	M	N	C
4084		Bedford/St. Ma	c2002.	BOOK 808.042			C717			
4085		Basic Books./N	c1981.	BOOK 126			H677			
4086		Image./Moskva	[1991?]	BOOK 759.7656			K152			
4087		R. T. V. Sales./	1966]	BOOK 759			On2			
4088		Simon and Sch	[1972]	BOOK 230.09			T465			
4089		Scholastic Inc.	1997.	BOOK 808.83			T25			
4090		W. W. Norton./	1966, c194	BOOK 781.6309			D733			
4091		Philosophical L	[c1948]	BOOK 780.92			St82zWh			
4092	[1st U.S. ed.]	Harper & Row/I	[1969, c19	BOOK 709.04			W528			
4093		Little, Brown/B	c1952.	BOOK 823.83			J631		v.2	
4094		Prentice-Hall./I	1960.	BOOK 338.973			Un3g			
4095		Center for the S	[1968]	BOOK 301.1608			C499			
4096		Macmillan./Nev	1962-1965	BOOK 780.92			D354zL		v.2	
4097		Fortress Press	c1977.	BOOK 230			T675			
4098		Smithsonian B	c1995.	BOOK 508.74			W532			
4099		Voutsas./Athen	1973.	BOOK 733.3			Et38			
4100		Harper/New Yo	[1958]	BOOK 704.9482			M293g			
4101		Better Homes a	c1972.	BOOK 641.563			B466			
4102		Pocket Books./	1971, c196	BOOK 152.145			L975			
4103		Garden City Bo	1954, c193	BOOK 813.5			M694			
4104	Rev. ed.	Barrows/New Y	[1960]	BOOK 635.9342			M695			
4105	Rev., enl. ed. o	Watson-Guption	[1972]	BOOK 743.7			P687h			
4106		St. Martin's Pre	1979.	BOOK 745.0973			An78			
4107		Collins./San Fr	1995	BOOK 635.968			M145b			
4108										

### 2018年(88歲)

2月23日，《陳曉薈教授著作專輯》校訂完成<sup>78</sup>。

3月12日，申請《陳曉薈教授著作專輯》的ISBN，預計3月29日出版。

<sup>78</sup>承蒙陳老師費心地校訂，校訂稿據郵戳所示，應是農曆年前的2月12日寄到東海大學內的郵局，但因全校放年假而無人收信，故2月22日全校開始上班之際，才看到她校訂的信件。

## 東海特藏整理

### 《陳曉蕃教授著作專輯》序---多元角度、動人文筆

彭懷真館長\*

「先睹為快」是寫序言者的樂趣，我幫上百本書寫序言，樂此不疲。以圖書館館長的身分寫序言，多了些壓力，因為要代表已經有六十二年歷史的東海圖書館來論述，不大容易。

不過，才翻閱此書的初稿，就愛不釋手。一方面享受陳教授的文字之美，一方面透過她的角度看著東海人與東海事。例如 46 頁的〈夢谷〉，那裏是每一位早期東海人都走過的而日後都夢過的地方。又如第 53 至 56 頁的〈葬禮〉，記錄作者在 1965 年參加歐保羅教授痛失年幼兒子喪禮的深情。歐教授伉儷在不到一個月，兩位公子先後去世。堅強的宣教士夫婦日後在 1986 年成立了「東海大學幸福家庭研究推廣中心」，我 1991 年來東海社工系專任，奉梅可望校長之命參與該中心，三年的時光該中心獲得全國績優社會教育團體後辭職，也是歐教授再度負責。

我與歐爸歐媽都熟，但關於 1965 年的悲劇，我靠閱讀鄔錫芬的《側耳傾聽》才了解。如今更透過陳教授動人的文筆得知兩位幸福家庭運動先驅在最痛苦時的心境，彷彿自己也參加了那場歐菲立普浦榮歸天家的追悼會。

拿到本專輯尚未定稿、塗塗改改的初稿，我請也是學中文的老婆先看，老婆對前期半本比較有興趣。我從「學術論文卷」受益不少，例如在〈韓愈及其詩〉(308-318 頁)談到詩與散文的關係。陳教授如此分析：「詩人不必兼為散文家，正如散文家不一定是詩人一樣。雖然兩者並不相妨，但畢竟散文和詩的條件不同。詩人的散文難免為他的熱情所左右，而過分凝聚，反而不能把話說明白。散文家作詩歌，覺得礙手礙腳，而作品的精緻又顯得不足。」此論點精闢，使我豁然開朗，對自己無法寫詩，有另一層體會及多一些的說詞。

剛辭世的余光中教授曾在作品中剖析：「散文，是一切作家的身分證。詩，是一切藝術的入場券。」我是最不懂藝術的人，也最不會寫詩，所以沒法談談詩是怎麼完成的。倒是對散文，頗有興趣。

---

\*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兼圖書館館長

陳教授所寫的散文在本書的第二卷，詩詞則在第三卷，第四卷的主題是對前人的詞加以淺釋，第五卷均屬學術論文。內容多元，處處顯示作者的才華洋溢。負責編輯的本館同仁謝鶯興先生在第一卷整理了作者在東海的大事年表，在全書最後也寫了〈編輯後記〉，充分發揮編輯者的功能，使讀者得以清楚又全面認識陳教授在東海的貢獻。

羨慕陳教授的多元才華，尤其感佩她對學生的教導。本專輯首頁有她親筆所寫對某位陳同學的評語，字跡娟秀大方，相信得到評語的同學，必然珍惜。對於謝鶯興先生的編輯乃至促成此專輯完成的每一位東海人，在此代表東海圖書館，由衷感謝。



### 徐復觀教授紀念室主題展(五)：

## 「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第一章到第九章「先秦儒家」的手稿展說明

謝鶯興\*

1960 年 7 月 31 日，《東海大學校刊》報導徐復觀先生前往日本研究中國人性論史及中國經學發展史返校訊息。從同年 11 月發表的單篇論文〈周初宗教中人文精神的躍動〉，副標題作：「中國人性論史初稿之一」，可知徐先生至遲已於該年 2 月休假之始，即著手計畫進行「中國人性論史」的撰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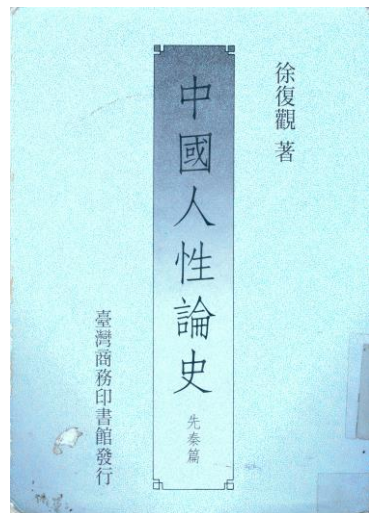
館藏徐先生手稿中，保留著他撰寫《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的手稿，雖然〈道德地人文世紀之出現及宗教的人文化--中國人性論史初稿之二〉，未見有如其它諸篇都是寫在稿紙上的修改，而是從影印下來的單篇論文再加以修改，將篇名改為〈第三章以禮為中心的人文世紀之出現及宗教的人文化〉。

第二章〈周初宗教中人文精神的躍動〉，發表的單篇論文則加副標題：「中國人性論史初稿之一」，手稿作「殷周之際的宗教中人文精神的躍動」。彙編的專書第一節標題作「概述」，單篇論文與手稿皆無標題；第二節的標題「周初文化的系屬問題」，後二者序號及標題皆作「一、周初文化，是殷帝國文化中的一支流」。

第四章〈孔子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及其性與天道〉，有二件手稿，第一件標題〈孔子的性與天道--人性論的建立者〉，第二件標題〈孔子的性與天道--孔子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二者內容有異。以發表的單篇論文篇名為〈孔子的性與天道--人性論的建立者--中國人性論史初稿之三〉。可以發現，同有「人性論的建立者」的論文和手稿，二者內容相近。

第五章〈從命到性--《中庸》的性命思想〉，手稿亦有二件，標題皆作〈中庸的再考察〉，第一節標題皆作「《中庸》文獻的構成及其時代」，其一的原稿與修改的字跡相同，一件則見兩種字跡，應係徐先生倩人謄稿後再修改者。

第六章〈從性到心--孟子以心善言性善〉，單篇論文標題作〈古代人性論



\* 東海大學圖書館流通組組員



的完成--孟子道性善》，副標題為「中國人性論史初稿之四」，其副標題下加「註一」，而手稿標題保留「孟子道性善(註一)」，其它如「善說之成立」，「性說的完成者--孟子」等字，都被刪除。

第七章〈陰陽觀念的介入--《易傳》中的性命思想〉，發表之論文及手稿標題皆僅作《《易傳》中的性命思想》，惟單篇論文再加副標題「中國人性論史初稿之九」；三者之第一節標題作「孔門性命思想發展中之三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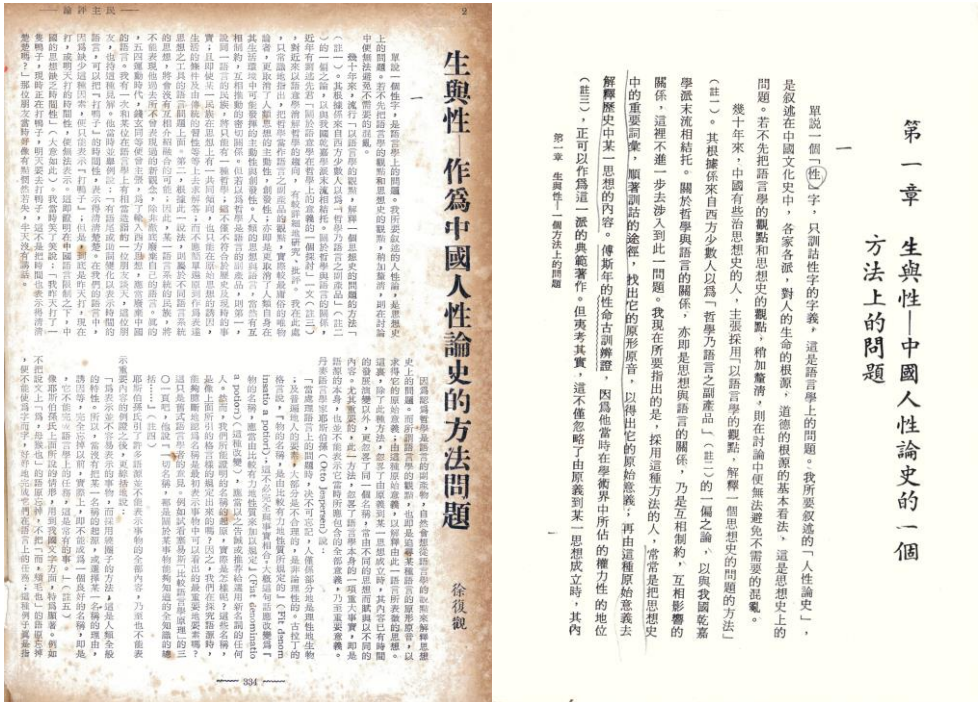
第八章〈從心善向心知--荀子經驗主義的人性論〉，手稿和發表的論文標題皆僅作〈荀子經驗主義的人性論〉，惟單篇論文再加副標題「中國人性論史初稿之五」。又，收入專書之第一節標題為「荀子思想的經驗性格」，而後二者則作「天人分途」。略做比對，前者的第一節內容未見於後二者，顯見徐先生彙編為專書時才加入的內容。

第九章〈先秦儒家思想的綜合--大學之道〉，單篇論文標題作〈先秦儒家思想結構之完成--大學之道〉，手稿的第一頁題「先秦儒家思想的綜合--大學之道，此稿已另錄並修改」。前者第一節標題為「概述」，後二者則作「先秦儒家思想結構之完成」，內容大致相同，亦顯示徐先生彙編專書加以改訂的。



第一章〈生與性--中國人性論史的一個方法上的問題〉，手稿作〈生與性--作為中國人性論史的一個方法上的問題〉有「第一章」，但又畫除。單篇論

文篇目作〈生與性--作為中國人性論史的方法問題〉。發於表 1961 年 7 月 5 日的《民主評論》，而編為第二章的〈周初(宗教中)人文精神的躍動〉是發表於 1960 年 11 月 5 日的《民主評論》。



從發表的日期次序來看，很明顯地，第一章的撰寫，主要是為彙為專書而寫，並針對傅斯年先生《性命古訓辨證》採用「以語言學的觀點，解釋一個思想史的問題的方法」，指出他在考證方法上的疏失，從徐先生在篇末提出「從思想史的立場來解釋性字，只能由它的上下文來加以決定；只能從一個人的思想，從一部書的內容，用歸納的方法來加以決定。用歸納方法決定了內容以後，再由內容的涵蓋性，以探索其思想的內在關連。由內容與內容的比較，以探索各思想相互間的同異。歸納的材料愈多，歸納得愈精密，我們所得出的結論的正確性愈大。站在思想史的立場，僅採用某家某人某書中的一兩句重要話，以演繹成一家、一人、一書的全部思想結構，常易流於推論太過，已經是很危險的方法。何況『就其字義，疏為理論』，其流為荒謬，乃是必然的」觀點，認為「以思想為主的著作」是不能「就其字義，疏為理論」的，所以對「這種極尋常而又極基本的態度和方法，若不先弄清楚，便無真正地思想史可言，所以我特先為提出。」

## 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之前的華文雜誌創刊號--《紅專》

陳惠美\*、謝鶯興\*\*

館藏《紅專》半月刊的封面為白底紅字，上列「紅專」，下列「1」。封底版權頁也是白底紅字，由上至下依序題：「紅專半月刊」、「一九五八年第一期十一月一日出版」、「編輯·出版者 紅專半月刊編輯委員會」、「北京西四頌賞胡同乙二十五號 電話六·四四二八」，欄下題：「每月一日、十五日出版 總第一期」，配合版權頁的文字「總第一期」，才能明確得悉該期是為「創刊號」的「總一期」以及出版日期與週期。



關於刊名，〈改刊詞〉說：「幫助社員加速自我改造，早日成為又紅又專的工人階級知識分子」的說法，應與「1957年至1958年的『紅專』大辯論」

\* 僑光科技大學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副教授

\*\*東海大學圖書館流通組組員

<sup>1</sup> 按，李瑗《九三學社卷》，收入《中國民主黨派史叢書》第二冊(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第三頁照片，收《紅專》1958年第1期，文字說明為：「1958年《九三社訊》更名《紅專》，圖為1958年11月1日《紅專》創刊號。」刊名之下有英文「HONG ZHIAN」，期數下有「1958」，與東海藏本明顯不同。二者孰為初印，孰為後印，未見到該份刊物之前，不敢論斷。

有關<sup>2</sup>。

館藏《紅專》，〈改刊詞〉說：「為迎接共產主義的到來而不懈地努力。這就使得我社中央機關刊物必須來一個大躍進，從原來的《社訊》改為足以擔負起新時期給予的新任務的《紅專》半月刊，成為幫助社員進行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想教育的有力武器。」從〈目錄〉刊名下所題，知這份刊物本是「九三學社中央委員會機關刊物」。

《紅專》半月刊的發行，是九三學社的「機關刊物」，究竟是僅對內發行，抑或對外發行？現今是仍然持續發行？有無更改刊名？檢索「中國知網」，查無此刊物的訊息，關於九三學社的研究的論文倒是頗多。〈《民主與科學》創刊二十周年座談會在京舉行〉<sup>3</sup>記載：

九三學社中央主辦的刊物有面向國內外公開發行的《民主與科學》和在社內發行的《九三中央社訊》，設有學苑出版社、學苑音像出版社，開通有九三學社中央網站。……88 歲高齡的九三學社中央宣傳部原副部長牟小東回顧了九三學社從 20 世紀 50 年代的社刊《紅專》到 1989 年創辦《民主與科學》的辦刊歷程，回憶了很多令人感慨的往事，他感到《民主與科學》現在越辦越好，突出了「民主」、「科學」的主線，很多文章讀後令人受益匪淺，在民主黨派的刊物中具有鮮明的特色風格。九三學社刊物有「向國內外公開發行的《民主與科學》」和「在社內發行的《九三中央社訊》」二種，牟小東回顧的「50 年代的社刊《紅專》」，與館藏應是相同，但何時又改名為《九三中央社訊》？〈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和「神仙會」〉提到：

1958 年 11 月 28 日至 12 月 25 日，九三學社第二次全國社員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會議還決定將社刊《九三社訊》改刊為《紅專》。<sup>4</sup> 可以知道，〈改刊詞〉所說的《社訊》，全名為《九三社訊》。可惜的是未見《社

<sup>2</sup> 參李慶剛〈1957—1958 年的『紅專』大辯論〉，見《零陵學院學報》第 25 卷第 5 期，頁 109~113，2004 年 9 月。李慶剛〈20 世紀五六十年代『紅專』問題的討論〉，見《當代中國史研究》第 19 卷第 1 期，頁 67~72，2012 年 1 月。

<sup>3</sup> 見《民主與科學》2010 年第 1 期，頁 79~80，2010 年 2 月 15 日。

<sup>4</sup> 見李瑗《九三學社卷》第六章〈在反右派鬭爭和「文化大革命」中經受考驗〉，頁 120~121。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年 12 月。按，「1958 年 11 月 28 日至 12 月 25 日」決定「將社刊《九三社訊》改刊為《紅專》」，但東海藏的《紅專》1958 年第 1 期的發行時間的版權頁卻是 1958 年 11 月 1 日，而李瑗書中附的封面書影，又有刊名的英文拼音及「1958 年」字樣，頗為矛盾，可進一步考訂。



訊》發行於何時的記載。

至於「文化大革命」期間的《紅專》命運呢？〈在「文化大革命」中〉記載：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1966年8月24日，九三學社被迫宣布停止活動。<sup>5</sup>

在「被迫宣布停止活動」之際，身為「社刊」的《紅專》，想當然地也是被迫停刊了。「1976年10月，『四人幫』終於被粉碎」<sup>6</sup>，「1979年10月11日至20日，九三學社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會上，周培源在工作報告中指出：『……我社各級組織要盡快把工作活躍起來。』」<sup>7</sup>可推知「社刊」亦應恢復發行，是否即現今的《九三中央社訊》？尚未能確認。

### 壹、目次

或因屬於「機關刊物」，從《社訊》改名的《紅專》，〈目次〉所列諸文章，主要還是政令宣導，誠如〈改刊詞〉所說：「明確地以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為指導原則，並努力加以宣揚。」

### 九三學社中央委員會機關刊物

#### 一九五八年第一期

#### 目錄

改刊詞……(1)

評論：在技術革命文化革命中拔白旗插紅旗……(2)

搶救丘財康給我的教育……董方中(4)

黨委的具體領導創造了醫療史上的奇迹……余賀(左加水)(8)

政治掛帥以後……周瑾(10)

科學研究上兩條道路的鬭爭……湯玉璋(13)

醫學應該為誰服務……郭秉寬(16)

依靠群眾編書……吳鎮(20)

端正方向，積極投入技術革命、文化革命運動……周培源(23)

在華東、中南地方組織躍進經驗交流會大會上的講話

---

<sup>5</sup> 見李瑗《九三學社卷》第六章〈在反右派鬭爭和「文化大革命」中經受考驗〉，頁125。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

<sup>6</sup> 見李瑗《九三學社卷》第六章〈在反右派鬭爭和「文化大革命」中經受考驗〉，頁128。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

<sup>7</sup> 見李瑗《九三學社卷》第六章〈在反右派鬭爭和「文化大革命」中經受考驗〉，頁131。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

思想豐收 工作躍進……(27)

社中央召開華東、中南地方組織躍進經驗交流大會  
還是唯心主義在牽著鼻子……成丕(28)

大躍進中的小體會……金克木(29)

漫談幹勁……孺子牛(35)

急起直追 向農民學習……楊鍾健(32)

張秋香、王保京同志會見記

徐水紀行……游國恩(36)

英雄的人民 幸福的歌聲……粟豐(37)

在徐水看到了共產主義幸福生活的的前景……划及辰(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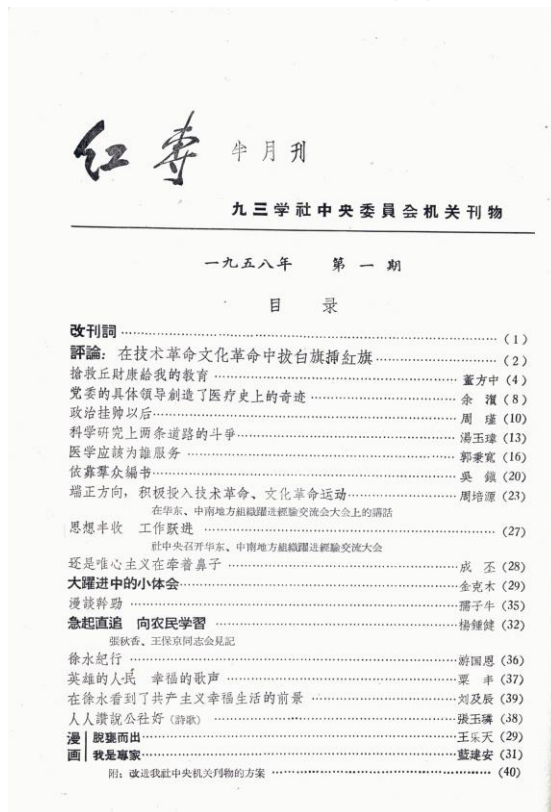
人人讚說公社好(詩歌)……張玉璘(38)

漫畫

脫甕而出……王樂天(29)

我是專家……藍建安(31)

附：改進我社中央機關刊物的方案……(40)



紅星 半月刊  
九三學社中央委員會機關刊物  
一九五八年 第一期  
目 录

改刊詞	(1)
評論：在技術革命文化革命中拔白旗揮紅旗	(2)
拾散丘財康給我的教育	董方中 (4)
黨委的具體領導創造了醫療史上的奇蹟	余 灝 (8)
政治掛帥以後	周 瑾 (10)
科學研究上兩條道路的鬥爭	潘玉璘 (13)
醫學應該為誰服務	郭秉寬 (16)
依靠羣眾編書	吳 鐵 (20)
端正方向，積極投入技術革命、文化革命運動	周培源 (23)
在華東、中南地方組織躍進經驗交流大會上的講話	
思想豐收 工作躍進	(27)
社中央召開華東、中南地方組織躍進經驗交流大會	
還是唯心主義在牽著鼻子	成 丕 (28)
大躍進中的小體會	金克木 (29)
漫談幹勁	孺子牛 (35)
急起直追 向農民學習	楊鍾健 (32)
張秋香、王保京同志會見記	
徐水紀行	游國恩 (36)
英雄的人民 幸福的歌聲	粟 豐 (37)
在徐水看到了共產主義幸福生活的的前景	划及辰 (39)
人人讚說公社好(詩歌)	張玉璘 (38)
漫   脫甕而出	王樂天 (29)
畫   我是專家	藍建安 (31)
附：改進我社中央機關刊物的方案	(40)

## 貳、改刊詞

《紅專》在〈改刊詞〉提出：「有責任幫助同志們結合自己的思想實際和工作實際，開展兩條道路、兩種人生觀、兩種方法的鬭爭。」：「為了幫助同志們解決思想問題，必須將思想問題，反映到刊物上來」的呼籲。

### 改刊詞

我們是處在一個小偉大的時代。在世界規模上，東風以日益強大的優越性不斷壓倒西風。無產階級革命的事業光芒萬丈，為人類帶來了幸福與光明。在偉大的中國共產黨領帶之下，我國廣大人民已經將社會主義建設推進到一天等於二十年的大躍進的時代，並且正在為向共產主義過渡而積極準備條件。在這種嶄新的形勢之下，擺在我們社面前的政治任務，就是加速把社改造成為真正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政治力量，並幫助社員加速自我改造，早日成為又紅又專的工人階級知識分子，在共產黨和毛主席的領導下和全國人民一道，為徹底貫徹黨的總路線，加速完成社會主義建設，信心百倍地為迎接共產主義的到來而不懈地努力。

這就使得我社中央機關刊物必須來一個大躍進，從原來的「社訊」改為足以擔負起新時期給予的新任務的《紅專》半月刊，成為幫助社員進行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想教育的有力武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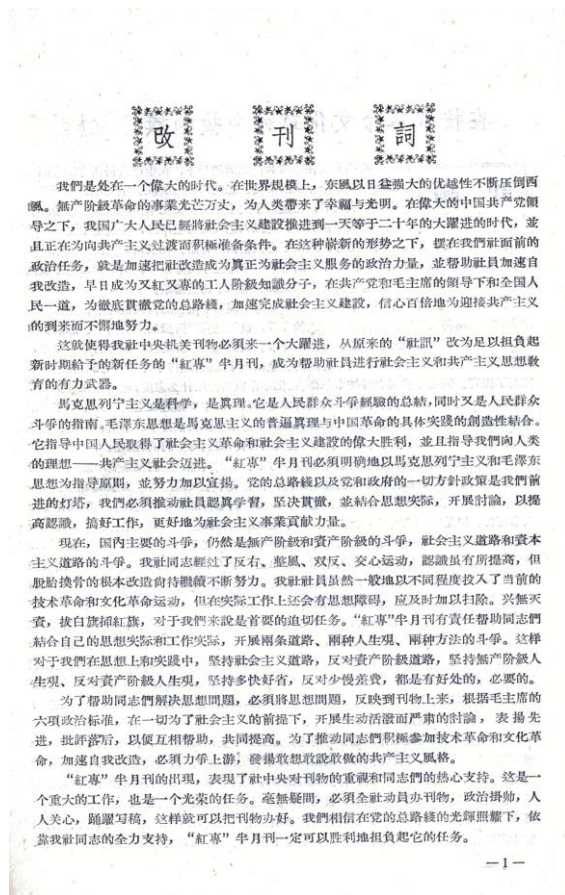
馬克思列寧主義是科學，是真理。它是人民群眾鬭爭經驗的總結，同時又是人民群眾鬭爭的指南。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的創造性結合。它指導中國人民取得了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勝利，並且指導我們向人類的理想--共產主義社會邁進。《紅專》半月刊必須明確地以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為指導原則，並努力加以宣揚。黨的總路線以及黨和政府的一切方針政策是我們前進的燈塔，我們必須推動社員認真學習，堅決貫徹，並結合思想實際，開展討論，以提高認識，搞好工作，更好地為社會主義事業貢獻力量。

現在，國內主要的鬭爭，仍然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鬭爭，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鬭爭。我社同志經過了反右、整風、雙反、交心運動，認識雖有所提高，但脫胎換骨的根本改造尚待繼續不斷努力。我社社員雖然一般地以不同程度投入了當前的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運動，但在實際工作上還會有思想障礙，應及時加以掃除。興無滅資，拔白旗插紅旗，對於我們來說是首要的迫切任務。《紅專》半月刊有責任幫助同志們結合自己的思想實際和工作實際，開展兩條道路、兩種人生觀、兩種方法的鬭爭。這樣對於我們

在思想上和實踐中，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反對資產階級道路，堅持無產階級人生觀、反對資產階級人生觀，堅持多快好省，反對少慢差費，都是有好處的，必要的。

為了幫助同志們解決思想問題，必須將思想問題，反映到刊物上來，根據毛主席的六項政治標準，在一切為了社會主義的前提下，開展生動活潑而嚴肅的討論，表揚先進，批評落後，以便互相幫助，共同提高。為了推動同志們積極參加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加速自我改造，必須力爭上游，發揚敢想敢說敢做的共產主義風格。

《紅專》半月刊的出現，表現了社中央對刊物的重視和同志們的熱心支持。這是一個重大的工作，也是一個光榮的任務。毫無疑問，必須全社總員辦刊物，政治掛帥，人人關心，踴躍寫稿，這樣就可以把刊物辦好。我們相信在黨的總路線的光輝照耀下，依靠我社同志的全力支持，《紅專》半月刊一定可以勝利地擔負起它的任務。



### 參、編輯委員會名單

《紅專》創刊號無〈編後記〉，但有〈改進我社中央機關刊物的方案〉，內容有：「動員全社辦刊物，使社內人人關心，大家投稿。……通訊員應及時地反映各地方組織的工作情況和思想問題，介紹典型經驗；採寫有關社員和社組織的工作和思想方面的稿件」，「為了充實刊物內容，可向社外約稿」及「如業務費不敷使用，擬在社員社費項下撥付」的條文。類似稿約或徵稿說明。該刊物設有編輯委員會，名單如下：

主編：程希孟

副主編：劉及辰、王劍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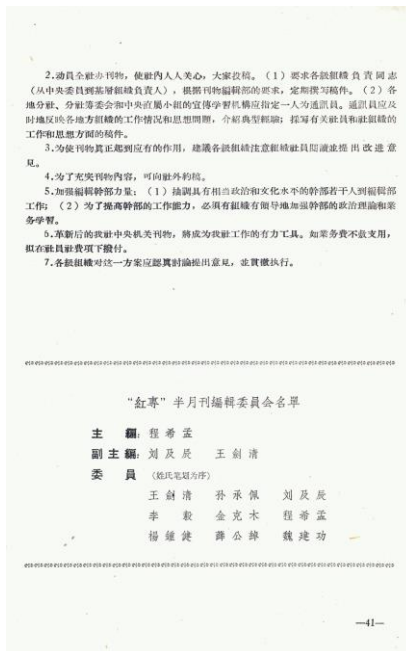
委員(姓氏筆劃為序)

王劍清、孫承佩、劉及辰

李毅、金克木、程希孟

楊鍾健、薛公綽、魏建功

比對〈九三學社第五屆中央委員會名單(1958年12月)〉<sup>8</sup>，其中的孫承佩、李毅、金克木、楊鍾健、薛公綽、魏建功等人，列入中央常務委員名單。劉及辰則列入中央委員名單。



<sup>8</sup> 見李瑗《九三學社卷》附錄〈九三學社歷屆中央領導機構成員名單〉，頁414~415。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

館藏普通本線裝書總目·經部四書類(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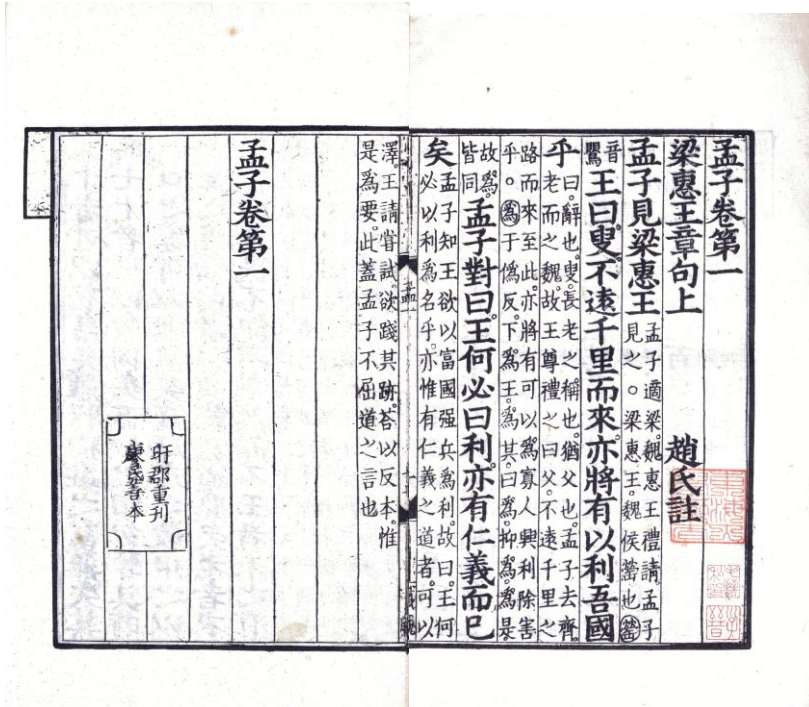
陳惠美\*、謝鶯興\*\*

◇《景印元覆宋世綵堂本孟子趙注》十四卷二冊，漢趙岐注，善本叢書本，民國五十九年台北故宮博物院據元覆宋廖氏世綵堂本景印(共兩套)，A07.42/(a)4924

附：民國五十九年十月蔣復璁〈景印元覆宋世綵堂本孟子趙注序〉、〈孟子題辭〉、民國昌彼得〈元吁郡翻宋廖氏世綵堂本孟子趙注跋〉。

藏印：「毛晉和印」方型陰文硃印、「子晉」方型硃印、「毛襄之印」方型硃印、「華伯氏」方型陰文硃印、「毛晉私印」方型硃印、「毛子晉」方型硃印、「毛氏子晉」方型硃印、「聽松風處」方型硃印、「毛晉之印」方型陰文硃印。「毛氏所藏子永保」長型硃印。

板式：細黑口，雙魚尾，四邊雙欄。半葉八行，行十七字；小字雙行，行十七字。板框 13.8×23.7 公分。板心上方間見人名，雙魚尾間題「孟○」及葉碼，板心下方間見刻工。



\* 僑光科技大學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副教授

\*\*東海大學圖書館流通組組員

各卷首行上題「孟子卷第〇」，次行上題篇名次第(如「梁惠王章句上」)，下題「趙氏註」(以上僅見卷一)，卷末題「孟子卷第〇」及「吁郡重刊廖氏善本」各型牌記。下半葉外側有書耳，上題篇名(如「梁惠王上」)。

扉葉右上題「善本叢書」，左下題「國立故宮博物院印行」，中間書名題「孟子趙注十四卷」。

版權頁由右至左依序題：「中華民國七十四年十月初版」、「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六月再版」、「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字第二六二一號」、「景印元覆  
宋世綵堂孟子趙注」、「版權所有」、「發行人：秦孝儀」、「編輯者：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出版者：國立故宮博物院」、「中華民國台北市士林區外雙溪」、「電話：(〇二)八八一二〇二一」、「劃撥帳戶：〇〇一二八七四-一」、「印刷者：大興圖書印製有限公司」、「地址：三重市三和路四段一五一號」、「電話：(〇二)九七一九七三九」。

按：一、〈景印元覆宋世綵堂本孟子趙注序〉云：「本院既已景印元至正間覆宋世綵堂本《論語集解》，乃復檢同式版本《趙注孟子》付工景印，使與《論語》相輔而行，以啟國人閱讀興趣，藉收頑廉儒立之效。」

二、〈孟子題辭〉云：「儒家惟有孟子，闕遠微妙，縵奧難見，宜在條理之科。於是乃述己所聞，證以經傳，為之章句，具載本文。章別其指，分為上、下，凡十四卷。」

三、〈元吁郡翻宋廖氏世綵堂本孟子趙注跋〉云：「孟子十四卷，漢趙岐註，元吁郡翻刻宋廖瑩中世綵堂本，每半葉八行，註文雙行，行俱十七字。版匡高 20.7 公分，寬 13.6 公分，四周雙欄，左欄外有耳題以記篇名。小黑口，雙魚尾，上魚尾下題書名及卷數曰『孟幾』，下魚尾上載葉次。版心下方記刻工……，板心上端亦刻有名氏……，偶亦有刻之魚尾下右側者，此諸名當是書工。」

和張四書訓蒙輯疏二十九卷(缺卷二十九「孟子盡心下」)存二十八冊，日本會津安娶撰，日本嘉永元年(1844，清道光二十八年)刊本，

A07.32/(q3)8331-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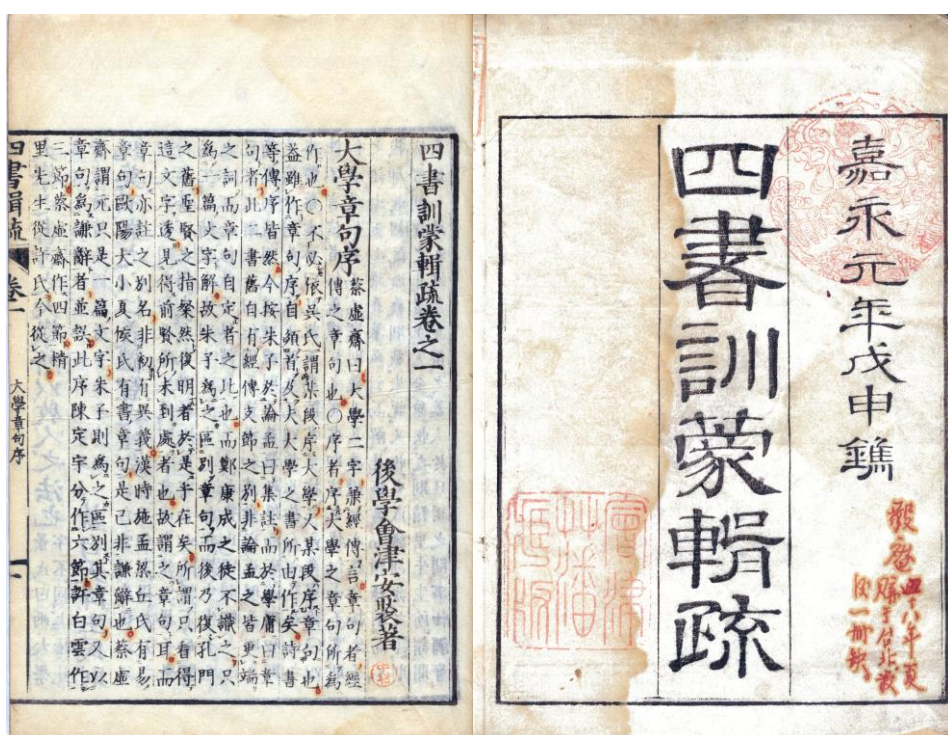
附：日本天保十五年(1844年，清道光二十四年)紫溟古賀煜〈四書訓蒙輯疏序〉、日本天保十四年(1843年，清道光二十三年)會津安娶〈四書



訓蒙輯疏序〉、〈凡例〉、〈引用諸家名氏〉、南宋淳熙己酉(十六年, 1189)朱熹〈大學章句序〉、南宋淳熙己酉(十六年, 1189)朱熹〈中庸章句序〉、〈朱子論語集註序說〉、〈朱子孟子集註序說〉。

藏印：「會津藩藏版」、「露溪」、「鞍掛藏」等方型硃印，「毅庵珍藏」、「松隈氏藏書記」等長型硃印，「中村」、「永富」等圓型硃印。

板式：花口，單魚尾，左右雙欄。半葉十行，行二十一字；小字雙行，行二十一字。板框 13.7x17.8 公分。板心上方題「四書輯疏」，魚尾下為卷數、書名，板心下方為葉碼。



各卷首行題「四書訓蒙輯疏卷之○」，次行題「後學會津安娶著」，卷末題「四書訓蒙輯疏卷之○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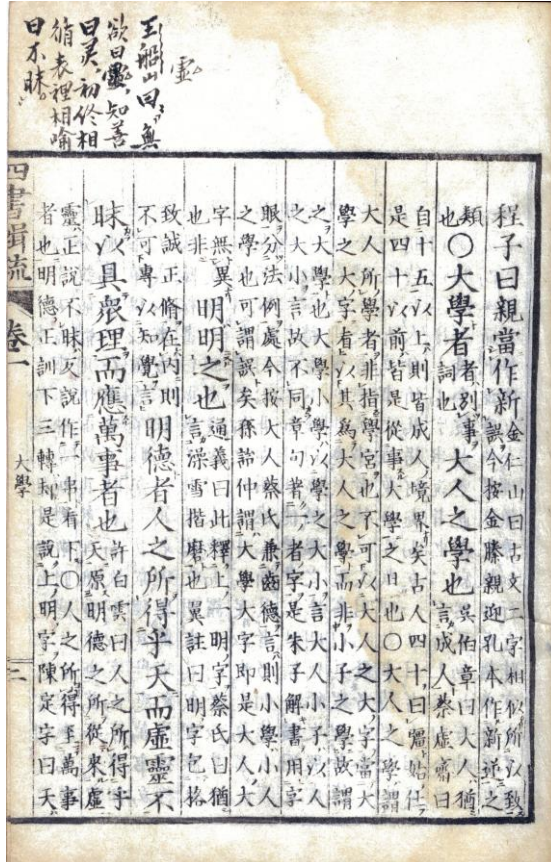
扉葉右題「嘉永元年(1848, 清道光廿八年)戊申鑄」，中間書名大字題「四書訓蒙輯疏」，右下硃字題「毅庵四十八年夏購于台北最後一冊缺」，第一、二及四至十五等冊之封底有墨筆題「大正元歲中邨義郎藏書」。

按：一、紫溟古賀煜〈四書訓蒙輯疏序〉書眉有音釋，書間另見墨筆眉批及硃筆句讀。



二、會津安聚〈四書訓蒙輯疏序〉云：「彙成一編，凡二十九卷名曰《四書訓蒙輯疏》，知館藏缺第 29 卷，第 28 卷為《孟子·盡心上》，則所缺者為《孟子·盡心下》。

三、字句間夾有日文音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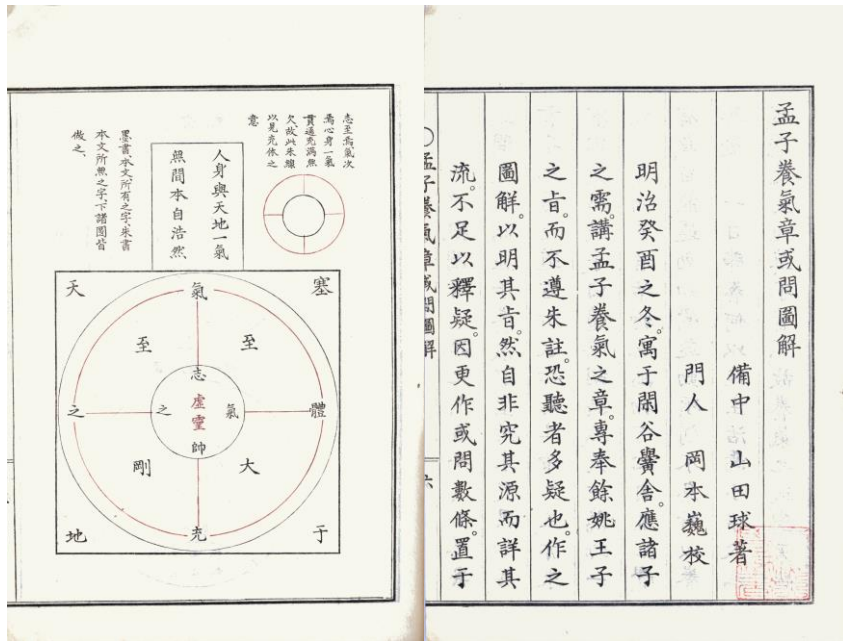
和孟子養氣章或問圖解不分卷一冊，日本山田球撰，岡本巍校，岡本巍藏板，東京性明堂大阪支店印行，日本明治三十四年(1901，清光緒二十七年)雙色刊本，A07.42/(q3)2261

附：日本明治十六年(1883，清光緒九年)岡本巍〈孟子養氣章或問圖解序〉、日本明治辛丑(三十四年，1901，清光緒二十七年)三島毅〈書孟子養氣章或問圖解後〉、日本明治辛丑(三十四年，1901，清光緒二十七年)島村久〈孟子養氣章圖解跋〉。

藏印：「非賣品」長型硃印。

板式：白口，無魚尾(原魚尾處以「○」代之)，四邊雙欄。半葉八行，行十七字；小字雙行，行三十二至三十三字不等。板框 15.6×20.9 公分。

板心題「孟子養氣章或問圖解」及葉碼。



卷首之首行上題「孟子養氣章或問圖解」，次行下題「備中 山田球著」，三行下題「門人 岡本巍校」。

扉葉右上題「故山田球著」，左下題「岡本巍藏版」，中間書名大字「孟子養氣章或問圖解」，欄外小字題「東京性明堂大阪支店印行」。

按：一、是書圖解部份為雙色套印。又，山田球於篇中記載：「明治癸酉之冬，寓于閑谷覺舍，應諸子之需，講孟子養氣之章。專奉餘姚王子之旨，而不遵朱註，恐聽者多疑也，作之《圖解》以明其旨。」癸酉，為六年(1873)，即清同治十二年，書成於此時。

二、岡本巍〈序〉撰於明治十六年(1883)，然三島毅與島村久二〈跋〉撰於明治三十四年(1901)，島村久〈跋〉云：「頃學友岡本君將上梓公于世，徵一言于余，余因此以寄。」知書之問世或遲至明治三十四年(1901)矣，故據以題為「明治三十四年(1901)套印刊本」。

和周(學習館)四書全十冊存大學不分卷、孟子四卷五冊，宋朱熹集註，日本後藤定點，日本佐土原藩藏版，日本明治十七年(1884，清光緒十年)大阪濱本伊三郎、岡本仙助翻刻本，A07.52/(n)2540

附：宋淳熙十六年(1189)朱熹〈大學章句序〉、宋朱熹〈孟子集注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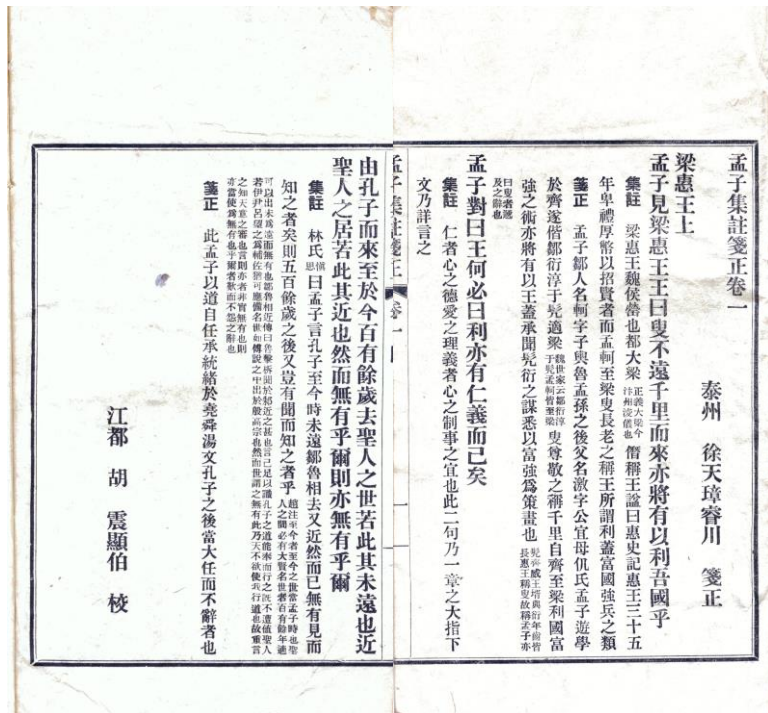
書實分為十四卷。

◇《孟子集注箋正》十四卷附訂正表七冊，清徐天璋箋正，民國胡震校，民國二十五年揚州蕭聲館活字本，A07.42/(q3)2811

附：清宣統二年(1910)徐天璋〈孟子集註箋正敘〉、〈孟子篇敘〉。

藏印：無。

板式：單魚尾，四邊雙欄，無行線。半葉十三行，行經文二十四字，集註與箋正三十字，雙行小字約四十六字。板框 12.8×18.2 公分。板心上方題「孟子集註箋正」，魚尾下題「卷〇」及葉碼。



各卷首行上題「孟子集註箋正卷〇」，次行下題「泰州徐天璋睿川箋正」，卷十四末葉題「江都胡震顯伯校」。

扉葉中間題「孟子集註箋正」，左下題「韓國鈞題」，後半葉牌記題「蕭聲館印行」。

版權頁由右至左依序題：「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七月初版」、「孟子集註箋正」、「實售壹元肆角」、「版權所有」、「箋正者 泰州徐天璋」、「揚州舊城小七巷胡宅」、「印行者 蕭聲館」、「揚州新勝街二〇號」、「印刷者 業勤文化社」、「代售處 鎮江伯先路新江蘇報館」、「揚州南柳巷新江蘇報分館」、「揚州教場街中市世界書局」、「揚州埂子街

國學專修學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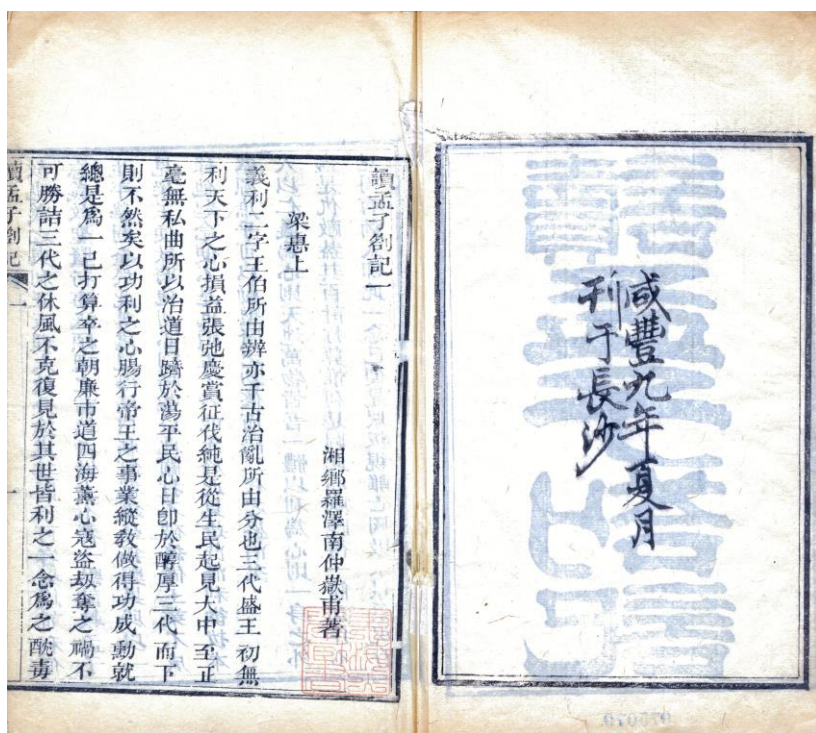
按：〈孟子集註箋正敘〉云：「璋乃即朱子集註外，並採諸儒之說，著為箋正，仿鄭氏箋詩之例，凡毛傳闕者補之，疑者析之，辭取其達，詁取其精，無聚訟，無黨同，章節之分合，句讀之從違，人物之攷證，時事之稽求，凡經人說者不敢掠美，凡為己見者，不敢臆造，必引古為援據焉。星紀七周，稿成六削，一言以蔽曰不越於正而已。」

《讀孟子笱記》二卷一冊，清羅澤南撰，清咸豐九年(1859)刊本，A07.42/(q3)6034

附：無

藏印：無。

板式：單魚尾，四邊雙欄，無行線。半葉九行，行二十四字。板框 13.5×18.0 公分。板心上方題「讀孟子笱記」，魚尾下題卷次(如「一」)及葉碼。



卷之首行上題「讀孟子笱記○」，次行下題「湘鄉羅澤南仲嶽甫著」，三行為篇名。

扉葉題「讀孟子笱記」，後半葉牌記題「咸豐九年(1859)夏月刊于長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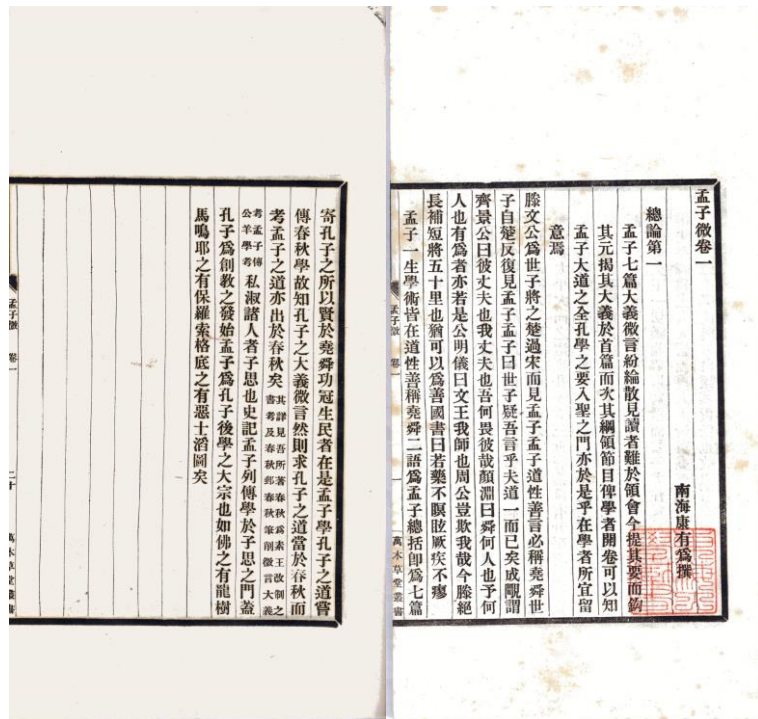
按：是書無序跋，查《清史稿》卷四百七，〈羅澤南〉（列傳一百九十四）云：「羅澤南，字仲嶽，湖南湘鄉人。諸生，講學鄉里，從游甚眾。咸豐元年，舉孝廉方正。……所著有《小學韻語》、《西銘講義》、《周易附說》、《人極衍義》、《姚江學辨》、《方輿要覽》諸書。體用兼備，一宗程、朱，學者稱羅山先生。嘗論兵略，謂大學首章『知止』數語盡之，左傳『再衰』、『三竭』之言，其注腳也。……咸豐四年，粵匪由江寧上竄犯岳州，偕弟近濂各將五百人從王鑫破賊於靖港，追至蒲圻羊樓崗，戰失利，死之。」

《孟子微》八卷附〈刊誤表〉二冊，清康有為撰，萬木草堂叢書本，民國五年上海廣智書局鉛印本，A07.42/(r)0043

附：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康有為〈孟子微自序〉、〈孟子微目錄〉。

藏印：「木堂圖書」方型硃印。

板式：細黑口，單魚尾，四邊單欄。半葉十三行，行二十六字；小字雙行，行二十六字。板框 11.4x15.2 公分。魚尾下題「孟子微」、「卷〇」及葉碼，板心下方題「萬木草堂叢書」。



卷之首行上題「孟子微卷一」，次行下題「南海康有為撰」，三行為篇名(如「總論第一」)

扉葉書名題「孟子微」、左下題「南海康有為題」。

版權頁由右至左依序題：「孔子二千四百六十八年」、「連史紙定價大洋七角」、「丙辰年十二月初版」、「有光紙定價大洋五角」、「孟子微上下二冊」、「版權所有」、「著作者 南海康有為」、「發行者 上海廣智書局」、「上海麥家圈」、「代發行 國是日報館」、「印刷者 上海廣智書局」、「各大書局均有寄售」。

按：一、〈孟子微自序〉云：「惜乎數千年注者雖多，未有以發明之，不揣愚謬，探原分條引而伸之，表其微言大義，不能循七篇之舊，蓋以便學者之求道也，非敢亂經也，若有得於此，則七篇具在，學者熟讀精思焉。」

二、卷八多夾卷七之葉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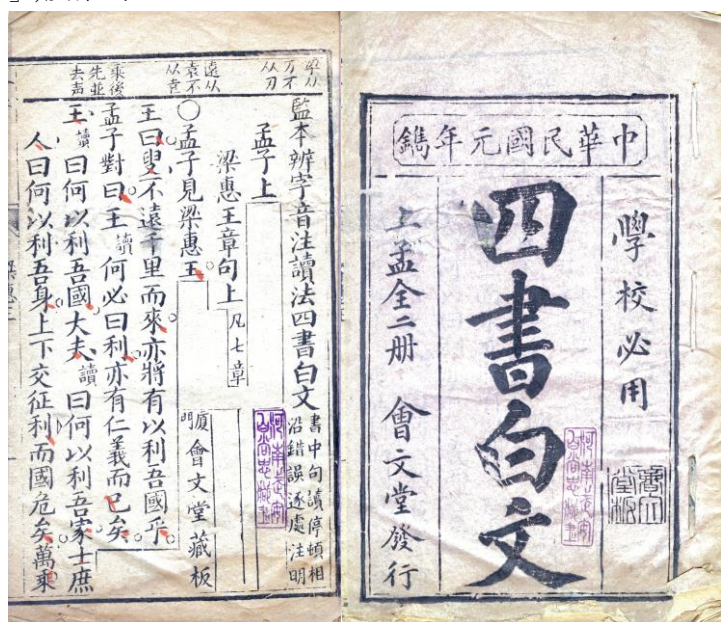
◇《〈監本辨字音注讀法〉四書白文》存《孟子(梁惠王至公孫丑)》一卷一冊，

周·孟軻撰，民國元年廈門會文堂刊本，A07.51/(a)1750

附：無。

藏印：「河南武安白尚忠藏書」藏色長戳。

板式：單魚尾，上下兩欄，無行線。上欄半葉十五行，行二字。下欄半葉八行，行十九字；小字雙行，行十九字。板框上欄 11.7×1.5 公分，下欄 11.7×17.2 公分。板心上方題「上孟」，魚尾下題篇名(如「梁惠王」)及葉碼。





卷之首行題「監本辨字音注讀法四書白文書中句讀停頓相沿錯誤逐處注明」，次行題「孟子上」，三行題「梁惠王章句上凡七章」，四行下題「廈門會文堂藏板」。

扉葉上題「中華民國元年鐫」，右題「學校必用」，左題「上孟全二冊 會元堂發行」，中間書名大字題「四書白文」。

按：是書無序跋，間見硃筆句讀暨註釋，僅存梁惠王和公孫丑二篇，係白尚忠先生贈書之一。據宋向華〈嗜書好讀的白尚忠先生〉（見《東海大學雙週刊》，1986年3月5日）記載，白先生贈 2400 餘冊中英文暨線裝書給東海，圖書館於 1986 年的春節前（2月9日）處理完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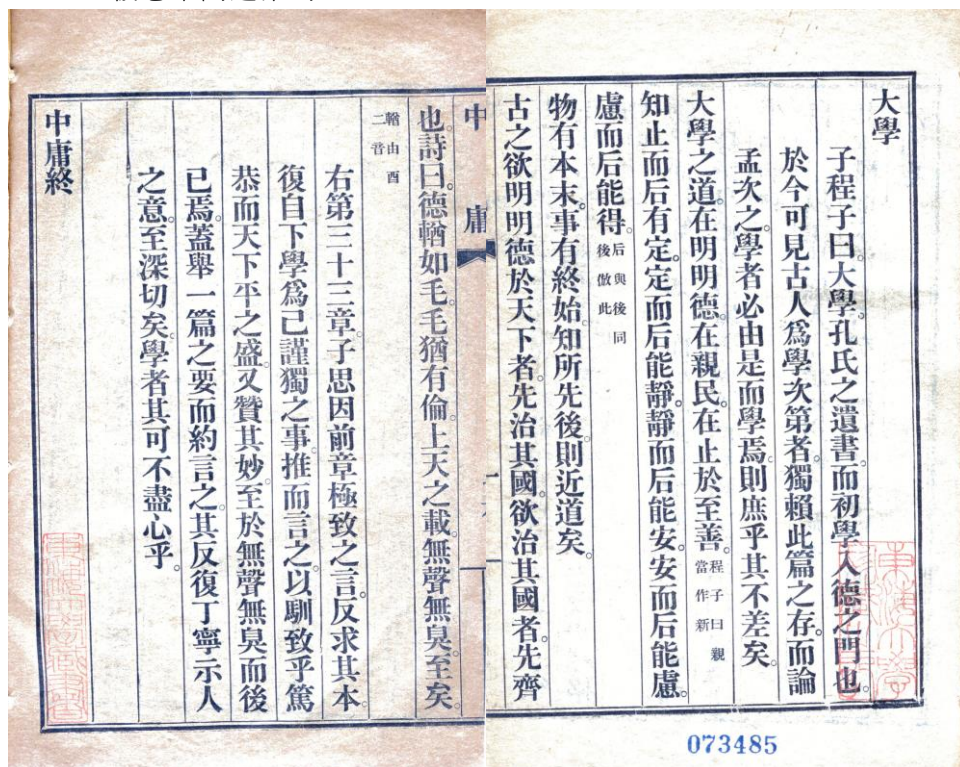
《大學中庸白文》二卷一冊，宋朱熹章句，民國間商務印書館活字本，

A07.51/(a)4057

附：無。

藏印：無。

板式：單魚尾，四邊雙欄。半葉九行，行二十一字；小字雙行，行二十一字。板框 10.9×16.1 公分。板心上方題書名（如「大學」或「中庸」），板心中間題葉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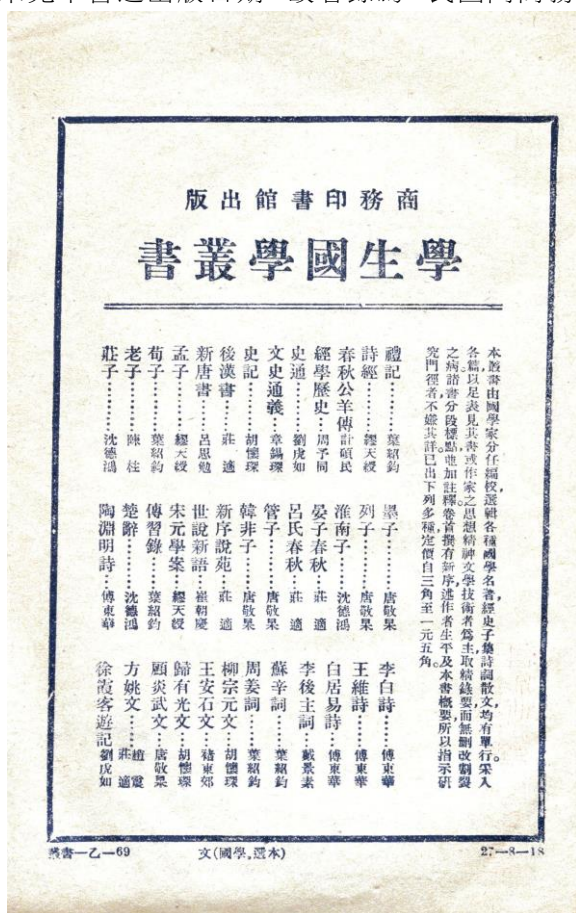
卷之首行上題書名（如「大學」或「中庸」），「中庸」卷下題「朱



熹章句」，次行為「子程子曰」等文字，卷末題「大學終」(或「中庸終」)。

封面書籤題「大學中庸白文」。

按：封底有「商務印書館出版 學生國學叢書」之廣告單，雖列各書之定價，但未見本書之出版日期，故著錄為「民國間商務印書館活字本」。



◇ 《(銅版)四書集註》存《上論語集註》五卷一冊，宋朱熹集註，民國元年上海廣益書局銅版印本，A07.52/(n)254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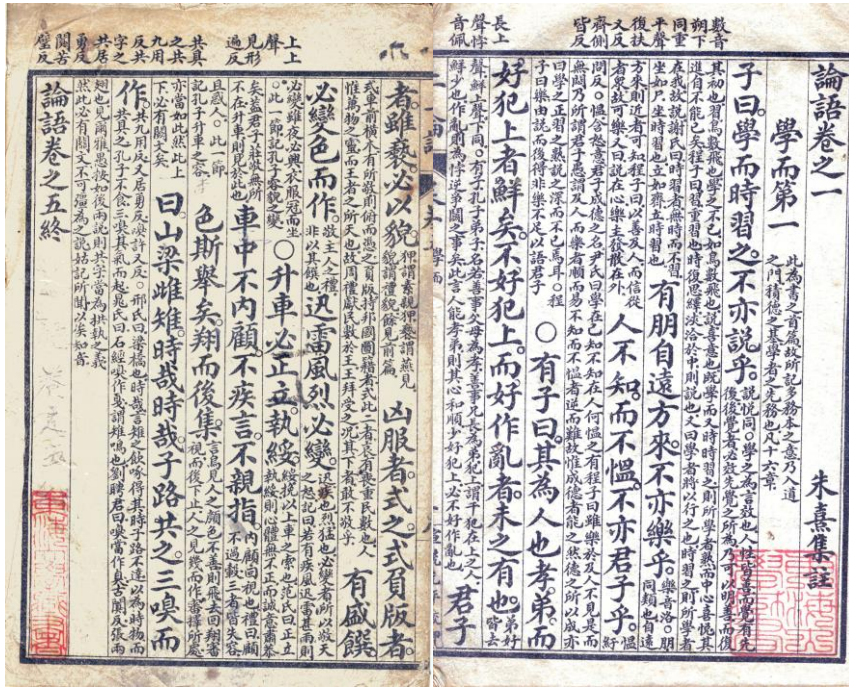
附：無。

藏印：「東海藏書」方型硃印、「贈<sup>姓名：徐維澤</sup>時間：69年6月11日」藍色長戳。

板式：細黑口，單魚尾，四邊雙欄。半葉十行，行二十字；小字雙行，行四十字。板框 11.5×17.0 公分。板心上方題「上論」，魚尾下題「卷○」、篇名及葉碼，板心下方題「宣統元年(1909)校印」。

各卷首行上題「論語卷之○」，下題「朱熹集註」，次行題篇名

次第(如「學而第一」)，卷五末題「論語卷之五終」。



扉葉右上題「中華民國元年精校」，左題「學而至鄉黨 上海廣益書局印行」，中間書名題「上論語集註」。

按：一、封面題「<sup>網版</sup>四書集註 上論」，扉葉書名題「上論語集註」，故一起著錄。

二、書眉皆見音註，板心題「宣統元年校印」，扉葉題「中華民國元年精校」，或即據宣統元年校印之本重印。



## 交流紀實

### 讓閱讀空間成為閱讀的動力--參訪益品書屋台中店側記

流通組 陳曦

2018年1月初在東海大學圖書館展出為期兩週的「餐飲 翻轉孩子的未來」主題書展，於1月19號甫落幕，但關注閱讀議題的戴勝益董事長與東海大學圖書館之間的緣份並未告歇，因閱讀所牽起的連結卻更加強烈。這一次，由東海大學主動出擊，以新任館長彭懷真館長為首，於2月1日率東海大學圖書館的全館同仁參訪戴勝益董事長所經營之「益品書屋」台中店，帶領館員踏出大學圖書館，一窺新型態的閱讀空間之奧妙。

過去戴勝益董事長談到成立益品書屋的初衷是為了推廣閱讀，透過此次參訪的觀察，發現益品書屋推廣閱讀是從空間規劃著手，聚焦於營造寧靜、高雅與閒適的氛圍，讓顧客(或者更貼切的說法，「讀者」)在此被精緻的書籍與環境包圍，能夠專注於書籍本身以及翻書閱讀上。

益品書屋既非販售書籍的書店，也不是典藏大量書籍與提供資訊的圖書館，那麼益品書屋的定位究竟為何呢？透過這次的參訪，並閱讀戴勝益董事長的相關訪談，或可得知益品書屋企圖營造的是一種適宜「閱讀」的空間，而益品書屋在空間規劃上運用的元素與概念，或可說是戴勝益董事長理想的「閱讀空間」之具體實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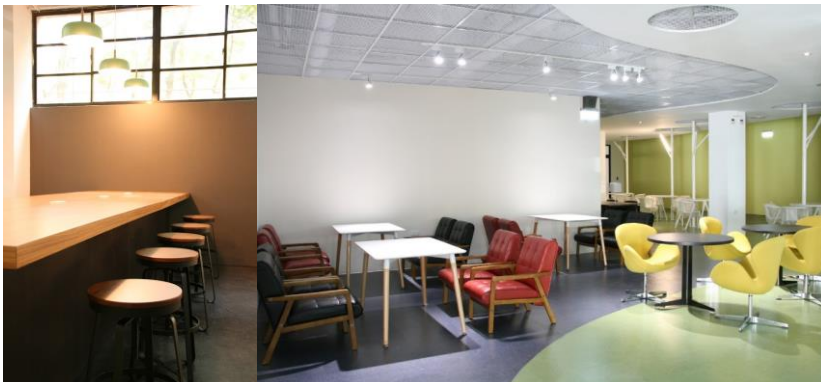
細究其裝潢與內部擺設的巧思，如大門不是感應式的自動玻璃門，而是有如精品門市般厚實有份量的雙開大門，一進入書屋，大門兩側設有低柱型展示臺，在上頭有如藝術品般陳列大開本精裝書迎賓，可見益品書屋對形象塑造的重視從門面即開始。



更往書屋內部走，觀察益品書屋安排書籍的方式，其書籍陳列擺脫傳統書脊朝外的直立排法，而是將每一本書的封面朝外並列，書籍的面貌正面面對讀者，以該書封面的設計和色彩吸引讀者。同時，益品書屋選用高聳直達天花板的圓拱型書牆，營造身在此地群書環繞的氛圍，架上書籍可讓讀者取下閱讀，至於仍在架上的書則成為室內設計的一環。同樣都是在一定的空間內排滿書籍，益品書屋配合空間裝潢、將書正面擺放的方式，無疑比圖書館以書籍最小面積、書脊朝外排列方式，在視覺上更具魅力，留給讀者強烈的印象。



讀者在書屋內可使用的閱讀空間為一、二樓的閱讀區，二樓閱讀區有整面落地大玻璃窗，引進戶外文心森林公園與七期都心市景，作為陪襯閱讀的背景。提供給讀者入座的桌椅，至少有三種風格樣式，可以讓讀者自行選擇喜愛的位置就座。同時，益品書屋也提供無限取用的冷、熱飲品，座位、飲料與閱讀搭配起來，頗有咖啡廳的氣氛，似乎能與戴勝益董事長所嫻熟的餐飲專業互相呼應。東海大學圖書館在 2017 年底啟用新的學習共享空間，其內部裝潢與家具配置亦有相似的巧思，以不同的桌椅風格，在共同空間裡營造出分區的效果，不局限於一種桌椅配置也能跳脫出過去閱覽或自習座位的單調風格。





(上圖為東海大學圖書館地下一樓學習共享空間，下圖為益品書屋台中店)

論及益品書屋的藏書量與主題，自然不比書店或圖書館來得多且廣，但益品書屋也十分歡迎讀者攜帶自己的書籍來此處閱讀。台中店的店長 Tina 介紹益品書屋的選書原則可分為三個面向：內容編排上傾向圖多於文、形制上以精裝書為主、主題則偏好飲食、生活、旅遊、美學與童趣。益品書屋的選書會定期更新，由於書籍陳列需配合空間設計，益品目前的藏書暫不擴充，避免過多書籍造成擁擠，使得益品書屋的空間設計概念走味。



此次參訪帶給東海大學圖書館反思的切入點，身為一間大學圖書館，主要服務的對象(客群)自然與書店或標榜閱讀的益品書屋不同，提供的服務與資源也有所差異。然而這並不代表益品書屋的特色亮點全然不適用於大學圖書館。東海大學陳格理老師(2012)曾談及大學圖書館的學習區環境，表示若空間環境營造得宜，也是吸引讀者前來圖書館的誘因，或可彌補館藏與服務未竟理想的部分。因此，透過此次參訪，益品書屋經營閱讀空間環境的用心，十分值得大學圖書館看齊，以改善、增進圖書館的服務，更加彰顯當代圖書館的核心價值。

## 2018 台北國際書展參觀心得分享

流通組 李光臨

2018 台北國際書展 2 月 6 日上午在台北市世貿一館隆重開幕，筆者非常隆幸參與一年一度的盛事。

書展上最令我瞠目結舌是以色列主題館，以「Isreal - a never-ending story」為標語，以一本大型聖經作為視覺造型，以希伯來字母代表「古」到「今」的主軸，將讀者帶入一段歷史文學時光隧道的大事紀裡。

原來這大型希伯來文書的構想和內容取自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以色列文學家阿格農的作品。佈景搭配石牆、棕櫚樹、沙灘，市集等視覺效果使讀者能親身體驗中東異國風情。

加上虛擬實境(VR)裝置，使讀者感受到東方以色列之都的美景。從探索以色列創新精神，懷現代都市風景之美。由國際化的文化主題和美麗故事襯托出文學以外的科技和旅遊成為展場上搶眼的目光焦點所在。

另有參展書商以 NFC 技術，將展覽的礦物以虛實顯隱在讀者的手機上，「礦山的礦石」重新啟動科技之作。即將展覽礦物的相關資料或圖片燒錄在晶片裡，當手機在礦物旁，且感測到 NFC 信號時，手機即刻呈現出礦物的所有資訊，使筆者想到 NFC 技術常用在支付方面的悠遊卡上，想不到亦有書商投入在此，相當好奇它的未來性。

數位出版主題館中有雲端的雛形，從電子書，電子期刊，五花八門的數位出版品，其中包含生活，休閒，旅遊、美學、藝術、兒童文學等，如入寶山之屋。另外除了紙本書之外的閱讀新體驗要以 AR 及 VR 技術的數位互動作品最為吸引人。

另一個誘人的主題館是在「MAKE A ZINE」青年創意館，是一個以各式各樣或特殊專題出版的創作區。以最自由，最具創意的出版形式，表現出設計者的個性與想法。雖然是小小的卡片，充滿著親手作的樂趣。

以上是筆者一日參觀所得，且留下印象的部份，當然，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展覽，仍有其它主題是令人陶醉和賞析的，礙於版面，無法一一闡述，但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利用寒假期間專程前往，一定會有令人難以忘懷的時光。

在此感謝參展單位開放專業人士參觀，謝謝圖書館提供機會鼓勵我們前往學習。真是一趟值得喝采的行程。

大事記

東海大學圖書館大事記

民國 107 年 2 月 1 日至 2 月 28 日

02.01 彭懷真館長履新，率領全館同仁參訪戴勝益董事長所經營之「益品書屋」台中店，帶領館員踏出大學圖書館，一窺新型態的閱讀空間之奧妙。



02.06 流通組李光臨先生，採編組紀力孔先生參觀2018台北國際書展。

02.07 期刊組彭莉棻組長參加『人文、科技、數位、學習與實踐研討會』並參觀2018台北國際書展。

02.08 至 21 日，全體教職員放年假，本館停止服務，不對外開放。

02.22 館長邀請校內王建生、吳超然、王政文三位教授，及校外專家邵美華老師，訪視佩蓉館及四樓善本書室。

02.27 參考服務組蘇秀華，期刊組謝心好和施麗珠兩位，數位資訊組林幸君等同仁，參加「106學年度東海大學精實活動(5S-整理階段)」成果分享大會，流通組於大會中分享參加這次活動的成果。

下午，歷史系王政文教授陪同在加拿大圖書館從事文物修復的林校友，以及中文系阮美慧教授蒞臨，先到佩蓉館解文物的近況，後在館長室與館長、圖書館同仁交換佩蓉館文物的看法。

即日起，至5月31日止，於四樓特藏室的徐復觀教授紀念室，陳列徐教授《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第一章到第九章的手稿展。

## 館內工作

### 壹、會議紀錄

#### 學者專家訪視佩蓉館及善本書室紀錄

流通組 陳 曦

日期：2018 年 2 月 22 日 10：00～12：00

參與人員：

彭懷真館長、王鑫一組長、館長室賴蕾如、數位資訊組曾昱嫻、流通組謝鶯興、流通組陳曦

王建生老師、吳超然老師、王政文老師、邵美華老師

紀錄：流通組陳曦

#### 壹、校史室與善本書室概況

##### 一、校史室存放佩蓉館藏品概況

- 1.器物：陳列於玻璃展櫃，以白布遮起。
- 2.書畫：經防撞包裝後，置於牆邊。

##### 二、校史室空間

- 3.冷氣暫無法採定時模式啟動。
- 4.光源不足。
- 5.潮溼。

##### 三、校史室的佩蓉館藏品整理概況

- 6.陳列櫃中的器物皆已拍照，大型物件暫無拍照。
- 7.書畫僅一部分有拍照。
- 8.照片皆上傳特色典藏系統網站。

##### 四、善本書室

- 9.藏品以古籍、線裝書、華文雜誌創刊號與校史資料等文獻佔絕大多數。
- 10.空調設定恆溫恆濕。
- 11.藏品由流通組謝鶯興逐步整理，考據並逐一著錄各部古籍的板式行款、序跋及刊刻概況，並介紹華文雜誌創刊號的各刊物的內容，以撰寫文章發表於館刊的方式呈現。

#### 貳、專家意見

優先順序：參考老師們的建議，先處理書畫，再器物，再處理文獻。

##### 一、工作內容





三、校史室所藏佩蓉館的藏品中，大多數的瓷器雖非拍賣市場所感興趣的類型，然不減其本身具有的歷史意義。而這些瓷器在相關研究中較少討論，可視為新的研究切入點。

四、每一件器物都有可寫成一篇故事的潛質，器物的故事可以是策劃展覽的基底。

五、經整理過的藏品，或可延伸至教學現場，成為教材範例。

六、或能以藏品的整理成果為基礎，舉辦小型研討會。

#### 肆、相關人員聯絡方式

人員	分機	電子郵件
彭懷真館長	28700	swphc@thu.edu.tw
館長室賴蕾如	28723	ljlai@thu.edu.tw
數位資訊組王鑫一組長	28705	hsini@thu.edu.tw
數位資訊組曾昱搏	28706	yctseng@thu.edu.tw
流通組謝鶯興	28760	olshie@thu.edu.tw
流通組陳曦	28762	trigger111@thu.edu.tw
王建生老師		cswang99@thu.edu.tw
吳超然老師	38606	crwu@thu.edu.tw
王政文老師	31317	chengwenw@thu.edu.tw
邵美華老師		Shao3333@hotmail.com

## 貳、圖書館 2018 年 2 月份各組工作報告暨各項統計

### 107年2月流通組工作報告

流通組 賀新持彙整

#### 一、二月用館統計

總人次 4,744，開館日 8，日平均 593，人次最多 02/27 計 1,609。外賓總計 224 人次、日平均 28 人次，人次最多 02/26 計 42 人次。

#### 二、二月借書統計

借書人次 1,148、冊數 4,742 開館日 8 計則日借書人次 144、冊數 593，人均借冊約 4。借書單日較多 02/26 日 374 人次借閱 1,349 冊。還書人次計 847、冊數 2,484，單日較多 02/26 日 341 人次 920 冊。

#### 三、二月討論室使用概況

討論室設立為支援教學及提供學術性使用，將傳統式靜態閱覽場所以讀物為中心的閉鎖式管理，轉變為開放動態以讀者為主學習中心。使用概況：系所單位共計 5 系所單位 12 次借用、55 人次使用。(單位使用排行為社會 4 次、化學系 4 次…)

5 人討論室借用 8 次(M1：6 次、M2：2 次)、使用人計 31。

10 人討論室借用 4 次(M3：4 次、M4：0 次)、使用人計 24。

#### 四、二月圖書代借代還

(1)二月份代還圖書總計 854 冊，總圖代還分館計 78 冊，總圖代還系圖計 516 冊。

(2)各系代還為中文系 51 冊、歷史系 26 冊、師培中心 20 冊、多媒體室 349 冊、法律系 19 冊。

(3)另分館代還圖書計 260 冊。

(4)代借圖書：總館 92 冊、分館 31 冊、系圖 61 冊總計 184 冊。

#### 五、三月研究室申請概況

研究室使用於 02 月 27 日(週二)登記，研究生計法研 10；哲研、社工研各 2、中研、歷研、貿研、食科研究所各 1，共 20 位研究生及 2 位教職員申請使用。

#### 六、業務協助

(1)外文系系圖資料註銷--依據「東海大學圖書資訊報廢註銷作業要點」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七款辦理報廢及註銷減帳本次為「破損、不堪使用」、及「經三次盤點，仍下落不明者」。共計 557 冊(件)—中文圖書 22 冊、西文圖書 187 冊、非書資料 348 件。

(2)教育研究所系系圖資料註銷--依據「東海大學圖書資訊報廢註銷作業要點」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七款辦理報廢及註銷減帳本次為版本過舊及複本過多。共計 279 冊(件)—中文圖書 275 冊、西文圖書 3 冊、非書資料 1 件。

(3)英語中心參考書回館典藏---共計 68 冊(件)—中文參考書 18 冊、西文參考書 37 冊、附件 13 件。

(4)圖書盤點---

區域	總冊數	盤點冊數	更改冊數	未盤到冊數	未盤到比率
中文系圖	51,329	49,444	64	1,885	3.7%
博雅書院	2,270	2,187	18	83	3.6%

(5)推廣部聯陪生讀者料建檔---教師 1 位、學生 21 位，使用期限至 107 年 6 月 25 日止。

## 七、「閱讀共享區」討論室開放網路申請

申請網址如下：<http://140.128.103.131/RBS/>.

使用概略說明：

- (1)開放時間使用規範同總館。
- (2)僅開放五人以上申請，每次申請以三小時為限，可續借一次。
- (3)進出門禁需刷卡使用，預約一人每日限一室為限；十四天內(含國定假日)開放預約申請。
- (4)申請使用時間逾十五分鐘，取消此一時段的使用。

## 八、二月圖書長期逾期通知

此次以電話洽讀者：文學院借書 19 人 40 冊、已歸還 12 人 27 冊，理學院借書 5 人 10 冊、已歸還 3 人 3 冊，工學院借書 9 人 27 冊、已歸還 8 人 25 冊，管理學院借書 4 人 9 冊、已歸還 3 人 6 冊，社科院借書 15 人 39 冊、已歸還 10 人 26 冊，農學院借書 1 人 1 冊、已歸還 1 人 1 冊，創藝學院借書 15 人 27 冊、已歸還 12 人 20 冊，法律學院借書 7 人 16 冊、已歸還 5 人 13 冊，行政單位借書 1 人 3 冊、已歸還 1 人 3 冊，中區館盟 1 人 3 冊、已歸還 1 人 3 冊。共計通知借書 77 人 175 冊，已歸還 56 人 127 冊比率約 73%。

## 九、106 學年精實活動成果分享報告

時間：2 月 27 日。地點：銘賢堂。圖書館是以資料蒐集、整理、組織、保存、提供使用為主機構。此次，清除掉一些歷史的文件甚多無法保存也甚為可惜。隊員工作時間以輪班為主，但全員使命必達，全力配合，頗為辛苦。圖書館的服務朝向無紙化，在未全面取代時，仍需有空間存放資料，將一些歷史文件資料銷毀的確可增加空間使用。在推展時機：因為開學期間工作持續忙錄，除服務校內師生更有館際聯盟師生入館，若在寒暑假推展將更有成效。

## 十、管理學院圖書分館

二月使用統計

用館人次	1,107
外賓進館人次	174
借閱/人次/冊次(含續借)	139/286

二校區各系借閱人/冊次統計	76/158
二校區各系使用電子資源統計	1,272 次
分館代還總館圖書	260

### 107年2月期刊組工作報告

期刊組 彭莉荼彙整

- 一、辦理續訂 AREMOS 資料庫相關事宜。
- 二、2月1日本組3位同仁參觀益品書店。
- 三、公告延長試用 ProQuest Social Science Premium Collection。
- 四、2月7日彭莉荼組長參加『人文、科技、數位、學習與實踐研討會』並參觀 2018 台北國際書展。
- 五、2月27日本組同仁謝心好和施麗珠參加「106 學年度東海大學精實活動(5S-整理階段)」成果分享大會。
- 六、辦理科技部補助 3 種財經資料庫相關事宜。
- 七、公告試用 PsycARTICLES 及 PsycINFO 資料庫。
- 八、中西文期刊區調架。

### 107年2月參考服務組工作報告

參考組 陳婷婷彙整

- 一、106 年 1 月份服務統計
  - 資訊檢索區：3134 人次
  - 參考諮詢服務：296 件
  - 部落格新書推薦：6 筆
  - 全國館際合作：
    - 複印：對館外申請 108 件，向本館申請 8 件(影印頁數 94 頁)
    - 借書：對館外申請 71 件，向本館申請 13 件
    - 新申請帳號：8 人
  - Turnitin 論文原創性比對系統新增帳號：17 人
- 二、1 月分新進參考書處理及上架 19 件。
- 三、完成英語中心中西文參考書移轉至本組暨清單建立共計 68 件。
- 四、與大一中文課合作，進行圖書館利用教育課程，已排定上課班級數計 17 班，已於 1 月 30 日 email 個別通知中文系任課教師課程時間。

五、106 學年度下學期已安排六場資料庫教育訓練課程，日程如下，請上報名系統報名：

時間	資料庫名稱	上課地點
3 月 12 日星期一 (10:20~12:00)	IEL	圖書館資訊素養教室
3 月 13 日星期二 (10:20~12:00)	SciFinder	圖書館資訊素養教室
3 月 19 日星期一 (10:20~12:00)	Turnitin 論文比對系統	圖書館資訊素養教室
3 月 20 日星期二 (10:20~12:00)	Scopus	圖書館資訊素養教室
4 月 9 日星期一 (10:20~12:00)	Endnote 書目管理軟體	圖書館資訊素養教室
4 月 16 日星期一 (10:20~12:00)	WOS & JCR	圖書館資訊素養教室

六、完成 106 學年度下學期通識課程「圖書資訊素養暨學術倫理」教學課綱規劃，已確定三場演講者邀約，另有兩場講者聯繫中。

七、本組同仁楊綉美小姐於 107 年 1 月 31 日屆退。

八、本組同仁蘇秀華小姐參加 2 月 1 日(星期四)下午本館至台中益品書屋的參訪活動。

九、1 月 30 日於主題展示區與數創學位學程合作推出「異色世界的紅外線攝影展」，當日上午 10 點並舉行開幕式。

十、3 月 1 日起，於圖書館一 F 暢銷書區展出「2017 Openbook 好書獎」得獎圖書，展期至 4 月 30 日止。

十一、3 月 22 日下午 1:00~5:00 邀請宏基資訊公司於本館一 F 主題展示區進行 VR 體驗活動，歡迎全校師生踴躍報名參加。

### 流通組 2018 年 2 月各項流通量統計

流通組 羅問津

#### 2018 年 2 月借還書人次冊數統計

日期	借+續		還書		預約		小計	
	人次	冊數	人次	冊數	人次	冊數	人次	冊數
2 月 1 日	49	154	40	106	13	17	102	277
2 月 2 日	1	4	0	0	1	1	2	5
2 月 3 日	1	1	0	0	4	7	5	8

2月4日	0	0	0	0	1	1	1	1
2月5日	45	181	37	121	11	20	93	322
2月6日	49	200	37	128	6	11	92	339
2月7日	50	232	70	231	3	4	123	467
2月8日	1	8	0	0	3	3	4	11
2月9日	0	0	0	0	1	1	1	1
2月10日	0	0	0	0	2	2	2	2
2月11日	0	0	0	0	2	3	2	3
2月12日	0	0	0	0	4	5	4	5
2月13日	0	0	0	0	3	4	3	4
2月14日	0	0	0	0	2	2	2	2
2月15日	0	0	0	0	1	1	1	1
2月16日	0	0	0	0	1	1	1	1
2月17日	0	0	0	0	1	1	1	1
2月18日	0	0	0	0	1	1	1	1
2月19日	0	0	0	0	2	3	2	3
2月20日	0	0	0	0	4	5	4	5
2月21日	0	0	0	0	8	10	8	10
2月22日	38	113	45	239	25	40	108	392
2月23日	69	226	77	289	11	13	157	528
2月24日	30	114	0	0	10	12	40	126
2月25日	63	560	0	0	8	13	71	573
2月26日	517	1952	500	1561	90	117	1107	3630
2月27日	558	1779	469	1496	81	105	1108	3380
2月28日	135	1116	0	0	17	20	152	1136
總計	1606	6640	1275	4171	316	423	3197	11234

2018年2月資料類型冊次統計

特藏代碼	借+續		還書		預約		小計	
	人次	冊數	人次	冊數	人次	冊數	人次	冊數
附件	32	54	34	64	7	9	73	127

圖書	1404	5357	1041	2880	280	360	2725	8597
CD	7	17	6	18	0	0	13	35
張學良贈本	1	1	0	0	0	0	1	1
數位影碟	168	505	217	893	23	36	408	1434
徐復觀贈本	1	1	0	0	0	0	1	1
李田意贈本	2	2	3	3	0	0	5	5
大陸出版品	208	672	143	284	13	17	364	973
大陸出版品 (參考)	1	1	0	0	0	0	1	1
光碟	0	0	1	1	0	0	1	1
戴君仁贈本	1	1	0	0	0	0	1	1
博士論文	1	1	0	0	0	0	1	1
碩士論文	12	28	7	18	1	1	20	47
影音光碟	0	0	1	10	0	0	1	10

## 2018 年 2 月讀者借還書身份別統計

讀者身份	借+續		還書		預約		小計	
	人次	冊數	人次	冊數	人次	冊數	人次	冊數
專任教師	142	1042	77	349	28	41	247	1432
職員	77	225	76	278	23	31	176	534
兼任教師	19	77	8	19	0	0	27	96
附設.實習.計劃人員	8	21	5	19	1	2	14	42
退休人員	5	21	9	34	0	0	14	55
博士班學生	59	446	33	226	14	19	106	691
碩士班學生	303	2046	201	768	35	47	539	2861
學士班學生(日)	915	2563	805	2302	204	267	1924	5132
學士班學生(進修部)	43	130	36	117	10	14	89	261
特別生	5	9	3	13	0	0	8	22
志工	2	5	3	5	0	0	5	10
中部聯盟館師生甲組	2	4	2	4	0	0	4	8
中部聯盟館師生丙組	0	0	2	6	0	0	2	6
校友	4	6	5	9	0	0	9	15



校友志工	2	2	2	3	0	0	4	5
大學館合圖書館	1	4	1	5	0	0	2	9
中部聯盟館師生乙組	1	4	3	6	0	0	4	10
交換生	18	35	2	2	1	2	21	39
總計	1606	6640	1275	4171	316	423	3197	11234

2018年2月單位借還書排行榜

序號	讀者單位	借+續		還書		預約		小計	
		人次	冊數	人次	冊數	人次	冊數	人次	冊數
1	中國文學系	166	906	122	436	17	26	305	1368
2	法律學院系	109	441	91	272	13	14	213	727
3	社會學系	102	531	74	331	20	24	196	886
4	社會工作學系	93	403	77	314	26	30	196	747
5	建築學系	78	342	42	109	5	5	125	456
6	美術學系	75	373	72	274	12	15	159	662
7	歷史學系	65	377	69	242	9	12	143	631
8	哲學系	64	390	56	172	8	14	128	576
9	經濟學系	59	138	58	152	15	16	132	306
10	政治學系	57	191	38	123	14	20	109	334

2018年2月圖書借閱排行榜

名次	條碼號	書名	索書號
1	C531985	英美文學評論	870.5 7731
2	C605815	福爾摩斯探案全集	873.5708 3020 2009
3	C507943	最新 Java 2 程式語言	312.932J3 0858 2007
4	C487723	奇諾の旅	861.57 6413 2008
5	C621543	MATLAB 程式設計與範例應用	312.949M384 4933 2015
6	C532683	行政法:Administrative law	588 8072-02 2006
7	C635083	時光當舖	857.7 2022 2016
8	C269171	史記	610.11 1773-09 y.1991
9	C636198	鋼鐵德魯伊	874.57 0414-1 2014

10	C399452	虎與狐：郭台銘的全球競爭策略	484.6	1170	2005
----	---------	----------------	-------	------	------

## 流通組 2018 年 2 月份新書移送統計暨分析

流通組 羅問津

## 一、2 月各館新書移送的資料暨分析

2 月流通組經手處理的新書統計暨分析，仍以總館(含總館的各組室、寫作中心區、暢銷書區、兒童文學區)的新書移送、遺失報賠、國科會專案借書的新書移送(借還)等，分新書移送表與新書上架撤架表等二種表格統計，並略為分析各表所呈現的狀況，以為採購與典藏的參考。

各館新書移送表(2018.2.01~2018.2.28)

	書籍	附件	總計
總館	一般書庫 144 <sup>1</sup>	0	144
	特藏室 0 <sup>2</sup>	0	0
	參考組 0 <sup>3</sup>	0	0
	兒童文學區 0	0	0
	寫作中心 0	0	0
	暢銷書區 0	0	0
	管院分館 26 <sup>4</sup>	0	26
專案借書	法律系林更盛老師 1	1	1
			總館 書 170 附件 0 專案借書 1 總計 171

2 月份總館共進新書 170 本，附件 0 件，專案借書 1 件，總計 171 件。總館書籍(含一般書庫、特藏室、參考室、兒童文學區、寫作中心、暢銷書區、管院分館)共進 170 本，佔全部的 99.42%。「附件」有 0 片，佔全部的 0%。專案借書 1 件，佔全部的 0.58%。

分別從「一般書庫」、「特藏室」、「參考組」、「兒童文學區」、「寫作中心」、

<sup>1</sup> 總館進書，中文書 0 本，西文書 144 本，共 144 本。其中中文展示書 0 本，不展示書 0 本。西文展示書 45 本，不展示書 99 本。

<sup>2</sup> 特藏室進書 0 本。

<sup>3</sup> 參考組進書 0 本。

<sup>4</sup> 管院分館進書 26 本，包含中文書 0 本，西文書 26 本。

「暢銷書區」等組室進書來看(多媒體資料室的新書已由採編組自行通知),「一般書庫」144本,佔全部的84.21%。「特藏室」0本,佔全部的0%。「參考組」0本,佔全部的0%。「寫作中心區」0本,佔全部的0%。「兒童文學區」0本,佔全部的0%。「暢銷書區」0本,佔全部的0%。「管院分館」26本,佔全部的15.2%。可見本月份以「一般書庫」的書居首位,「管院分館」的書居次。

2月份專案借書共1件。為法律系林更盛老師的1件。

光碟附件移送分類表(2018.2.01~2018.2.28)

日期	分類	總類	一百類	二百類	三百類	四百類	五百類	六百類	七百類	八百類	九百類	合計
光碟												
	總計											

總館新進光碟,分別有0次,合計0片。

## 二、2月份新書移送分類統計

圖書館整建後,「新書展示區」設於入口處的正前方,與「暢銷書區」及「主題展示區」並列。茲將採編組移送至流通組的中、西文書籍,逐次進行分類統計的登記後,表列於下,藉以瞭解新書移送與展示的真實狀況。

2月中文新書移送分類表(2018.2.01~2018.2.28)

月份								展示	不展示	小計
總類										
一百類										
二百類										
三百類										
四百類										
五百類										
六百類										
七百類										
八百類										
九百類										
小計										

從上列可知，2 月份的中文新書移送，共有 0 次。

2 月西文新書移送分類表(2018.2.01~2018.2.28)

月份	2/01			2/27			展示	不展示	小計
總類	3			4			3	4	7
一百類	1			7			1	7	8
二百類	1			2			1	2	3
三百類	14			28			14	28	42
四百類	8			0			8	0	8
五百類	2			12			2	12	14
六百類	0			23			0	23	23
七百類	16			19			16	19	35
八百類	0			1			0	1	1
九百類	0			3			0	3	3
小計	45			99			45	99	144

從上列可知，2 月份的西文新書移送，共有 2 次。展示書 1 次，計 45 本；不展示書 1 次，計 99 本；合計 144 本。

西文書的進書量，以三百類的 42 本最高，佔西文書的 29.17%；其次為七百類的 35 本，佔西文書的 24.31%；第三為六百類的 23 本，佔西文書的 15.97%。

### 三、2 月份新書上架撤架表暨分析

2018 年 2 月放置在總館的中、西文新書，於分類後即陳列於前廳入口的「新書展示區」，每批新書展示與撤架的日期、數量，使用(或外借)的數量及比例，表列如下：

2 月份新書上架撤架一覽表(2018.2.01~2018.2.28)

日期	分類	總類	一百類	二百類	三百類	四百類	五百類	六百類	七百類	八百類	九百類	合計
中文書	展示期間	0	0	0	0	0	0	0	0	0	0	0 <sup>5</sup>
	撤架	0	0	0	0	0	0	0	0	0	0	0
	使用	0	0	0	0	0	0	0	0	0	0	0

<sup>5</sup> 此次無中文書展示。

	228	%	0	0	0	0	0	0	0	0	0	0	
			%	%	%	%	%	%	%	%	%	%	
西 文 書	展 示 期 間 21   228	上 架	3	1	1	14	8	2	0	16	0	0	45 <sup>6</sup>
		撤 架	2	1	1	7	8	2	0	14	0	0	35
		使 用	1	0	0	7	0	0	0	2	0	0	10
		%	33	0	0	50	0	0	0	13	0	0	22
			%	%	%	%	%	%	%	%	%	%	

由上列表格可以明顯看出，二月份中文新書展示陳列共上架 0 本。撤架剩 0 本，使用(或外借)0 本，使用比率為 0%。

二月份的西文新書展示陳列共上架 45 本。撤架剩 35 本，使用(或外借)10 本，使用比率為 22%。

中文新書各大類的借書比率：總類 0 本，使用(或外借)0 本，比率為 0%；一百類 0 本，使用(或外借)0 本，比率為 0%；二百類 0 本，使用(或外借)0 本，比率為 0%；三百類 0 本，使用(或外借)0 本，比率為 0%；四百類 0 本，使用(或外借)0 本，比率為 0%；五百類 0 本，使用(或外借)0 本，比率為 0%；六百類 0 本，使用(或外借)0 本，比率為 0%；七百類 0 本，使用(或外借)0 本，比率為 0%；八百類 0 本，使用(或外借)0 本，比率為 0%；九百類 0 本，使用(或外借)0 本，比率為 0%。

西文新書各大類的借書比率。總類 3 本，使用(或外借)1 本，比率為 33%；一百類 1 本，使用(或外借)0 本，比率為 0%；二百類 1 本，使用(或外借)0 本，比率為 0%；三百類 14 本，使用(或外借)7 本，比率為 50%；四百類 8 本，使用(或外借)0 本，比率為 0%；五百類 2 本，使用(或外借)0 本，比率為 0%；六百類 0 本，使用(或外借)0 本，比率為 0%；七百類 16 本，使用(或外借)2 本，比率為 13%；八百類 0 本，使用(或外借)0 本，比率為 0%；九百類 0 本，使用(或外借)0 本，比率為 0%。

就展示的中文書採購來看，因為此次無中文展示書，故無法做展示比較。

就展示的西文書採購來看，七百類的 16 本居冠，佔展示西文書 35.56%(使用或外借為 13%)；其次為三百類的 14 本，佔展示西文書的 31.11%(使用或外

<sup>6</sup> 此次西文書展示日期從 2 月 1 日算起，只有一次 2 月 1 日，西文書 45 本：總類 3 本，一百類 1 本，二百類 1 本，三百類 14 本，四百類 8 本，五百類 2 本，六百類 0 本，七百類 16 本，八百類 0 本，九百類 0 本。

借為 50%)；四百類的 8 本則居第三，各佔展示西文書的 17.78%(使用或外借各為 0%)。

2018 年 2 月份的中文展示書使用比率為 0%，低於 2018 年 1 月份的中文展示書使用比率的 30%，亦低於 2017 年 12 月份中文展示書使用比率的 55%。

2018 年 2 月份的西文展示書使用比率為 22%，高於 2018 年 1 月西文展示書使用比率的 4%，低於 2017 年 12 月西文展示書使用比率的 29%。

#### 四、結語

2018 年 2 月份的中、西文書籍進書量共有 170 本(含一般書庫、特藏室、參考室、兒童文學區、寫作中心、暢銷書區、管院分館)，低於 2018 年 1 月份的中、西文書籍進書量共有 2187 本，亦低於 2017 年 12 月份中、西文書籍進書量的 1381 本，明顯地呈現 2018 年 2 月份進書量與 2018 年 1 月份及 2017 年 12 月份進書量差異。

從 2018 年 2 月份中文書展示的 0 本(實際進書量 0 本)來看，低於 2018 年 1 月份中文書展示的 254 本(實際進書量 695 本)，亦低於 2017 年 12 月份中文書展示的 397 本(實際進書量 509 本)。

從 2018 年 2 月份西文書展示的 45 本(實際進書量 144 本)來看，低於 2018 年 1 月份西文書展示的 49 本(實際進書量 860 本)，亦低於 2017 年 12 月份西文書展示的 49 本(實際進書量 730 本)。

就 2018 年 2 月份單類的進書量來看，以西文書三百類的 42 本居冠，其低於 2018 年 1 月份單類進書量西文書三百類的 339 本，亦低於 2017 年 12 月份單類進書量西文書一百類的 236 本。可知 2018 年 2 月份的進書量以西文書居多，而單類的進書量以西文書的三百類為最多。

107 年 1 月-2 月的中、西文書籍進書量及展示量對照表

	中文書		西文書	
	展示量	進書量	展示量	進書量
107/一月	254	695	49	860
107/二月	0	0	45	144

